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河海社会学 (学生版)

Journal of Hohai Sociology

30

2020 年春季号
总第 30 期

河海社会学（学生版）

Journal of Hohai Sociology

主 办：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河海社会学（学生版）》编辑部
指导老师：沈洪成
主 编：刘竹香
副 主 编：吴晓璐 孙婷
编 辑：汝艺 吴娟 薛孟春 周小晴 杨静静
李硕人 胡麟 王岚茜 白静艳
投稿 E-mail: sociology_hhu@163.com
刊 号：校 028



欢迎扫描二维码添加关注
《河海社会学（学生版）》微信公众账号

目 录

环境研究

- 藏区牧民与城市居民环境意识差异分析——以阿坝州与成都市为例 吴 迪 石德生 聂钱玉 (01)
-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为何高意愿低行为?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实证分析 袁亚运 (12)

婚姻与组织

- 生命历程视角下农家子弟的婚恋困境研究..... 徐依婷 (23)
- 家族企业接班人建立权威的路径研究..... 任宇东 王毅杰 (33)
- 农村失地家庭的脆弱性研究..... 王玥琳 施国庆 (48)

理论阅读

- 空间、历史与发展:全球叙事对地域社会研究的启示——《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
..... 李万伟 (61)
- 文明的幻象——读福柯《疯癫与文明》..... 郭雪萍 (68)

乡村社会

- 互动仪式链理论对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价值旨向的启示..... 任贵州 (72)

疫情调查

- 小角色,大使命——一位农民工抗击疫战的口述史记录 段太香 (82)
- 与苏州的四名产业管理者在疫情不同阶段的访谈——对本市部分防疫措施的思考 李 汀 (86)

疫情之下灯饰行业复工调查——以中山市古镇镇为例.....	龚 宇 (93)
“停课不停学”——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居家网络学习的个案观察.....	胡宇洁 (101)

我的疫情故事

我身边的疫情故事.....	徐依婷 (103)
疫情下的农村人情.....	杨兴鑫 (107)
半山坡上的网课女孩.....	荣显琳 (110)
疫情下的人在囧途.....	吴 娟 (113)

博士毕业论文摘要

农村水库移民社会分层及其机制研究.....	古安琪 (116)
新型农村社区共同体的实践逻辑——基于鲁南“规划型社区”CF 社区的个案研究.....	卢义桦 (117)
垃圾分类政策修正中的竞争与妥协——以 N 市激励方案为例.....	王泗通 (119)
农村老年人健康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宗占红 (120)
制度变迁中的乡村民办教育转型——以中部仁县为例.....	丁百仁 (122)
转型社会中城一城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研究.....	卢 楠 (124)
生计实践中的农民组织化研究——以吉县果农产业实践为例.....	乔文俊 (126)
易地搬迁移民社区的空间再造与秩序重构——基于陕南西乡县的田野考察.....	郑娜娜 (127)
改造、攫取与荒歇——黄土高原村民环境行为研究.....	林 蓉 (129)
项目制下水库移民村庄治理中的权力结构与行动策略——以中部 H 村为个案.....	吴 上 (130)

新闻快讯

“南京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心理与行为”调查结果发布——给南京市民和党委政府点赞....	(20)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社会心态与行为”调查成果正式发布.....	(66)
45%的学生“非常想”学校了！究竟什么时候开学？.....	(80)
疫情期间高校毕业生的学习与就业情况调查.....	(90)
爱德与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深化合作座谈会圆满举行.....	(115)



藏区牧民与城市居民环境意识差异分析

——以阿坝州与成都市为例*

吴 迪 石德生 聂钱玉

摘 要: 为了解城市居民与藏区牧民在环境意识方面的差异, 选取阿坝州与成都市作为研究场所, 通过实地观察和自填问卷收集相关资料。调查结果显示城市居民的环境意识水平明显高于藏区牧民。藏区牧民与城市居民环境意识的影响因素与机制各不相同。藏区牧民的环境意识中存在“自然崇拜”倾向, 过度认为自然具有修复环境危机的能力。在对环境问题归因方面, 藏区牧民倾向把问题归于个体, 城市居民倾向把问题归于集体。

关键词: 环境意识 环境态度 环境归因 藏区牧民

习近平指出中国人们兴之所向的目标之一是建设美丽中国。他提出“生态治理, 道阻且长, 行则将至”^[1]。生态环境保护, 是一个长期建设与治理的过程。随着我国社会与经济的高速发展, 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空气污染、噪音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垃圾污染等逐渐成为我国当前所面临的主要环境污染类型^[2]。为解决已经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 防范可能出现的环境风险, 应把增强我国公民的环境意识始终放在重要位置。环境意识是公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便利的硬件设施, 公民的环境意识就能够强有力地转换为环境保护行为。只有在个人层面实现环境保护, 环境污染治理与保护才具有可能。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美国学者 Roth 首次在环境研究中引入环境素养的概念。西方学者对于环境意识的定义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意识对行为的引导层面、人对自然的认知与情感层面^[3]。Takala 提出环境意识是对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环境后果的认知与态度^[4]。Stem 提出环境意识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自然环境的态度的本质^[5]。洪大用认为环境意识是指人们在知晓环境现状与规则的前提下, 依据自身的价值观念而产生的保护环境的自觉性, 最终体现在保护环境的行为中^[6]。本文采用的是洪大用所提出的有关环境意识的定义, 即环境意识是人们在已经形成的价值观念上所产生的保护环境的自觉性。

*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6BZX032), 本文已刊发于《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0 年 04 期。

目前我国有关环境意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影响环境意识的因素研究、不同群体的环境意识现状与差异研究。在影响环境意识的因素研究方面，刘志娟等人认为年龄、教育程度、家庭总收入对环境意识具有显著影响^[7]。胡建国等人认为社会结构对环境意识的影响程度在减弱，收入、年龄、文化对环境意识的影响程度较为显著^[8]。程萧潇等人认为媒介的类型、使用时间对环境意识具有显著影响^[9]。根据汇总分类，可将影响环境意识的主演因素分为经济因素、文化因素、个体因素。其中，个体因素中的性别、年龄，经济因素中的收入、消费，文化因素中的教育程度被多数研究反复提及。在不同群体的环境意识现状与差异研究方面，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年龄差异或代际差异、城乡差异、性别差异等。洪大用等人指出，男性比女性具有更高的环境意识^[10]。刘森林等人指出年轻者的环境意识普遍高于年长者，主要是由于社会环境、教育程度、媒介使用等原因所造成的。对于环境意识的城乡差异研究，范叶超等人用“差别暴露理论”对城乡居民的环境意识差异进行解释，并认为城乡居民的环境意识差异开始缩减，将走向同构^[11]。但针对藏区牧民的环境意识研究较少。藏区牧民由于职业要求，长年在牧区游走，信息来源较为单一。城市居民与藏区牧民在环境教育、技术环境、文化氛围、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调查城市居民与藏区牧民在环境意识方面的差异显得尤为重要。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文选取阿坝州与成都市为研究场所，原因有三点：其一，阿坝州距离成都市约 600 公里，能够保证阿坝州相对于成都市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其二，阿坝州作为一个藏族集聚地，能够很好地代表藏族地区。其三，阿坝州位于青藏高原边缘，具有大量以放牧为业的居民。本研究以成都市市区居民与阿坝州藏区牧民为研究对象。通过随机抽样共抽取 761 位研究对象，其中 236 位来自阿坝州牧区，均以放牧为业。525 位来自成都市市区。在抽取的藏区牧民中，男性多于女性，以青年群体为主，教育程度集中在大专与本科。在抽取的城市居民中，男性多于女性，以青年群体为主，教育程度集中在本科及硕士以上（表 1）。

表 1 研究对象基本信息统计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Statistics of Research Objects

变量	属性	比例%	
		藏区牧民	城市居民
性别	男	52.5	50.7
	女	47.5	49.3
年龄	20 岁及以下	27.5	36.4
	21-40 岁	52.5	52.4
	41-60 岁	13.1	10.8
	60 岁以上	6.9	0.4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19.5	0.8
	初中	18.2	7.2
	高中及中专	14	7.8
	大专	22	7.8

本科	25	66.3
硕士及以上	1.3	10.1

（二）调查方法

通过实地观察和自填问卷收集相关资料。研究者深入成都市市区与阿坝州牧区实地观察，收集一手资料。同时，问卷以公认的环境知识量表与环境关心量表为基础，加入有关环境归因、责任等相关问题。问卷主要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居住地等）、经济特征（收入、消费等）、环境知识、环境态度、环境归因等。

（三）量表赋值

根据所采用的环境意识的定义，本研究将从环境知识、环境行为、环境态度、环境归因四个方面测量环境意识。在问卷处理时，确定四个一级指标（环境知识、环境态度、环境归因、环境行为）的权重均为 25。有关环境知识的题，答对计 1 分，答错或不答计 0 分。有关环境态度的题，对于选项“非常同意”、“比较同意”、“说不清”、“不太同意”、“不同意”分别赋值 2、1.5、1、0.5、0 分。有关环境行为的题中，对于选项“有”赋值 1 分，“没有”、“不清楚”赋值 0 分。有关环境归因的题中，正确的回答赋值 1 分，错误的回答或者不答赋值 0 分。有关环境污染经历的题，根据遭遇环境污染的实际次数进行赋值。有关环境评价的题，对于选项“不严重”、“不太严重”、“一般”、“较严重”、“十分严重”分别赋值 1、2、3、4、5 分。对于环境关心程度自我评价的题，对于选项“一点都不关心”、“不太关心”、“一般”、“关心”、“十分关心”分别赋值 1、2、3、4、5 分。

二、结果与分析

（一）环境意识评估结果及城乡差异

将城市居民与藏区牧民在环境知识、环境态度、环境行为、环境归因、环境意识的得分汇总在城市居民与藏区牧民环境意识评估结果表中。以居住地为因变量，对城市居民与藏区牧民在上述五个方面的得分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根据城市居民与藏区牧民环境意识评估结果表，城市居民在环境知识、环境态度、环境行为、环境归因四个方面得分均值都高于藏区牧民。根据城市居民与藏区牧民环境意识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城市居民与藏区牧民在环境知识、环境态度、环境行为、环境归因、环境意识五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总体上而言，城市居民的环境意识（均值 70.26）明显强于藏区牧民（均值 56.77）。具体而言，相比于藏区牧民，城市居民的环境知识水平更高，环境态度更加倾向于保护生态环境，具有更多的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行为，以及能够更好地对环境污染问题进行原因分析。

上述分析说明城乡二元结构差异也会体现在环境意识维度上。环境意识水平高低受到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媒介使用等方面的影响^[12]。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中，城乡居民在经济收入、环境污染经历、教育程度、社会保障、社会关系等方面均不相同^[13]。此外，藏区牧民的人口年龄比、性别比严重失衡。大部分藏区属于农村地区，随着农村青年劳动力的输出，导致农村人口以儿童、老年人以及妇女为主^[14]。城市居民与藏区牧民在上述方面的差异，导致城乡居民在环境

意识方面不一致。

表 2 城市居民与藏区牧民环境意识评估结果表
Table 2 Evaluation results of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of urban residents and herdsmen in Tibetan areas

变量	藏区牧民		城市居民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a.环境知识	13.67	5.96	20.93	3.89
b.环境态度	18.94	3.47	20.57	3.13
c.环境行为	15.39	6.39	16.98	6.31
d.环境归因	8.77	6.66	11.78	7.56
环境意识	56.77	14.89	70.26	12.82

注：环境知识、环境态度、环境行为、环境归因总分为 25，环境意识总分为 100

表 3 城市居民与藏区牧民环境意识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
Table 3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Result of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of urban residents and herdsmen in Tibetan areas

变量	t 值	sig 值
a.环境知识	-20.046	0.000
b.环境态度	-6.392	0.000
c.环境行为	-3.199	0.010
d.环境归因	-5.271	0.000
环境意识	-12.76	0.000

注：置信水平为 5%

（二）环境意识影响因素模型构建及路径分析

1.环境意识影响因素模型构建

为探究城市居民与藏区牧民环境意识的影响因素是否相同，将“性别”、“年龄”、“居住地”、“教育程度”、“月收入”、“政治面貌”、“环境污染经历”、“环境评价”、“环境关心程度自我评价”等作为自变量，“环境意识”、“环境知识”、“环境行为”、“环境态度”、“环境归因”作为因变量。通过回归分析，建立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多元线性模型。

表 4 城市居民与藏区牧民环境意识多元线性模型汇总表
Table 4 Multiple Linear Models of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of Urban Residents and Herdsmen in Tibetan areas
*、**分别为 10%、5%的置信水平下统计显著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藏区)	模型 4 (城市)
居住地 (0=藏区; 1=城市)	13.41**	9.63**	—	—
性别 (0=男性; 1=女性)	—	2.41**	—	2.12**
年龄	—	-0.37*	—	—
教育程度	—	1.41**	2.26**	1.82**
月收入	—	0.41*	—	—
政治面貌(0=群众; 1=非群众)	—	2.88**	—	—
环境污染经历次数	—	0.61**	1.28	—
环境评价	—	0.87**	—	—
环境关心程度自我评价	—	2.93**	—	4.74**
常数	56.85**	33.27**	46.99**	41.55**
调整 R 方	0.17	0.29	0.18	0.16

模型 1 仅以“居住地”为自变量，观察居住地对居民环境意识的影响程度。模型 1 中回归系数与方程总体均在 5%的置信水平上统计显著。结果表明，城市居民的环境意识平均比藏区牧民高 13.41 分。在模型 2 中，引入其余自变量，除了“年龄”与“月收入”两个变量仅在 10%的置信水平上统计显著外，其余变量均在 5%的置信水平上统计显著。结果表明，在所有自变量中，仅有年龄对环境意识影响为负。在其余自变量引入后，居住地的影响依旧明显，只不过影响程度从 13.41 变为 9.63。方程的调整 R 平方从 0.17 变为 0.29，说明在其余自变量引入后，方程模型的解释程度从能够解释 17%的环境意识变化上升到能够解释 29%的环境意识变化。

模型 3 与模型 4 分别针对藏区牧民与城市居民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构建模型。模型 3 与模型 4 均只保留了在 5%置信水平下统计显著的自变量。模型 3 表明藏区牧民的环境意识受到教育程度与环境污染经历的影响。模型 4 表明城市居民环境意识受到性别、教育程度、环境关心程度自我评价的影响。结合模型 3 与模型 4，可以看出：其一，城市居民与藏区牧民的环境意识都受到教育程度的影响，教育程度越高，环境意识水平越高。其二，城市居民中女性的环境意识比男性高，而藏区牧民环境意识的性别差异并不明显。其三，环境污染的经历对藏区牧民的影响更明显，经历过环境污染的藏区牧民的环境意识高于从未经历过环境污染的藏区牧民。其四，环境关心程度自我评价对城市居民的影响更明显，越认为自己关心环境的城市居民，其环境意识水平越高。

2.环境意识影响因素路径分析

为详细说明环境意识的四个维度，将因变量具体为“环境知识”、“环境行为”、“环境态度”、“环境归因”。通过逐步回归分析，建立起因变量为城市居民与藏区牧民的“环境知识”、“环境行为”、“环境态度”、“环境归因”的标准回归模型。根据回归模型的标准回归系数，绘制出相应的路径分析图。

表 5 藏区牧民环境意识影响因素路径系数分解
Table 5 Decomposition of Path Coefficient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n Herdsmen's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in Tibetan Area

自变量	因变量	直接影响	间接影响	总影响
性别（0=男性；1=女性）	环境知识		0.03	0.03
	环境行为		-0.03	-0.03
	环境态度		-0.02	-0.02
年龄	环境知识	-0.18		-0.18
	环境行为		-0.02	-0.02
	环境态度		-0.015	-0.015
教育程度	环境知识	0.28		0.28
	环境行为		0.03	0.03
	环境态度		0.04	0.04
月收入	环境行为	0.22	0.004	0.224
	环境态度	0.17		0.17
政治面貌(0=群众；1=非群众)	环境行为		0.03	0.03
	环境态度	0.08	0.02	0.1
环境污染经历	环境行为		0.01	0.01
	环境归因	0.15		0.15
环境关心程度自我评价	环境行为	0.15		0.15

表 6 城市居民环境意识影响因素路径系数分解
Table 6 Decomposition of Path Coefficient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 Residents'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自变量	因变量	直接影响	间接影响	总影响
性别（0=男性；1=女性）	环境知识		0.02	0.02
	环境行为		0.03	0.03
	环境态度		0.05	0.05
	环境归因	0.17	-0.01	0.16
教育程度	环境知识	0.28	0.11	0.39
	环境行为		0.04	0.04
	环境态度		0.01	0.01
	环境归因		0.09	0.09
政治面貌(0=群众；1=非群众)	环境知识	0.17		0.17
	环境归因	0.09		0.09
环境污染经历	环境归因	0.11		0.11
环境评价	环境行为	0.09		0.09
	环境态度	0.12		0.12
环境关心程度自我评价	环境知识	0.23		0.23
	环境行为	0.25		0.25
	环境态度	0.4		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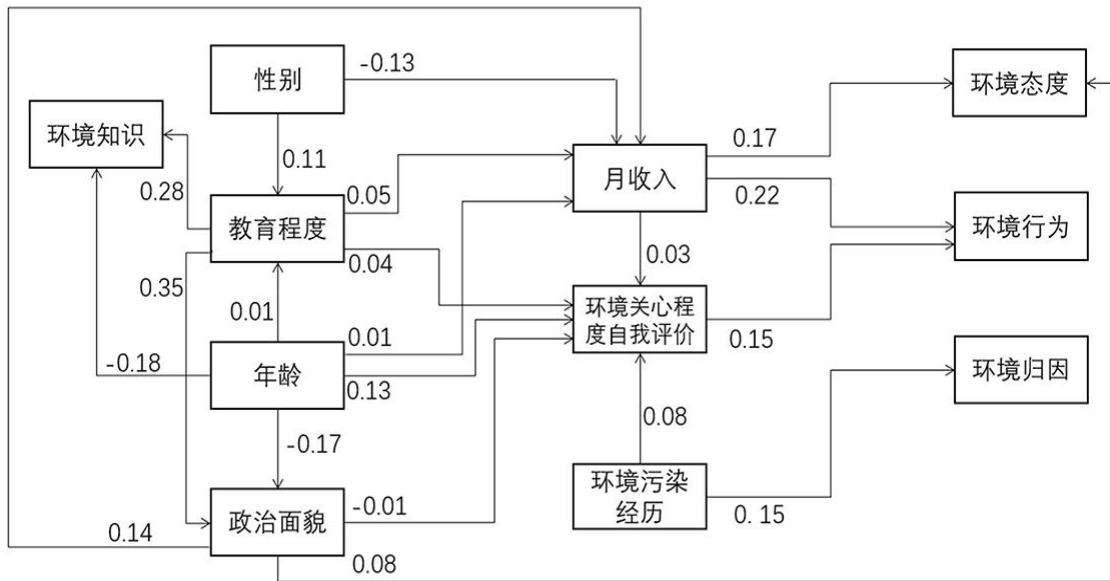


图 1 藏区牧民环境意识影响因素路径分析图
Figure 1 Path Analysis Map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erdsmen's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in Tibetan Are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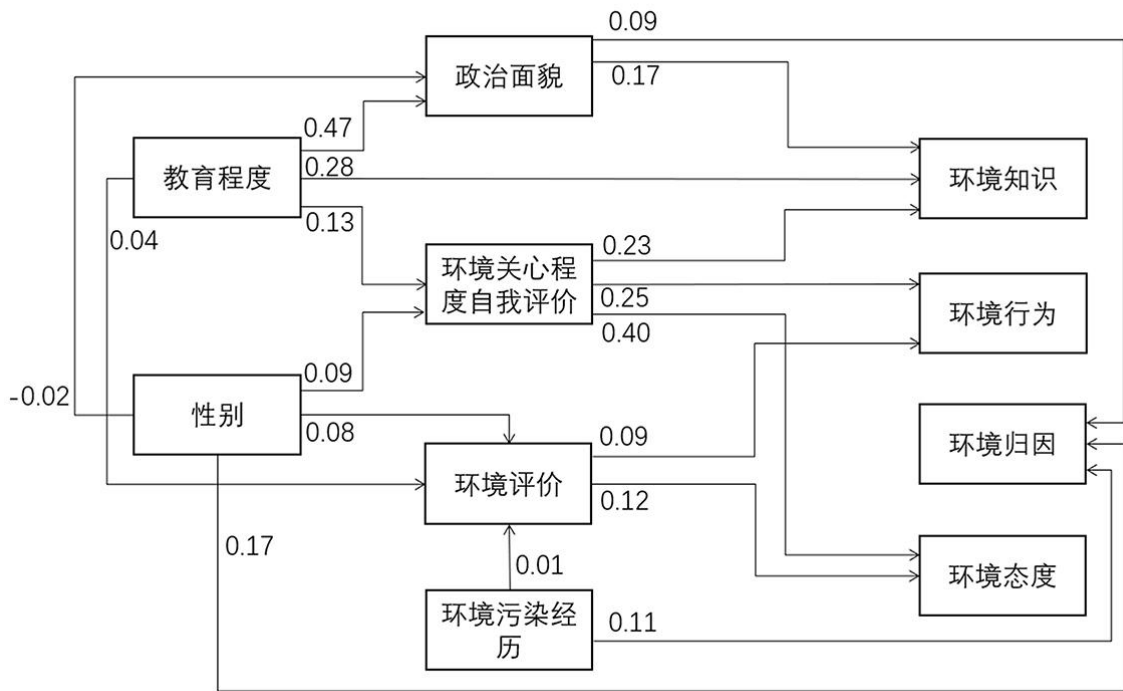


图 2 城市居民环境意识影响因素路径分析图

Chart 2 Path Analysis Map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 Residents'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通过路径分析,研究者发现虽然藏区牧民与城市居民环境意识的四个维度会受到“性别”、“年龄”、“城乡”、“教育程度”、“月收入”、“政治面貌”、“环境污染经历”、“环境评价”、“环境关心程度自我评价”等因素的影响,但城市居民与藏区牧民在“环境知识”、“环境行为”、“环境态度”、“环境归因”四个方面的影响因素与机制各不相同。

首先,藏区牧民的环境知识水平受年龄与教育程度的影响,而城市居民的环境知识水平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环境关心程度自我评价的影响。这说明无论城市居民还是藏区牧民,教育程度对其环境知识水平产生影响,教育程度越高,环境知识的掌握程度越高。年龄对藏区牧民的环境知识产生负影响,年龄越大的藏区牧民,其环境知识掌握程度越低。由于藏区的教育普及速度、质量均不如城市地区。年龄越大的藏区牧民,教育程度越低,其环境知识水平越差。在环境行为方面,藏区牧民的环境行为受到经济收入与环境关心程度自我评价的影响,城市居民的环境行为受到环境评价与环境关心程度自我评价的影响。无论城市居民还是藏区牧民,环境关心程度自我评价越高,越能够做出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行为。对于藏区牧民,经济收入对其环境行为的影响较大,经济收入越高的牧民更有可能做出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行为。在城市地区,环境评价越倾向“污染严重”的居民,更能够做出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行为。在环境态度方面,藏区牧民受到经济收入、政治面貌的影响。经济收入越高,或者政治面貌是非群众的藏区牧民,其环境态度更倾向于环境保护。城市居民的环境态度受到环境评价与环境关心程度自我评价的影响。环境评价越倾向污染严重或环境关心程度自我评价越高的城市居民,其环境态度更倾向于环境保护。在环境归因方面,藏区牧民受环境污染经历的影响。城市居民则受到性别、政治面貌、环境污染经历的影响。无论城市地区还是藏族地区,遭受过环境污染的居民,能够更好地对环境问题进行归因。性别仅对城市居民的环境归因产生影响,女性比男性更能够正确对环境污染问题进行归因。说明女性在分析环境污染问题时,更能做到理性、全面、客观。

根据以上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经济资本、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社会经历、客观环境对环境意识的四个维度各自具有一定的影响。无论在城市地区还是藏族地区,文化资本越高或者经历过越多的环境污染,居民的环境知识水平与归因能力越强。经济资本对藏区牧民的影响更大。经济收入越高的藏区牧民,环境行为与态度更加倾向于环境保护。政治资本与客观环境在城市地区的影响更大。政治资本越多,城市居民的环境知识水平与归因能力越强。生活的客观环境越好的城市居民,环境知识水平越好,环境行为与态度更加倾向于环境保护。

(三) 环境态度中的自然崇拜

根据表 7,在环境态度方面,藏区牧民与城市居民差异主要体现在资源有限性、环境危机严重性两个方面。相比较藏区牧民,城市居民更加认同“地球资源并非取之不尽,而是相当有限”、“人类社会当下面临环境危机”、“自然界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应付环境危机”。城市居民的环境态度倾向生态环境脆弱性,认为人类活动容易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而在藏区牧民的环境态度里,表现出强烈的“自然崇拜”:生态环境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能够提供无限的资源与应对严重的环境危机。城市居民与藏

区牧民之所以具有对生态环境的不同态度，主要由于他们在生活中的不同职业或信仰。其一，阿坝州藏区牧民的职业以畜牧业为主。畜牧业对生态环境的高度依赖使藏区牧民形成“靠天吃饭”、“生态环境具有强大能力，人类应该服从自然安排”的观念。其二，阿坝州宗教以藏传佛教、苯教为主。仅阿坝县境内共有藏传佛教寺庙 42 座。佛教的“万物有灵”与“天人合一”的儒家思想合二为一，将天地万物与人类整合为一体。佛教徒将自然看作自己的庄严使命，认为人类高度依赖于自然，人类并不与自然对立^[15]。因此，在佛教自然崇拜与职业生活的影响下，他们形成与之相一致的环境态度，认定自然本身的力量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表 7 藏区牧民与城市居民环境态度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部分）
Table 7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Result of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of Herdsmen in Tibetan Region and Urban Residents (Part)

环境态度	藏区均值	城市均值	sig 值
自然的自我平衡能力有限，不能完全应付工业社会的冲击	1.01	1.36	0.000
人类正面临“环境危机”，并不是一种过分夸大的说法	1.05	1.34	0.000
地球就像宇宙飞船，只有很有限的空间和资源	1.47	1.61	0.001

注：置信水平为 5%

（四）环境归因中的个体与集体

对调查对象环境归因的回答进行“个体原因—集体原因”二元分类，并计算“个体原因”在“环境归因”中的占比值。根据统计结果，藏区牧民的个体归因占比（35.34%）多于城市居民（33.25%）。这说明虽然藏区农村的集体性更高，但一旦出现环境问题，藏区牧民首先从自身反省开始，将问题的原因更多归于自身。虽然城市社会的个体性高^[16]，但城市居民在面临环境问题时，更多采用整体性视角，反思整个社会存在的不足。研究者认为藏区牧民与城市居民环境归因差异主要是由信息公开程度、公共物品使用两方面不同引起的。信息的公开程度将直接关系到公众对环境污染信息的知情程度。由于城市的信息流通速度、范围远超藏区，所以城市居民能够对环境污染的外部根源进行全面地了解。同时，城市公共物品的供给导致城市居民产生“搭便车”行为，只要没有涉及到自身利益，就不会对消费公共物品而付费^[17]。城市居民在面临环境污染时，把生态环境作为一种公共物品，认为应该是整个集体为之负责，而非个体。而藏区信息公开程度、公共物品使用程度远不及城市，造成藏区牧民并未意识到环境问题的外部根源，也并未形成责任担当上的“搭便车”行为。

表 8 藏区牧民与城市居民环境问题个体归因程度分析表
Table 8 Individual Attribution Degree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of Herdsmen in Tibetan Areas and Urban Residents

	藏区牧民	城市居民	sig 值
个体归因程度	35.34%	33.25%	0.007

注：置信水平为 5%

三、讨论

本研究以阿坝州藏区牧民与成都市市区居民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观察和自填问卷收集相关资料。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人口学特征、经济特征、环境知识、环境态度、环境行为、环境归因等。根据对调查数据的分析，研究者发现城市居民与藏区牧民在环境意识方面存在诸多差异。（1）城市居民的环境意识水平明显高于与藏区牧民。城市居民的环境知识水平更高，环境态度更加倾向于保护生态环境，具有更多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行为，以及能够更准确地对环境污染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城市居民与藏区牧民环境意识的影响因素与机制并不相同。在环境意识的整体水平层面，藏区牧民的环境意识主要受到教育程度与环境污染经历的影响。城市居民环境意识主要受性别、教育程度、环境关心程度自我评价的影响。这是城乡二元结构差异在环境意识维度上的体现。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中，城乡居民在经济收入、环境污染经历、教育程度、社会保障、社会关系等方面均不相同。藏区牧民与城市居民在上述方面的差异，导致他们在环境意识方面的不一致。（2）藏区牧民的环境意识中存在“自然崇拜”倾向，过度认为自然具有修复一切环境危机的能力。而城市居民更加认同自然环境的脆弱性，自然环境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应付环境危机。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是由于在生活中的职业或信仰不同。阿坝州藏区牧民职业以畜牧业为主，形成了“靠天吃饭”的观念。藏传佛教的影响，使佛教徒认为自然具有强大的修复能力，人类高度依赖于自然。（3）在对环境问题归因过程中，藏区牧民倾向把问题归于个体，城市居民则倾向把问题归于集体。藏区牧民与城市居民环境归因不同倾向主要是由信息公开程度、公共物品使用两方面不同引起的。在城市地区，信息的公开程度更高，能够帮助城市居民准确认识到环境污染问题的外部原因。城市公共物品的供给导致城市居民产生“搭便车”行为，拒绝为公共物品的使用付出费用。导致面临环境污染问题时，更多地将原因归于集体，而拒绝承担个体责任。

四、结论

藏区牧民环境意识总体水平明显低于城市居民。与藏区牧民相比，城市居民掌握的环境知识更多，环境态度更倾向于环境保护，具有更多环境保护的行为，以及能够更理性地对环境污染问题进行归因。城市居民与藏区牧民环境意识的影响机制各不相同。藏区牧民环境意识主要受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环境污染经历的影响，城市居民环境意识主要受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客观环境的影响。此外，由于生活中特殊的职业或信仰，藏区牧民在环境态度中具有明显自然崇拜倾向。他们认为自然具有强大的能力，可以提供无限的资源，应付环境污染危机。在环境归因中，藏区牧民表现出个体化倾向，城市居民表现出集体化倾向。藏区牧民与城市居民环境归因中集体化与个体化的差异主要是由信息公开程度、公共物品使用两方面不同引起的。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藏族地区被纳入工业化、新兴城镇化的进程之中。为防范在藏族地区建设中可能出现的生态环境风险，提高藏区牧民环境意识尤为重要。有关部门应当从实际出发，

通过加强环保宣传、推进治理一体化、完善农村地区环保体制、举办环保培训与教育等途径提高藏区牧民的环境意识水平。

参考文献：

- [1] 网站报道 1, 2019, 《习近平：生态治理, 道阻且长, 行则将至》, (<http://cpc.people.com.cn/n1/2019/0429/c164113-31055842.html>)。
- [2] 陆文彬, 2015, 《环保理念下的城市三污治理策略探讨》, 《魅力中国》, 第 18 期。
- [3] 刘辉, 2006, 《西方学者对环境意识与人口统计学变量关系的研究与启示》, 《求索》, 第 6 期。
- [4] Takala M.1991,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Human Aactiv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 [5] Stem P C.1992,*Psychological Dimension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 [6] 洪大用, 1998, 《公民环境意识的综合评判及抽样分析》, 《科技导报》, 第 9 期。
- [7] 刘志娟、李傲、李楚瑛等, 2018, 《公民生态环境意识测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生态经济》, 第 6 期。
- [8] 胡建国、裴豫, 2019, 《国公众环境意识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后物质主义理论视角的研究》, 《晋阳学刊》, 第 3 期。
- [9] 程萧潇、孟伦, 2016, 《媒介使用对受众环境意识的影响——基于 CGSS2010 的数据应用》, 《全球传媒学刊》, 第 3 期。
- [10] 洪大用、肖晨阳, 2007, 《环境关心的性别差异分析》, 《社会学研究》, 第 2 期。
- [11] 范叶超、洪大用, 2015, 《差别暴露、差别职业和差别体验中国城乡居民环境关心差异的实证分析》, 《社会》, 第 3 期。
- [12] 和红、郝思琪、谈甜等, 《北京市城区居民环境意识及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 《中国公共卫生》。
- [13] 蔡昉, 2003, 《城乡收入差距与制度变革的临界点》, 《中国社会科学》, 第 5 期。
- [14] 李承政、邱俊杰, 2012, 《中国农村人口结构与居民消费研究》, 《人口与经济》, 第 1 期。
- [15] 王汝发, 2007, 《西部少数民族宗教的生态观与西部生态环境建设》, 《自然辩证法研究》, 第 11 期。
- [16] 王建民, 2013, 《转型社会中的个体化与社会团结——中国语境下的个体化议题》, 《思想战线》, 第 3 期。
- [17] 王勇、赵玉民, 2010, 《环境问题的归因分析》,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 12 期。

☆ 作者简介：吴 迪，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8 级硕士研究生
石德生，河海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硕士生导师
聂钱玉，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8 级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王岚茜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为何高意愿低行为？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实证分析

袁亚运

摘要：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使用 CGSS2010 数据，实证分析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高意愿低行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中国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高意愿低行为特征普遍存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大众媒体和个体性因素对这一特征均有显著影响；企业、环境知识对其明显助长，政府、社会组织、大众媒体、环境自我效能感则显著抑制。因此，缩小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与行为差距，应强化当地政府环保责任，明确公众环保义务，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加强媒体舆论宣传。

关键词：公众环境治理参与 高意愿低行为 利益相关者理论 影响因素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中国政府不断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力度^[1-2]。2016 年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达 9 219.80 亿元，占全年 GDP 比重 1.24%^[3]。但是，环境治理不能仅靠政府，还需要社会多方力量参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治理环境污染需要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可见，公众参与是中国环境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从目前实践情况来看，公众环境治理参与度还较低。因此，科学分析公众环境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中国环境污染持续扩大，大部分城乡居民已经意识到当前环境问题的严重性，环境意识高涨，大力支持政府环境污染治理。这让部分人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持有一种乐观态度，认为较高环境意识可使居民实施更多环境行为。现实情况并非如此。较高环境意愿并未转化为具体的环境行为。中国城乡居民在参与环境治理上普遍表现为高意愿低行为特征。

美国心理学家 M. Maloney 等最早发现了公众环境意愿与行为分离的现象。正如他们所言，“大多数人相当情绪化得表示，愿意做大量工作来帮助遏制污染问题，但实际上他们做的很少，甚至知之甚少”^[4]。随后，大量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论断，发现公众环境意愿与行为分离的现象普遍存在于西方国家和地区。西方研究者把这一现象称为“意愿—行为差距”（Concern-behavior Gap）。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部分学者用心理障碍（Psychological Barriers）进行解释，认为心理因素阻碍了居民实施环境行为。例如，R. D. Gifford 等^[5]认为有七类因素，分别是对环境问题认知有限、价值观与环境目标不一致、与他人比较、难以抛弃以前习惯、不信任专家、行为改变的潜在风险、有限的行为。还有的学者从个体层面进行解释，认为普通居民缺乏相关知识、政府缺乏环境保护行为是影响大众环境行为的主要因素^[6]。也有学者从文化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认为不同地区的不同社会文化，对公众环境行为约束

不同,居民环境参与自然也不同^[7]。

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的丰硕成果,目前国内研究者较少探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上的意愿与行为差距问题。大量国内文献集中于不同群体、不同地区居民的环境意愿、环境行为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忽略了环境意愿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西方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环境意愿不等同于环境行为,其虽能使公众实施环境行为,但作用强度较低,仅在 0.17~0.19 之间^[8-10]。国内部分经验材料也表明,中国城乡居民的环境意愿很高,但实施环境行为水平较低。由此可见,环境意愿并不等同于环境行为,意愿转化为行为存在一定的条件。

因此,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出发,本研究探讨中国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上的高意愿低行为问题。科学分析这一问题,有利于科学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环境治理体系,有利于调动居民实施环境行为积极性,有利于科学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有利于科学有效治理环境污染。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不断批判“股东至上主义”的基础上演化而来。代表人物弗里曼把利益相关者界定为“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到一个组织实现其目标过程影响的所有个体和群体”^[11]。利益相关者不仅包括股东,还包括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雇员、大众媒体、社会公众。利益相关者理论旨在说明,企业管理是在不断协调各方利益主体的基础上通过资源整合和优化配置从而实现利益最大化,要达到该目标不仅要考虑股东利益,还要把其他利益相关者考虑进来。

利益相关者理论不仅有利于科学管理企业,还为解决其他社会问题提供借鉴,特别是治理环境污染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环境问题的出现和不断恶化是政府、企业、公众、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共谋”的结果,政府唯 GDP 论而轻视环境监管,企业重视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责任,公众只顾眼前消费而忽视长久发展,社会组织力量有限^[12]。治理环境需要多种社会主体共同参与。但是,当前“强国一弱社会”的治理格局仍将延续。弱社会如何变强,如何让更多公众参与环境治理,需要多方力量共同培育。

笔者在实际调查中发现,很多居民之所以有着很高的环境意愿但不参与环境治理,主要在于他们推脱环境治理责任,认为环境治理是政府和企业的事情,或者认为自己力量有限无法有效治理环境问题。可以看出,“弱社会”要变强,还需要多种社会力量来引导和培育。本研究认为,环境治理中存在着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这四个主体。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社会个体的不同特征对公众环境治理参与发生着不同程度影响,对公众环境意愿与行为差距产生不同的作用,既可以加大二者差距,也可以缩小二者差距。

政府和企业能提升居民环境意识,引领和指导居民环境行为^[13]。在环境治理体系中,政府居于主导地位,制定环境政策,整合社会力量,号召公众参与,治理环境污染。有研究指出,部分居民不参与环境治理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认为企业是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政府能有效解决环境外部性,政府和企业应对治理环境污染负有主要责任。若它们不能解决环境问题,居民有限的力量难以发挥作用,难以有效遏制污染问题^[14]。据此,提出假设 1:政府扩大了居民环境“意愿—行为差距”;假设 2:企业扩大了居民环境“意愿—行为差距”。

社会组织是为了实现某种共同目标,将其行为彼此协调和联合起来所形成的社会团体,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表现形式,影响人类多种行为。作为连接政府与公众的中介,社会组织承担着政府环境治理的任务,通过组织化把政府环境治理传达给居民。现有研究表明,大众媒体对居民环境意识与行为均

有着直接的和间接的作用^[15]。大众媒体报道环境污染，传播环境知识，倡导公众参与，还报道政府环境治理实际情况，让居民准确评价政府环境治理工作。基于此，提出假设 3：社会组织对居民参与“高意愿低行为”具有抑制效果；假设 4：大众媒体对居民环境治理参与高意愿低行为具有抑制效果。

心理因素也是影响二者差距的重要变量，主要由环境自我效能感和环境知识构成。现有研究表明，环境自我效能感和环境知识是影响公众环境意识与行为影响最主要的心理因素。环境自我效能感是“人们对环境问题是否有能力立即采取行动所具有的信念”^[16]。环境自我效能感能显著提升公众环境行为^[17]。环境知识对环境意愿与行为的影响不言而喻。没有环境知识，居民难以正确看待环境问题，无法唤醒环境意识，更无法实施环境行为。国内外研究发现，环境知识能够预测居民环境行为，但具体的环境行为需要具体的环境知识来指导，一般性环境知识对具体环境行为的指导作用大大将减弱^[18]。因此，提出假设 5：环境自我效能感对居民“高意愿低行为”具有抑制效果；假设 6：环境知识扩大了居民环境“意愿—行为差距”。

三、研究设计

（一）概念界定与操作化

环境意愿指“人们意识到并支持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程度”^[19]。目前，有单维和多维两种测量方法。单一维度主要使用邓拉普等人的新生态范式量表。由于该量表无法全面涵盖环境意愿，更多研究采用多维方法^[20-21]。根据范叶超等人^[22]的研究，本研究选取环境状况关注度、环境状况认知和环境贡献意愿来测量环境意愿。环境状况关注主要测量受访者对环境问题的总体关注度、环境问题原因和解决办法知晓度，环境状况认知主要测量受访者对汽车尾气、工业排放废气和农药化肥对环境的危害程度的认知情况，环境贡献意愿主要考察受访者是否为保护环境支付更高费用、缴纳更高税以及降低生活水平。

环境行为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概念指人们为满足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对资源和环境所采取的一切行为。狭义概念指人们实施有利于保持或改善环境状况的行为。J.M.Hines 等^[23]把环境行为分为说服行动、消费行动、生态管理、法律行动和政治行动。更多的学者采用二分法来划分环境行为，只是名称有所不同，例如浅层环境行为和深层环境行为、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和公共领域环境行为^[14-15]。本研究环境行为特指狭义概念，是居民采取的有利于环境的行为，并采用二分法把环境行为分为日常环境行为和公共环境行为。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上的“意愿—行为差距”即为居民环境意愿与环境行为二者间的距离。本研究用居民环境意愿与环境行为的差值来反映。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中国人民大学主持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 数据。CGSS2010 调查采取多阶段和分层抽样设计，在大陆所有省级行政单位抽取的 100 个县区以及京津沪广深五大城市中调查 12 000 个家庭，利用 KISH 方法在家庭中随机调查 1 人。本研究主要使用问卷中的环境模块，样本有所减少，最终进入本研究分析数为 3 671 个。之所以使用 CGSS2010，主要在于其是国内目前最科学、最全面涉及了环境意愿、环境行为的微观数据，设计了本研究所需的变量。此外，从当前实际情况看，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高意愿低行为特征依然十分明显。尽管该数据存在着年代陈旧的问题，但不妨碍用于说明和解释中国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高意愿低行为。

（三）变量说明

1.因变量。因变量是环境意愿、环境行为和二者差距。首先，对环境意愿进行信度分析，alpha 系数为 0.795，表明其可信度较高。之后，利用主成分法因子分析法，经最大方差旋转提取了三个因子，依次命名为“环境贡献意愿”、“环境状况认知”和“环境状况关注度”。环境贡献意愿因子载荷均在 0.80 以上，特征值为 2.400，解释性方差为 26.67%；环境状况认知因子载荷均在 0.75 以上，特征值为 2.130，解释性方差为 23.66%；环境状况关注度因子载荷均在 0.80 以上，特征值为 1.803，解释性方差为 20.03%。接着，利用因子分析得到的因子载荷值和特征值计算居民环境意愿的加权值。具体方法为：先依据加权社会进步指数方法对居民环境意愿三个因子进行加权，用上面得到的各子指数的因子载荷乘以对应子指数；再计算每个因子的权重，将每个因子的特征根除以三个因子特征根之和；最后三个因子加权值分别乘以各自比重后相加得到居民环境意愿。最后，对所得居民环境意愿进行标准化处理，让数值落在 1~100 区间内。标准化方法主要依据胡荣等[24]的研究，操作方法如下：转化后的因子值=（因子值+B）× A，其中：A = 99 /（因子最大值—最小值），B =（1/A）—最小值。

环境行为用十个问题进行测量，分别是垃圾分类投放、讨论环保问题、自带购物袋、塑料袋重复利用、环保捐款、关注环保信息、参加环境宣传教育、参加环保活动、自费养护树/绿地、投诉上诉。环境行为的信度系数为 0.719，表明居民环境行为量表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接着，对其进行主成分法因子分析，经最大方差旋转提取两个因子，分别命名“日常环境行为”和“公共环境行为”。日常性环境行为包括前六个项目，因子载荷均在 0.60 以上，特征值为 2.829，解释性方差 28.30%；公共性环境行为包括其余四个项目，因子载荷分别为 0.55 以上，特征值为 1.545，解释性方差达 15.45%。按照上文方法计算了居民环境行为的加权值和标准化值。

公众环境“意愿—行为差距”即居民环境意愿标准值减去其环境行为标准值。

2.自变量和控制变量。自变量由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大众媒体和个体性因素构成。政府方面主要测量受访者对地方政府解决国内环境问题所付出努力的评价。企业方面主要测量受访者对当前环境污染的责任主体选择，选择企业的赋值为 1，其余则为 0。大众媒体主要测量受访者大众媒体使用情况，从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和手机定制消息使用情况进行测量，选项均为五级选项，各项相加得到大众媒体得分。社会组织主要考察受访者当前或以前加入工会，选择是赋值为 1，否则为 0。

环境自我效能感由五个问题组成：像我这样的人很难为环境保护做什么；生活中还有比环境保护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除非大家都做，否则我保护环境的努力就没有意义；许多关于环境威胁的说法都是夸大其词；我很难弄清楚我现在的生活方式是对环境有害还是有利。选项均为五级。信度和效度值分别为 0.571 和 0.713。利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经过最大方差法得到环境自我效能感，因子载荷均在 0.57 以上，特征值为 1.842，解释方差达到 36.83%。问卷中共有十道有关环境问题的客观题，受访者需对其进行判断。本研究将受访者每项判断正确的赋值为 1，其余为 0，各项相加得出环境知识得分。

控制变量主要为受访者的人口特征，包括受访对象的性别、年龄、收入情况、受教育水平、城乡和地区。本研究样本情况见表 1。

表 1：本研究样本情况

变量	变量说明	均值	标准差
环境意愿	受访者环境意愿加权标准值	52.627	17.651
环境行为	受访者实施环境行为加权标准值	33.234	21.031
政府环保	受访者对当地政府环保工作评价状况	2.782	1.068
企业环保	受访者对中国企业环保评价状况	0.285	0.451

工会成员	受访者是否加入工会，加入=1，未加入=0	0.237	0.425
大众媒体	受访者大众媒体使用情况	13.759	4.529
环境效能感	受访者环境自我效能感因子分析值	0.000	1.000
环境知识	受访者环境知识状况，最小值=0，最大值=10	5.123	2.766
性别	男性=1，女性=2	1.527	0.499
年龄	受访者年龄，最小值=17，最大值=91	47.308	15.73
收入对数	受访者个人年收入的対数	8.412	3.075
教育程度	受访者教育水平，最小值=1，最大值=4	2.194	1.082
城乡	城镇=1，农村=2	1.360	0.480
地区	东部=1，中部=2，西部=3	1.722	0.822

四、 研究发现

（一） 公众环境意愿与行为差距状况

对环境意愿和环境行为标准化处理之后，可以比较二者大小。中国居民的环境意愿很高，均值为52.627，但环境行为值却很低，仅为33.234，环境意愿得分比环境行为高出近20个标准值。整体样本上显示出来的特征可能在不同群体中有不同的表现。为进一步检验我国居民环境治理参与上的高意愿低行为特征，本研究以人口学基本特征、社会经济地位、城乡和地区变量来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总体说来，男性、青年、高收入者、高文化程度者、居住在城镇和东部居民有着较高环境意愿得分。除性别外，环境行为在上述维度上同样具有显著性差异，且人口特征上的分布状况与环境意愿保持一致性。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环境意愿对行为的有效性。与这种有效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同群体的二者差异，且这种差异除教育外在其他维度上均具有统计显著性。其中，两者差异最大值出现在西部，最小值出现在东部。可见，即使是在不同群体中，公众环境意愿分值依然大幅高于环境行为。我国居民参与环境治理普遍存在着高意愿低行为特征。

表2：公众环境意愿、环境行为和二者差距的描述性分析

变量	类别	环境意愿		环境行为		二者差距	
		均值	卡方值	均值	卡方值	均值	卡方值
性别	男性	54.042	21.29***	33.616	1.09	20.426	9.24**
	女性	51.358		32.891		18.467	
年龄	青年	56.736	41.97***	35.322	6.38**	21.414	7.35***
	中年	52.194		32.813		19.381	
	老年	49.069		31.926		17.143	
收入水平	低收入	48.239	123.86***	27.738	117.14***	20.501	5.02**
	中等收入	55.361		37.151		18.210	
	高收入	64.545		43.382		21.163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44.708	189.82***	25.157	135.81***	19.551	0.57
	初中	53.211		33.491		19.720	
	高中	56.841		38.090		18.751	
	大学及以上	62.678		43.403		19.275	
城乡	城镇	56.047	262.68***	38.249	413.03***	17.798	36.89***
	农村	46.543		24.312		22.231	

地区	东部	54.465	22.14***	37.995	110.50***	16.470	34.98***
	中部	50.181		26.751		23.430	
	西部	51.184		29.649		21.535	

注：+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这一研究结果与国外相关文献相类似^[6-8]，表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上的“意愿—行为差距”同样存在于中国。由于 CGSS2010 中的环境模块完全采用国际社会调查 (ISSP) 问卷，所以可以用于国际比较。采用上文研究设计中说明的方法，本研究计算了 31 个国家和地区的环境意愿、环境行为及二者差距得分。二者差距最小的是法国，仅为 0.116，德国为 5.502，日本差距值为 6.643，英国是 8.031，加拿大为 9.456。虽然发达国家居民的环境意愿与行为同样存在一定差距，但与中国相比而言，发达国家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行为差距”要小得多，基本保持在 10 个标准值内。二者差距最大的是以色列，高达 32.208，智利是 31.850，俄罗斯为 27.292，南非是 27.563。与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上的“意愿—行为差距”要小得多。但是，同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此方面上表现出的共性明显大于差异性，那就是公众环境“意愿—行为差距”普遍大于发达国家和地区。

(二) 环境意愿与行为差距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构建了环境意识与行为差距的稳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3。

政府对公众环境意愿与行为差距没有显著影响，未证实假设 1。但在城镇样本中，政府环保评价显著缩小了二者差距。这意味着，政府环保行为对居民环境治理参与有一定的“示范”效应。在不同地区，这种效应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尽管表中相关系数显示为负。这表明政府环境治理对缩小二者差距的正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广大民众在关于谁应该是治理环境污染的问题上存在“摔锅”现象。本研究数据显示，高达 49.54% 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应负责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而选择个人的仅有 6.64%。

企业明显扩大了公众环境意愿与行为差距。在农村、东部和中部样本中，企业依然对公众环境意愿与行为差距具有扩大效应。本研究假设 2 得以证实。大部分公众认为企业是当前环境状况日益恶化的元凶，应该为治理污染环境承担主要责任。如果企业不能自觉履行环境保护义务，那么居民往往难以实施更多环境行为。正如“差别暴露理论”所言，恶劣环境状况驱动公众关注环境问题，提高了居民的环境意愿。但是，企业与普通居民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企业的环境治理行为和成果无法影响到居民的环境行为。这就在客观上扩大了公众环境“意愿—行为差距”。

社会组织可明显缩小公众环境意愿与行为差距。这意味着，以工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能有效促进公共实施更多的环境行为，从而缩小环境意愿与行为间差距，证实了假设 3。这一结果在社会组织较多的城镇和东部地区更加显著。尽管在农村和中西部样本中不具有显著性，但是标准化系数依然为负，表明社会组织在缩小二者差距上的有效性。这主要是由工会这类社会组织的“类家庭”属性造成的。在这类组织中，社会个体间相互熟悉，形成了具有某种特殊文化的群体，群体文化对群体内个体具有一定的约束能力，使社会个体有着相似的社会行为。

表 3：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与行为差距的回归分析

变量	全样本	分样本				
		城镇	农村	东部	中部	西部
政府环保	-0.017	-0.036+	0.029	-0.017	-0.014	-0.014
企业环保	0.036*	0.011	0.077**	0.045*	0.082*	-0.029
工会 (否)	-0.056**	-0.062**	-0.005	-0.095***	-0.002	-0.002

大众媒体	-0.054*	-0.089**	-0.032	-0.073*	-0.045	-0.105*
环境效能感	-0.031+	-0.020	-0.052+	-0.010	-0.053	-0.060
环境知识	0.091***	0.054*	0.130***	0.063*	0.099*	0.128**
女性(男性)	-0.048**	-0.036+	-0.061*	-0.050*	-0.065+	-0.019
年龄	-0.057**	-0.074**	-0.021	-0.078**	-0.009	-0.054
收入对数	0.004	0.010	0.004	0.003	0.039	-0.036
教育程度	0.030	0.061*	-0.029	0.034	0.022	0.026
农村(城镇)	0.065**			0.059*	0.146***	-0.015
中部(东部)	0.119***	0.091***	0.139***			
西部	0.080***	0.102***	0.040			
F 值	11.93***	7.93***	4.82***	6.52***	3.85***	1.74***
R Square	0.0456	0.0417	0.0504	0.0390	0.0563	0.0238
N	3761	2350	1321	1892	908	871

注：1. 数字为标准化系数。2.显著性表示：+ $p<0.10$, * $p<0.05$, ** $p<0.01$, *** $p<0.001$ 。

大众媒体能有效缩小公众环境意愿与行为间差距。在全样本，大众媒体的相关系数为负值，且具有统计显著性。大众媒体在城镇、东部和西部模型中具有负向统计显著性，表明大众媒体能有效缩小对该地区居民环境意愿与行为差距。尽管在农村和中部地区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但标准化系数也为负值，表明大众媒体对缩小环境意愿与行为的功能。假设 4 得以证实。

环境自我效能感能有效缩小居民环境意愿与行为间差距，证实了假设 5。在农村、中西部地区，其有效缩小了中国居民环境意愿与行为差距。尽管在城镇和东部，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但标准化系数依然为负值，表明环境自我效能感在缩小了环境意愿与行为差距上的有效性。环境自我效能感之所以能缩小二者差距，主要在于其对公众环境行为的有效提高上。如果居民环境自我效能感较低，居民较高的环境意愿往往难以转化为环境行为。

环境知识明显扩大了居民环境意愿与行为间差距。不同样本中，环境知识对扩大居民环境意愿与行为差距依然具有正向统计显著性。这证实了假设 6。这主要是因为，相对于环境行为，环境知识对居民环境意愿的作用力度更强。然而，居民实施具体的环境行为却需要具备相应的环境知识来指导，一般性环境知识对具体的环境行为不具有太大的指导意义。

此外，环境意愿与行为差距在性别、年龄上呈现负向关系。这主要在于女性和老人有着较低的环境意愿。教育仅在城镇样本具有正向统计性，表明教育在缩小居民环境意愿与行为差距上的局限性。二者差距在城乡上为正值，表明公众环境意愿和行为差距在农村扩大了。在中西部，二者差距的扩大趋势同样明显。这主要在于农村和中西部居民受经济社会条件的限制实施较少环境行为。随着环境污染在全国普遍化，他们的环境意识被唤醒，有着相对高的环境意愿。

五、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公众参与是中国环境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公众环境治理参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2010 年数据，本研究实证分析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高意愿低行为特征及影响因素。现得出两点结论：其一，中国居民环境意愿与行为存在较大差距，公众环境治理参与上高意愿低行为特征普遍存在。其二，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大众媒体和个体性因素对这一特征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企业、环境知识有明显助长作用，而政府、社会组织、大众媒

体、环境自我效能感则有显著抑制效果。

（二）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研究得出如下启示：

第一，政府对公众环境治理参与影响存在一定的“示范”效应。环境治理需要公众参与，但是公众参与往往以政府为坐标。也就是说，政府环境治理行为和结果影响公众环境治理参与。如果政府环境治理的积极效果让普通居民觉得政府是动真格的，那么自己有义务配合，保卫环境治理成效。在环境治理中，政府应起主导作用，引导公众参与，强化居民环境治理责任。政府还要管理企业污染防治，加强企业环保措施，让企业在治理污染中真正发挥作用。政府环境治理成效显著，企业污染防治落实到位，公众环境责任明确，公众环境治理参与才能有所提高。

第二，社会组织在提高公众环境治理参与上的作用不可忽视。社会组织是连接政府与居民的中端环节，承担着政府环境治理的具体工作，在推动环境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相比政府，社会组织与公众的联系更精密，能有效把政府相关环境治理政策传达到每个组织成员，动员能力更强，能组织起个体化的成员力量，共同参与到环境治理中。因此，要大力支持和鼓励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治理，重视环境社会组织培育，给予配套资金，吸引优秀人才，提供宽松的发展环境。

第三，需合理发挥大众媒体在提高公众环境治理参与上的影响力。当前，公众通过大众媒体了解环境污染，知晓政府环境治理效果，了解最新环境治理政策，学习最新环境知识。让大众媒体最大化促进公众环境治理，不仅要科学报道当前中国面临的各种环境问题，提高居民对当前环境污染的认知度，也要报道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举措、成效和不足，让居民知晓政府推进环境治理的实际情况和决心，还要宣传环境治理中具体性环境知识，科学指导居民参与环境治理。

参考文献：

- [1] 何慧爽，2015，《环境质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基于中国东、中、西部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地域研究与开发》，第34期。
- [2] 王丽萍，2011，《河南省环境污染的区域差异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第30期。
- [3] 国家统计局环境保护部，2017，《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 [4] MALONEY M,WARD M.1973, *Ecology: Let's Hear from the People: An Objective Scal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Ecological Attitudes and Knowledge*,American Psychologist,28.
- [5] GIFFORD R D,CHEN A K.2017, *Why aren't We Taking Action? Psychological Barriers to Climate-Positive Food Choices*,Climatic Change, 140.
- [6] KOLLMUSS A,AGYEMAN J.2002,*Mind the Gap: Why do People Act Environmentally and What are the Barriers to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Environment Education Research, 8.
- [7] KIM P T,HOI W C.2017, *Environmental Concern has a Weaker Association with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 Some Societies than Others: A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Perspective*,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53.
- [8] GIFFORD R D,2011,*The Dragons of Inaction: Psychological Barriers that Limit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American Psychologist,66.
- [9] HORNSEY M J,HARRIS E A,BAIN P G et al.2016, *Meta-Analyses of the Determinants and Outcomes of Belief in Climate Change*, Nature Climate Change,6.
- [10] BAMBERG S, MOSER G.2007,*Twenty Years after Hines, Hungerford, and Tomera: A New Meta-Analysis of Psycho-Social Determinants of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27.
- [11] 弗里曼，2006，《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王彦华、梁豪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12] 沈费伟、刘祖云, 2016, 《农村环境善治的逻辑重塑——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第 26 期。
- [13] 袁亚运, 2016, 《我国居民环境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CGSS2013 数据》,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第 30 期。
- [14] 王薪喜、钟杨, 2016, 《中国城市居民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2013 年全国民调数据的实证分析》,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24 期。
- [15] 张萍、晋英杰, 2016, 《大众媒介对我国城乡居民环保行为的影响——基于 2013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第 30 期。
- [16] HUANG H P, 2016, *Media Use, Environmental Beliefs, Self-Efficacy, and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69.
- [17] LEE Y, KIM S, KIM M *et al.* 2014, *Antecedents and Interrelationships of Three Types of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67.
- [18] GRAZHDANI D, 2016, *Assessing the Variables Affecting on the Rate of Solid Waste Generation and Recycl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in Prespa Park*, *Waste Management*, 48.
- [19] DUNLAP R E, 2002, *Michelson W. 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 [20] MARQUART P, SANDRA T. 2010, *Are there Similar Sources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 Comparing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89.
- [21] XIAO C Y, DUNLAP R E. 2007, *Validating a Comprehensive Model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 Cross-Nationally: A U.S.-Canadian Comparison*,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88.
- [22] 范叶超、洪大用, 2015, 《差别暴露、差别职业和差别体验: 中国城乡居民环境关心差异的实证分析》, 《社会》, 第 35 期。
- [23] HINES J M, HUNGERFORD H, TOMERA A. 1987, *Analysis and Synthesis of Research on Responsibl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18.
- [24] 胡荣、李静雅, 2006, 《城市居民信任的构成及影响因素》, 《社会》, 第 26 期。

☆ 作者简介: 袁亚运,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7 级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 李硕人

※ ※

“南京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心理与行为”调查结果发布——给南京市民和党委政府点赞

新冠肺炎疫情目前已经波及全国和全球五大洲, 作为全球关注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为全社会广大人民群众所关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公众的关注、态度、行为方式究竟如何? 对疫情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经济影响认知如何? 今后怎么办? 近日, 河海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组织了“南京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心理与行为”调查。

本次调查由河海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施国庆教授领衔的团队完成, 河海大学长江保护与绿色发展研究院、公共管理学院社会调查中心、亚洲研究中心等协助, 并得到南京市社会科学院及社情民意调查中心支持。

本次调查于 2020 年 2 月 10-11 日进行, 采用滚雪球抽样法, 网上填写问卷, 获得截止 2 月 12 日

零点的有效问卷 847 份，受访者包括填写问卷时位于南京、户籍所在地为南京和工作学习所在地为南京的人员，主要为在读大学生、教师、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等，人员年龄覆盖各个年龄段但主要集中在 18-50 岁，非农业户籍人口占 68%，本科和研究生学历占 91.62%。

南京市民对于控制战胜疫情持积极乐观心态

调查表明，南京市民群众整体上对于新冠肺炎疫情态度为相当关注，对事态发展非常重视，认为疫情影响非常严重。对所在小区、社区、街道的疫情发生情况知情，对确诊、疑似患者普遍表示同情，对于控制、战胜疫情持积极乐观的心态，相信在国家的严格管理下，疫情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市民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事件普遍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和重视，96%表示“非常关注”（60%）和“比较关注”（36%），97%表示“非常重视”（74%）和“比较重视”（23%）。97%的人认为疫情“非常严重”（65%）和“比较严重”（32%）。每天花费 1 小时以上关注疫情相关新闻的人数为 81%。对此次疫情的确诊及疑似患者，72%表达其应该得到社会各界帮助，35%表达了极大的同情心。群众对居住所在小区/居民点、社区、街道内存在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居家进行医学隔离观察人员情况基本上都了解，普遍认为患者值得同情、应该得到社会各界关爱。对打对抗赢新冠肺炎战役，89%表示“非常有信心”（57%）和“比较有信心”（32%）。

九成以上市民积极响应政府防疫政策措施

调查表明，97%受访者认为疫情“非常严重”（65%）和“较为严重”（32%）。获得信息的主要途径为微信、微博、抖音等新兴媒体（42%）和报纸、电视和广播等传统媒体（33%），亲友（15%）、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7%）传播发挥作用。就疫情进行沟通的群体依次为亲属（93%）、朋友（86%）和邻居（35%）。受访者对疫情知识有比较正确和客观的认知。主要关注新冠肺炎疫情的形成机制、防范办法和公布的受影响城市信息和对应措施。

绝大部分受访者（92%）及时调整了春节假期的出行和聚会计划，积极响应政府防疫政策措施，大幅度消减了春节期间的聚集活动次数（98%），调整个人和家庭生活方式（99%），春节期间网购行为呈复杂状态，50%受访者明显减少，但是显著增加和有所增加的也分别占 15%、15%，原因或由于改变出行或聚会计划而家中储备不足，部分家庭生活（34%）、工作（10%）、收入（22%）和心理（24%）受到一定负面影响，但是仍在可承受范围之内。

九成以上市民认为政府防疫措施积极有效

对党委政府防疫措施，91.3%被调查认为南京市采取的措施是有效的，且对于南京市采取的 21 项措施中，大部分被调查都知晓且认为所在基层社区和地方政府落实到位，南京市的基层社区和组织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对防疫措施的落实发挥了重要作用。调查表明，南京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防疫措施且防疫措施的公众知晓和接受程度很高，很有效。

对于下一步本地防控和社会经济恢复工作安排，96.93%的受访者认为需“酌情采取其他有必要的措施”，96.34%认为“仍然需要继续防控，直至疫情完全结束再恢复工作和正常生产生活和学习”。56.08%认可“应该抓紧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和学习”。调查表明，受访者希望政府根据疫情形势变化灵

活决策，做到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秩序恢复“两手抓，两手硬”。

市民希望疫情控制后尽快恢复生产生活和学校教育

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社会经济影响感知，市民认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影响最大（4.87/5），其次是小微企业倒闭、职工下岗失业（3.70/5），境外投资、贸易活动减少、效益下降（3.63/5）、国家财政耗费、经济损失、国力受到影响（3.59/5）、大中型企业亏损，绩效下降（2.73/5）、应对流行病防控运行机制完善（2.58/5）名列前六。受访者认为疫情对经济社会直接冲击比较严重。

调查表明，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后社会经济秩序恢复问题，市民关注较多的主要包括城际公共交通恢复正常运行（3.81/5）、学校恢复正常和学生正常上学（3.80/5）、城市内部公共交通恢复正常（3.78/5）、餐饮商贸旅游业恢复正常（3.70/5）、居民日常生活恢复正常（3.63/5）、全社会恢复正常运行状态（3.09/5）、工业企业单位生产恢复正常（3.05/5）等方面。大家普遍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只是暂时，希望能在疫情控制之后尽快恢复城市交通、生产生活和学校教育。

两手抓两手硬，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从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南京市民对疫情防控十分关注、重视，认为疫情影响严重，充分认可党委政府制定的政策和采取的防控措施行动，积极认真地参与疫情防控，通过多种媒体关注疫情和学习防疫知识，及时调整自己和家庭的春节期间的出行、聚会活动和日常行为方式。南京市在疫情防控应对方面制定了大量比较科学的政策，采取了卓有成效的措施和行动，得到广大市民的充分理解和大力支持，全民动员参与防疫抗疫，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社区和群众团结协作，成效显著，既有效地防控疫情传播和形势恶化，又保证了城市社会经济的基本正常运行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基本保障。为此，需要给南京广大市民和南京党委政府大大地点个赞！

与此同时，广大市民十分关注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高度关注疫情后的经济社会恢复。目前，如何实现“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发展”两手抓，变危为机，实现南京既稳又快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亟待研究决策和采取科学防疫的行动。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一指挥下，在江苏省委省政府和南京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南京市民齐心协力，一手抓疫情统一精准防控工作，一手抓城市经济社会秩序恢复，两手抓两手硬，一定能够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作者：施国庆，河海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南京市社会学会会长、江苏省政府参事室特聘研究员）



婚姻 与组织

生命历程视角下农家子弟的婚恋困境研究*

徐依婷

摘 要：以往青年婚恋问题研究对农家子弟这类特殊群体关注不足。本文以“90后”农家子弟为研究对象，基于生命历程理论视角来探讨这一群体的婚恋困境。研究发现，“90后”农家子弟的婚恋困境是其生命历程累积劣势的结果。家庭背景与教育背景双重劣势的农家子弟在城市婚恋市场中处于结构性弱势地位，其面临的婚恋困境表现为：“过度单身”与恋爱经验缺乏；教育同类匹配与择偶范围狭窄；阶层内择偶与择偶难度增加；社会资本缺乏与择偶机会有限；经济资本薄弱与婚姻市场地位边缘。农家子弟的婚恋困境与其生命历程中渗透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高校扩招与学历贬值、社会阶层固化风险加大等社会结构性因素有关。

关键词：农家子弟 婚恋困境 生命历程

一、问题的提出

青年的婚恋困境问题一直是学界的研究热点，目前相关研究主要以“打工青年”“农村光棍”为研究对象，而较少关注同样出身农村的农家子弟。本研究中的农家子弟是指出生于农村，通过高考招生进入高校就读，毕业后在城市工作的农村籍大学毕业生。在传统社会，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的农家子弟被视为“天之骄子”，是婚恋市场中的“香饽饽”。计划经济时期，农家子弟考上大学后能改变户籍身份，得到稳定的工作和单位分配的福利住房，结婚成家的物质基础依托单位得到妥善解决。1999年实施高校扩招政策以后，越来越多的农家子弟进入大学，但他们向上流动的过程并不顺利。尤其是“90后”农家子弟，他们通常就读地方普通高校，就业质量低，毕业后居住在城市边缘地区的群租房，“大学生农民工”“蚁族”是他们新的身份标签^{[1][2]}。农家子弟通过教育这一狭窄的向上流动的通道获得自致性社会地位，但他们往往被贴上“凤凰男”“凤凰女”的污名标签，在城市婚恋市场中遭遇先赋

* 基金项目：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我国互联网新型消极情感的形成机制与治理研究》（项目批准号19CSH038）
本文已刊发于《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01期。

性家庭出身所引致的身份歧视。加上在当今社会，婚姻的功利属性凸显，拥有城市住房、轿车成为青年谈婚论嫁的门槛。教育背景劣势、收入水平不高、缺乏家庭经济支持、在城市独自打拼的农家子弟毕业后难以在城市立足，遑论结婚成家。农家子弟肩负着农村家庭向上流动的希望，他们在城市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关系到农村家庭对社会公平的感知，而婚恋状况是检验个体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农家子弟的婚恋困境问题值得关注与研究。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视角

所谓婚恋困境，是个体在婚姻进入、婚姻缔结、婚姻生活等阶段出现的由于家庭、社会与个人原因导致的问题。本文主要关注婚姻进入阶段，渴望恋爱成家的个体因客观原因导致的婚配难。从研究内容来看，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农村青年婚恋困境的表征与原因。从研究对象来看，主要聚集在打工青年、“农村光棍”等群体，而对同样出身农村的农家子弟研究较少，目前仅有刘荣、张学东以及部分年轻学者关注到农家子弟的婚恋问题^{[3][4][5]}。从研究视角来看，宏观层面的讨论主要采取人口结构、婚姻市场理论、社会结构等视角来阐释农村青年处于婚恋困境的原因。人口结构论认为适婚男女性别比失衡导致农村青年婚配困难；婚姻市场理论认为婚姻资源的全国性流动挤压了缺乏资源、竞争力弱的农村青年的婚配机会；社会结构的视角指出婚姻资源在社会经济分化和社会分层的压力下在不同阶层间呈现不平衡分布。

在微观进路的研究中，学者指出个体成功婚配是代际合力的结果^[6]，影响青年婚配既有个体层面的教育水平、收入、职业、社会地位等因素，也有家庭结构、经济状况、社会网络等因素^{[7][8]}。上述研究既丰富又深刻，为考察农家子弟的婚恋困境提供了重要借鉴。这些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缺乏历时性的视角。当个体面临婚恋困境时，其婚恋问题的确取决于当下静态的个体、家庭等因素，但是上述因素也受到个体生命历程的影响；二是缺乏在制度与结构限制下个体与外在社会结构关联的考察，而生命历程视角为弥补上述不足提供了解决思路。

生命历程理论诞生于 19 世纪中期的美国，所谓生命历程是指人的一生中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出现的，受到文化和社会变迁影响的年龄、角色和生命时间序列。生命历程理论强调个人的生命历程是社会结构与个人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其基本原理有：一定的时空中的生活原理、相互联系的生活原理、生活的恰当时间原理、个人能动性原理等^[9]。近年来，该理论视角多应用于考察老年人贫困问题、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独生子女家庭问题等，运用其分析某一群体的婚恋问题的研究不多见。采用生命历程理论考察婚恋问题的优势在于：一是纵向地从个体生命历程中辨析宏观的社会结构、社会变迁对某一群体婚恋困境的影响；二是它超越了宏观与微观，综合了结构主义与个体主义，进而对婚恋问题进行分析。基于此，本文以生命历程理论作为考察农家子弟婚恋困境的理论工具，通过分析农家子弟在社会历史和社会结构下的成长经历，审视农家子弟婚恋困境的表现，探讨形塑农家子弟婚恋困境的社会结构性因素。

研究采用质性研究的方式，相关田野资料主要来源于 S 省 D 县 Y 中学高 2009 级 X 班。获取资料的方式主要是访谈，访谈时间为 2018 年 12 月、2019 年 6 月。X 班共有学生 52 人，其中留守儿童占比高

达 96%，高考时本科上线率为 92%，重点本科上线率为 15%。该班学生大部分遵照 2009 年高中毕业、2013 年大学毕业，毕业后工作、成家的社会时间表生活。

表 1：X 班学生婚恋状况与详细情况

婚恋状况	详细情况
已婚 (28 人)	男性 14 人 (50%)、女性 14 人 (50%) 重点本科 7 人 男性中父母资助婚房、婚车的有 10 人 男性中为家中唯一儿子的有 13 人
未婚 (20 人)	男性 14 人 (70%)、女性 6 人 (30%) 重点本科 1 人 男性中父母有能力资助婚房、婚车的有 1 人 男性为家中唯一儿子的有 4 人
恋爱中 (4 人)	全为女性 重点本科 0 人

本次研究选择了 X 班 13 位单身的“90 后”农家子弟作为访谈对象，男性以“M”编码，女性以“F”编码。本文讨论婚恋困境问题时未将性别的因素单独列出来讨论，受“梯度择偶”文化规范的制约以及婚嫁成本主要由男方家庭承担的经验现实的影响，在农家子弟内部，男性面临的婚恋困境问题远比女性严重。

表 2：访谈人物情况简介

编号	性别	年龄	学历	职业	恋爱情况
M1	男	30 岁	普通本科	建筑工程师	未恋爱过
F1	女	29 岁	普通本科	医生	未恋爱过
M2	男	29 岁	普通本科	销售	未恋爱过
M3	男	29 岁	普通本科	IT	未恋爱过
M4	男	30 岁	211 本科	建筑工程师	未恋爱过
M5	男	28 岁	普通本科	销售	未恋爱过
F2	女	29 岁	普通本科	IT	未恋爱过
F3	女	28 岁	普通本科	IT	未恋爱过

F4	女	29 岁	普通本科	医生	未恋爱过
F5	女	29 岁	普通本科、211 研究生	销售	恋爱 1 次分手
F6	女	29 岁	普通本科、普通研究生	药品实验员	恋爱 2 次分手
M6	男	28 岁	普通本科	建筑设计师	恋爱 2 次分手
M7	男	28 岁	普通本科	培训教师	恋爱 3 次分手

三、“90 后”农家子弟的生命历程描述

根据个体成长发展的一般过程，本文将“90 后”农家子弟的生命历程分为“童年”“求学”“就业”“成家”四个阶段。

（一）童年：贫困家庭与留守经历

生命历程理论的“一定时空中的生活”原理强调出生在不同年代的人所面临的社会情境与社会限制和所拥有的社会机会是不一样的。出生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农家子弟，童年时期的共同生活环境是贫困家庭。1982 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的生活水平相对以往有所提高，但远算不上“富裕”，“没怎么吃过肉”的贫困状况在“90 后”农家子弟的童年时期较为普遍。贫困不仅表现为经济资本的缺乏，也表现为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缺乏。在贫困的生活环境中，农家子弟能够获得的资源和机会极其有限，因而他们往往缺乏自信，行为表现局促，心理自卑，缺乏安全感，这限制了个体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

“我妈说她嫁过来的时候，没过几天家里就不见一件东西，原来结婚时候的桌子、板凳、水壶都是借的别人家的。小时候，基本没怎么吃过肉，更别提零食了，也很少买衣服。爸爸妈妈常为钱的事情打架，那时我爸一点不勤快，性格还比较犟。虽然爸妈没有明说家里没有钱，每次交学费也都是按时凑齐给我，但是我还是感觉得到（贫穷）。”（M1）

“90 后”农家子弟童年时期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其留守经历。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打工潮兴起，大量农民离开农村，父母外出致使农家子弟所在家庭的家庭结构改变、家庭社会化功能弱化。留守经历成为农家子弟生命历程中持久的“心灵烙印”，与父母依恋关系的中断，对农家子弟的情绪发展、自我认同、社交能力等方面均有负面影响，当他们步入成年后，在与异性交往、组建家庭时面临着心理上、能力上的障碍。

贫穷与留守，让“90 后”农家子弟相对同龄城市青年更早“懂事”。“懂事”不仅是底层家庭父母的教育期待^[10]，也有个体自身的“阶层自觉”的意涵^[11]，“90 后”农家子弟明白自身家庭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所受到限制，萌发改变命运的主体意志。在向上社会流动渠道狭窄的农村社会，读书是改变个人和家庭地位的主要出路。

（二）求学：力求改变命运与结构资源约束

生命历程理论的“相互联系的生活原理”指出，个体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每代人注定要

受到他人生命历程中所发生的生活事件的重大影响。“90后”农家子弟在求学过程中的重要他人有父母和教师等。虽然自1999年开始,政府要求全面贯彻实施素质教育,但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仍流行的是“成绩压倒一切”的应试教育模式。在教育资源有限的约束下,父母以及老师往往要求农家子弟以升学为目标,“智”以外的诸多方面难以兼顾而不得不舍弃^[12]。父母、老师反复灌输的“读书改变命运”的信条,最终内化为农家子弟的精神信仰,激发出其力求改变命运的阶层能动性^[13]。

1999年高校扩招后,全国高校招生人数逐年攀升,农家子弟上大学的机会增加。2000-2012年农村本科生比例从48%上升至59.1%,但就读“211”“985”项目高校的比例仍然偏低¹。招生规模的扩大,并没有公平地增加各阶层家庭子女上重点大学的机会,以北京大学为例,2000-2010年间招生的农村新生仅占10%,实施贫困地区专项招生计划后,2013年北大农村新生比例上升至14.2%,而上世纪80-90年代这一比例约为30%。囿于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限制,越来越多的农家子弟进入普通高等院校。进入大学后,农家子弟开始对阶层分化、贫富差距有了切身的体验。这一群体的共性是不愿主动积极地结交他人,人际交往呈现“内卷化”特征,这些交往特征其不利于其择偶。同时,农家子弟普遍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业,在求学过程中,他们错过了可能遇到的爱情。

“上大学时大家条件都不相同,我就和跟我家里条件差不多的玩。宿舍一个女孩是富二代,人家天生投胎就投得好。而我是农村的,父母没有文化,也没有什么钱。看着人家逛街、谈恋爱,心里还是会有点想法的。我能跟她一样吗?不能,一是自己不会打扮,很挫,没有人看得上我,二是我想着考试、毕业、工作的事。”(F2)

(三) 就业:教育背景劣势与就业市场地位弱势

高校扩招后大学本科生文凭严重贬值,大学生就业竞争异常激烈。毕业于非“211”的普通院校、表达能力不强、社会资本缺乏的“90后”农家子弟在就业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在早期生命历程中,农家子弟把时间、精力花在以“智”为核心的课程上,注重应试技能的提高,而相对忽视了非认知能力的培养,这限制了他们的就业与职场晋升。加之,农家子弟的先赋性社会资本在超过乡土社会的边界时能发挥的能量有限,就业时所能获得的社会支持极其有限。数据显示,农家子弟就业率(69.5%)与城市籍大学生的就业率(87.7%)相差18.2个百分点²。在就业质量上,农家子弟就业地区、产业与行业、单位性质和月薪等方面都不如城市籍大学生^[14]。在教育成为获取社会阶层主要手段的现代社会,教育获得在各阶层的不平等分布,在一定程度上预演了社会阶层的再生产^[15]。为顺利就业,农家子弟只能策略性地选择工作环境差、收入水平低、职业声望低的工作,这决定了农家子弟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进而影响到他们在婚恋市场中的地位。起初农家子弟对于职业发展颇有抱负,但意识到凭一己之力难以改变现状后,意志逐渐放松,对恋爱、结婚也感到无望,呈现“制度性放弃”。

“校园招聘时我面试表现不好,加上家里又没有什么熟人在医药行业。我就选择了在S市规培,

¹ 数据来源于2013年10月15日时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所作“努力让全体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报告。

² 数据来源于中国社科院《社会蓝皮书: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当时是希望规培结束后能留在 S 市中心医院。后来才知道成绩不重要，重要的是关系和人脉。规培结束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有个偏远山区的医院承诺给较高的报酬，可是自己觉得不甘心。后来实在是受不了（待业在家）压力，来到这个医院，没有编制，担心自己表现不好，随时可能走人，因而一直战战兢兢。”（F4）

（四）成家：经济压力与身份歧视

社会文化规定了生命历程的标准化模式，人们在社会中必须按照社会时间表的指示参与社会生活，违反这一文化规范，则会遭遇社会的“惩罚”。恋爱是现代社会个体结束单身状态，进入婚姻的必要环节。“90 后”农家子弟在成长过程中恋爱经验少，甚至部分是零经验，被戏称为“母胎 Solo”。部分农家子弟曾经有过恋爱经历，甚至到谈婚论嫁的地步，最后却以分手告终。除了性格不合的因素外，大部分是在彩礼、婚房等涉及金钱的事项上发生冲突，不欢而散。有研究发现，“90 后”大学生中有 68.5% 认同拥有住房是结婚的前提条件^[16]。而近年来，城市商品房房价高企，这给教育背景劣势、收入水平不高、缺乏家庭经济支持、在城市独自打拼的“90 后”农家子弟带来较大的经济压力。

“女朋友要求结婚有房有车，其实也是最基本的要求了。我家里有弟弟、妹妹，父母供养我们三人读书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很少攒下钱。毕业以后，换了几个工作，别谈专业对口了，只求生存。谈了三个女朋友，有的因为性格不合（分手），上一个快到谈婚论嫁了，因为彩礼、婚房的事情起了矛盾。”

（M7）

除了经济压力之外，农家子弟在婚恋时还常常面临着身份歧视。在城市相亲角中，农家子弟处于相亲鄙视链的最底端。在网络空间中，常常有题为“嫁人不嫁凤凰男”“嫁错凤凰男的悲惨生活”等类似帖子控诉城市女嫁给“凤凰男”的血泪，阅读量多达十万以上。尽管这些网帖反映的往往是某些极端个案，经过网络媒体的发酵与传播后，农家子弟这一群体被贴上了污名标签，使得他们在城市婚恋市场中面临着先赋性身份歧视。

当个体无法按照社会时间表去参与社会生活时，会遭到社会的“惩罚”。在适婚年龄迟迟无法进入婚姻的单身“90 后”农家子弟遭遇亲友轮番催婚，他们的原生家庭在村庄中承受着舆论压力，在村庄里“抬不起头”。

“父母跟我聊天，只记得第一句开头和最后一句该找媳妇了，中间完全在绕，根本记不住。现在我们村里跟我年龄差不多大的人就几个还单着，我爸妈更是感到抬不起头。人家外出打工的早就结婚，生了俩孩子了，我这连结婚对象还没有影儿”。（M1）

综上，我们描绘出典型的“90 后”农家子弟的生命历程。生命历程理论认为，人们的生活经历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生活轨迹，较早发生的生活事件会对后来的生命历程具有重要影响，甚至会导致个人生活轨迹的转折。农家子弟的婚恋困境是其生命历程劣势累积的结果。农家子弟力求改变命运但受到外在资源与社会结构的钳制，虽实现了大学梦，然而他们大多就读普通高等院校。教育获得的阶层不平等预演了社会阶层的再生产。农家子弟在文凭贬值的就业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决定了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进而影响其在婚恋市场中的地位。在婚备竞赛中农家子弟面临较大经济压力，而城市

婚姻市场的身份歧视更加重了其婚恋困境，在适婚年龄，农家子弟迟迟无法进入婚姻，遭遇亲友轮番催婚以及村庄舆论“惩罚”。农家子弟的单身状况并非主动选择，而是客观结构限制的结果。他们期待姻缘，但也意识到“缘分没到，是一种心理安慰和逃避问题”（F1）。而所谓“缘分”，深嵌在宏观社会结构之中，与个体在整个社会中所处的社会位置、权力、身份、地位有关；从微观来看，“缘分”隐藏在个体的生命历程之中，早前的生活事件影响到后期个体的婚恋实践。

四、生命历程视角下农家子弟的婚恋困境

为完成从农村到城市的阶层旅行，农家子弟及其家庭付出了较大的代价。然而这一向上流动的过程并不顺利，“90后”农家子弟并未如愿在城市获得理想的社会地位，他们在适婚年龄面临着婚恋困境。

（一）“过度单身”与恋爱经验缺乏

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农村家庭代际向上流动的难度远远高于城市家庭。农家子弟向上社会流动付出的代价之一是“过度单身”，“过度单身”是生命历程推迟的产物^[17]。求学时，“90后”农家子弟按照父母、老师的要求，“将心思都放在学习上”。毕业后，为在城市扎稳根，农家子弟一心扑在事业上。在适合婚恋的生命时间，农家子弟更注重前程（学业与事业），致使社会时间挤压生命时间，进而出现“过度单身”的状况。偏离前程这一目标，农家子弟将感到生存焦虑，这种焦虑的深层根源来自于农家子弟对自身家庭在社会结构中所处位置的阶层自觉。对农家子弟而言，爱情对于他们来说是“奢侈品”，他们更关注较为“实际”的生活目标，因而在适合婚恋的生命时间错失缘分。

“别人的青春里才有告白、恋爱与分手，而像我这种，高中只有做不完的作业。上大学以后，也没有心思谈恋爱。父母打工供我上大学，我已经很幸运了，怎么能浪费时间。多想想怎么搞到奖学金，才实际一些。毕业以后也是天天忙着工作，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谈恋爱，拖着拖着就到了这个岁数。”（M2）

（二）教育匹配与择偶范围狭窄

择偶不仅体现个体的意志，同时也受到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制约。“90后”农家子弟在城市求学和工作时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熏陶，他们的婚恋诉求带有明显的都市社会的浪漫气息，这表现在内化“读书改变命运”的农家子弟择偶时倾向于教育同类匹配，期望“灵魂伴侣”。同时，教育作为重要的社会分层变量，代表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乃至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资源^[18]。夫妻间教育匹配是其经济地位匹配的关键一环，也是婚姻幸福的基石^[19]。受教育程度相当，夫妻之间价值观、人生观更倾向于一致。如果双方教育程度差距太大，夫妻之间难以进行精神交流，进而降低起婚姻质量。农家子弟这一择偶诉求遭遇“梯度择偶”文化规范制约，两者间的冲突造成农家子弟择偶范围相对狭窄，加剧了其婚恋困境。

“还是要找大学本科以上的，虽然说学历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人的智商、能力，但是学历真的能说明一些东西。两个人完全不在一条线上，无话可说，日子可真难熬。我周围有一些从培训机构出来做IT的，有的专科都没有拿到毕业证，工作间交流都成问题，更别说是恋爱结婚了。”（F3）

（三）阶层内择偶与择偶难度增加

婚姻既是两性结合的社会制度，也牵涉到双方家庭社会地位、资源、财产的组合。依据现代化理

论，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婚配中的先赋性因素的影响降低，诸如教育、职业等自致性因素的作用上升。而在当下中国社会，婚姻匹配仍然呈现为“阶层内择偶”与“同类匹配”的特征，“门当户对”的传统婚姻匹配文化仍规范着个体的婚恋实践^[20]。在“90后”农家子弟的生命历程中，农家子弟表现出“懂事”的心理结构，对自身以及家庭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有清醒的认知。上大学时，农家子弟对阶层分化有了切身的体验。在成家阶段，对方家庭的阶层位置、经济状况始终是农家子弟择偶时考虑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医疗、教育、养老事务都主要属于家庭内部责任的中国社会，农家子弟既期望婚姻资源上双方能够“互补”又明白受“梯度择偶”的社会文化影响，“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多招致污名。对于他们来说，理想的婚配对象是同样出身于农村、拥有本科学历的异性，这增加农家子弟寻找配偶的难度。

“我还是希望有大致相同的背景，不然大家会很尴尬。最好跟我一样、大学毕业，从农村出来的，大家差异不会太大。家里父母亲戚介绍的相亲对象都是在工厂打工的女孩，高中都没有读完，学历差的太多了，肯定处不来呀。也有本科毕业，普通的小学老师，可是人家又看不上我。”（M5）

（四）社会资本缺乏与择偶机会有限

现代社会，个体择偶主要有自由相识和他人介绍两种途径。无论哪种途径，前提均是个体及其家庭拥有充足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量越多，个体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越强，择偶时可供选择的对象越多，成功婚配的机率就越大。社会资本是个体在生命历程中不断进行社会互动进而建构的产物。上大学时，农家子弟在人际交往方面呈现“内卷化”特征，忽略了积攒社会资本。工作后，农家子弟忙于工作、结交异性的机会较少，因而农家子弟通过社会互动获得的自致性社会资本不足。而农家子弟的先赋性社会资本在超出乡土社会的边界时发挥的作用有限。先赋性社会资本能量有限与自致性社会资本不足，导致农家子弟结识异性的机会少，因而感到没有合适的“缘分”。处于适婚年龄的他们只能通过传统的相亲这一方式来结识另一半，但相亲的成功率往往极低。

“没有缘分呐。上学时没有觉得（恋爱）这个事很重要，那时候也就同宿舍的人关系不错，其余班上同学就是点头之交。工作之后才发现合适的对象真的太难找了。家里介绍的都是一言难尽。相亲过很多次，每次都不靠谱，越相亲越失望。”（F4）

（五）经济资本薄弱与婚恋市场地位边缘

当下社会，婚嫁成本高昂，往往需要代际合力才能支撑起成立一个新家庭所需的经济基础。农村家庭供养子女上学，已耗费了大量经济资本，到了子女谈婚论嫁时，他们难以继续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加之“90后”农家子弟自身就读地方普通高校，就业质量差、收入水平低，刚毕业后工作不稳定，难以在短短几年就建立起结婚所需的经济基础。教育背景劣势、收入水平不高、缺乏家庭经济支持、在城市独自打拼的农家子弟在婚备竞赛时处于落后位置，在城市婚恋市场中自然处于弱势地位。

“家里的钱都用来供我跟哥哥读书了，毕业了怎么好意思再问父母要钱呢！爸爸早些年在外面打工做建筑，下了太多苦力，一身都是病。他们现在就挣点养老钱，有时候挣得钱还不够药费。要想在CD市买房，靠我自己攒的钱远远不够。相亲，人家姑娘一听，没房没车，扭头就走了”。（M4）

综上可知，农家子弟的婚恋困境并非仅仅受当下个人性因素的影响，而与个体在特定的社会历史与社会结构下成长的历程有关。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农家子弟为实现向上社会流动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在适合婚恋的生命时间，他们采取延迟恋爱的策略进而导致恋爱经验缺乏与“过度单身”。在择偶诉求上，务实、理性且受重要他人影响的农家子弟倾向于教育同类匹配，这一择偶诉求使得其择偶范围相对狭窄。对自身家庭社会阶层有着清醒认知的“懂事”的农家子弟，明白跨越阶层寻找对象可能遭遇的身份歧视与未来婚姻中可预期的问题，因而倾向于阶层内择偶，这增加了他们寻找配偶的难度。在择偶机会上，因先赋性社会资本能量有限与自致性社会资本不足致使农家子弟的择偶机会较少，而通过相亲进入婚姻的成功率往往极低。农家子弟自身因教育背景劣势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加之原生家庭贫困，使得农家子弟在婚备竞争中往往处于落后位置，在城市婚恋市场中处于边缘地位。

五、结论与讨论

从“天之骄子”到“大学生农民工”，农家子弟社会地位的转变使得他们的婚恋状况受到影响。作为同样出身农村的青年群体，“90后”农家子弟与打工青年有着不同的生命历程，他们的婚恋问题带有其自身成长历程的烙印。本文基于生命历程理论的视角，通过分析“90后”农家子弟在社会历史和社会结构下的成长经历，考察了农家子弟婚恋困境的表现，探讨形塑农家子弟婚恋困境的社会结构性因素。研究发现，农家子弟的婚恋困境是其早先生命历程劣势累积的结果。从农家子弟婚恋困境的形成过程来看，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高校扩招后学历贬值、社会阶层固化等社会结构性因素渗透其中。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制度背景下个体发展机会不均等，与城市青年相比，农家子弟受教育的环境更为恶劣，升入重点大学的机会更少，向上社会流动所付出的代价更大。作为农村社会的教育精英，“90后”农家子弟承载着改变自身以及家庭命运的期望，然而缺乏社会资本、教育背景劣势的他们在城市社会难以立足，遑论结婚成家。同时，在社会阶层固化风险加大的背景下，农家子弟即使获得大学学历这一自致性成就依然难以克服先赋性出身所带来的身份歧视，这从现实社会中对“凤凰男”的大肆讨伐可见一斑。

采取生命历程的视角考察农家子弟的婚恋困境，为考察农村青年婚恋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维度，拓宽了农村青年婚恋问题的研究范畴，同时为静态的农村青年婚恋研究注入了生命时间与社会时间的维度，形成了动态的、历时性的研究进路。此外，生命历程理论下的农家子弟婚恋困境研究通过考察农家子弟的生命历程，将微观层面的个体、家庭要素与宏观层面的城乡二元社会体制、教育制度改革、婚恋市场导向变化等社会结构关联起来，有助于辨识造成当下某一群体处于婚恋困境的深层根源，推动了对青年婚恋困境问题的理解。

参考文献：

[1] 孙文中，2016，《教育流动与底层再生产——一种大学生“农民工化”现象的研究》，《广东社会科

学》，第4期。

- [2] 傅剑、陈碧霞，2014，《“蚁族”的群体特征、诉求与风险》，《当代青年研究》，第2期。
- [3] 刘荣，2015，《“凤凰女”的存与婚姻困境的社会学分析》，《当代青年研究》，第5期。
- [4] 张学东，2009，《对“凤凰男”与“孔雀女”婚姻问题的社会学分析》，《中国青年研究》，第4期。
- [5] 李鹏桀，2016，《给予与获得：农村籍大学毕业生择偶中的匹配与交换》，郑州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 [6] 黄佳鹏，2019，《代际合力、婚姻市场与婚配梯度——以鄂西茅坪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为例》，《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 [7] 陈讯，2018，《婚姻要价、代际支持与农村青年城镇化——基于晋西北W村调查》，《中国青年研究》，第2期。
- [8] 王庆明、王朝阳，2019，《人情冷暖与亲属实践：中国乡村婚姻困境的一种解释》，《开放时代》，第2期。
- [9] 李强、邓建伟、晓箴，1999，《社会变迁与个人发展：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社会学研究》，第6期。
- [10] 程猛、康永久，2018，《从农家走进精英大学的年轻人：“懂事”及其命运》，《中国青年研究》，第5期。
- [11] 林晓珊，2019，《境遇与体验：一个阶层旅行者的自我民族志》，《中国青年研究》，第7期。
- [12] 李飞、杜云素，2019，《资源约束下的苦难与超越：高学业成就农村青年的求学史分析》，《中国青年研究》，第7期。
- [13] 王宁、马莲尼，2019，《目标导向与代际社会流动——一个能动性的视角》，《山东社会科学》，第4期。
- [14] 肖富群、张登国，2015，《农村与城镇大学生初次就业的差异——兼论农村大学生的就业特征》，《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 [15] 顾辉，2010，《教育：社会阶层再生产的预演——一项对H市两所高中的研究》，上海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 [16] 胡建国、李伟，2019，《90后：结婚必须有房吗——基于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的研究》，《中国青年研究》，第6期。
- [17] 时广军，2018，《“过度教育”与“过度单身”——当代青年社会流动的代价》，《中国青年研究》，第4期。
- [18] Blau Peter M. and O.D. Duncan.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Wiley Free Press.
- [19] 王晓磊、杨晓蕾，2018，《夫妻教育匹配对婚姻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社会性别的视角》，《西北人口》，第4期。
- [20] 张翼，2003，《中国阶层内婚制的延续》，《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 作者简介：徐依婷，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018 级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杨静静

家族企业接班人建立权威的路径研究*

任宇东 王毅杰

摘要：以Q市的A和B企业为案例，结合“接班模式—合法性基础—权威路径”的分析框架，探究家族企业接班人建立权威的路径及背后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按照涉入管理企业过程的差异性，家族企业的接班模式分为基层模式和空降模式；不同的接班模式有着各自不同的合法性基础，形成建立权威的不同路径；继任者的权威是在接班过程中建立的，是一个获得合法性的过程，实质是通过参与经营管理来实现对企业的有效控制，与企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研究不仅为家族企业传承的差异性提供了解释，也为家族企业接班人培养、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家族企业接班人 合法性基础 权威路径 基层模式 空降模式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企业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壮大，已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它们大多成立于上世纪80~90年代，其中，80%左右的民营企业是家族企业。数据显示，未来10年，将会有近300万的家族企业面临传承问题，家族企业已进入代际传承的关键期（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家族企业委员会，2015）。与此同时，中国也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阶段，以传统制造业为主导的家族企业能否顺利完成产业转型与升级是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范晓光、吕鹏，2018）。因此，家族企业能否顺利传承交接，不仅关系到企业自身的长远发展，还关系到国民经济、社会稳定等问题。

家族企业的“传承交接”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决策，还是一场复杂的“接力赛”（储小平，2004；陈凌等，2012）。这一交接过程不仅是企业所有权的交接，也意味着接班人权威的更替与重建，交接过程中权威的改变、适应和巩固是决定传承能否成功的核心因素（盖尔西克，1998）。研究发现，中国的

* 本研究获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社会治理中的心态问题研究”（2017ZDAXM004）与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不同制度背景下乡村企业家的行动过程研究：以S省辛村为例”（KYCX18_0500）的资助。本文已刊发于《青年研究》，2020年03期。

家族企业在传承过程中普遍面临着“传承之困”，这种困境的首要表现是家族企业接班人在短期内“难以服众”，而“难以服众”的核心是接班人权威不足，缺乏信服力，使接任者难以在短时间内企及一代创业者，进而导致“难以服众”的尴尬局面（Davis & Harveston, 1999；李新春等，2015）。权威不足不仅会影响企业绩效，还会影响企业的长远发展（祝振铎等，2018）。因此，对接班人来说，要成功接过企业控制权，实现对企业的有效控制，关键是建立权威（杨学儒等，2009）。那么家族企业接班人在继任过程中如何建立权威？如何完成对企业的有效控制？背后的作用机理是怎样的？上述问题构成了本文的核心议题。文章将运用案例研究方法，从多个角度探究家族企业接班人在继任过程中建立权威的路径及背后的作用机理。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一）文献回顾：企业传承与权威建立

家族企业作为一种特殊组织，是以家族或泛家族成员控制的企业，且多代传承、持续经营（储小平，2004）。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是指企业经营控制权及所有权过渡、转交给下一代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企业所有权的交接，更是继任者成功接过企业控制权的过程（陈凌等，2012；范博宏，2014）。家族企业的传承接班也被认为是企业最重大的战略问题之一，是影响企业持续成长的主要因素（晁上，2002）。而对民营企业来说，接班具有两重含义：一是接所有权的班，二是接经营控制权的班（李新春，2008）。家族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诞生伊始，传承接班问题便成为学者关心的重要议题。目前，关于家族企业传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承模型、传承方式与内容、权威建立等方面。

在家族企业传承模型的研究中，盖尔西克等人（1998）提出了著名的三环模式。在三环模式中，他们将家族企业看成是由企业、所有权和家庭等三个子系统组成的系统，在此基础上将家族企业的发展周期分为三个阶段：初建期、扩张及正规化期、成熟期。朗格内克和舍恩（Longenecker & Schoen, 1978）提出了阶段传承模型，认为家族企业的交接过程可以分为：进入前、初步进入、初步发挥作用、发挥重要作用、接班早期和正式接班等阶段。汉德勒（Handler, 1994）则借鉴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了“角色调整模型”，该模型将家族企业的传承视为创始人与下一代家族成员之间的角色调整过程，角色调整包括启动期、生存期、传承期和退出期。期间，下一代家族成员逐渐成为企业的领导者和决策者，而创始人则往往选择参与董事会来扮演监督者或顾问的角色。

通常来说，家族企业的传承一般会经过初步接触、共同管理及核心权力转移等阶段（Hauck & Prügler, 2015）。传承方式主要包括内部模式与外部模式，内部模式占主导。具体而言，内部模式是指创业者让接班人从基层做起，通过亲身磨砺与创业实践，不断内化知识、经验和能力，协调好各方的利益，最终全面接管企业；而外部模式鼓励接班人开阔视野、接触不同的复杂环境，以便未来回到企业中能更好地管理企业（陈文婷，2008）。而传承内容包括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企业家权威、家族无形资产（包括企业家精神、默会知识等）等，以实现跨代财富积累、阶层再生产的目标（Hanna, 2018；赵晶等，

2015)。其中，传承过程、传承方式及内容都会受到制度环境、行业前景、政商关系等方面的影响（李新春等，2008；朱斌、李路路，2014）。进言之，家族企业的“交接传承”是一个涉及企业内部和外部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复杂过程，与企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然而，在现实的传承实践中，家族企业往往遭遇传承困境，接班人虽已获得正式权力，但仍面临企业员工、潜在竞争者、企业元老等的认可和竞争，这种认可和竞争的根源在于接班人权威难以在短期内有效建立、难以服众（李新春，2008；陈凌等，2012）。同时，由于组织印记的影响，企业发展会受到当时一代创业者及制度环境的影响，并会长久地影响组织的运营活动，使得接班人极易面临“代际阴影”的问题，短时间内难以消除一代创业者的影响（Stinchcombe, 1965；韩亦、郑恩营，2018）。因此，对接班人来说，要实现对企业的有效控制，关键是要建立权威，获得利益相关者的认可（杨学儒等，2009）。

权威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最早对权威进行系统的研究始于韦伯。在韦伯看来，权威是一种感召力，具有号召性，来自人们内心的自愿服从，这种服从建立在不同的合法性基础之上。他将权威合法性的基础分为三类：一种是基于理性规则的法理性权威；第二种是基于传统或惯例基础上的传统型权威；第三种是基于个人所具有的非凡品质之上的魅力型权威。其中，第一种权威是从制度和章程中派生出来的，后两种则建立在个人权威之上，具有个人色彩（韦伯，1997）。可见，权威以非强制性为基础，依靠对其能力和威望的认同来达到，是为人们所公认的、并自愿服从的力量，也是权力和威望的有机统一（西蒙，2015）。

权威的存在是家族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尤其在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的亚洲国家，企业家的权威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目前，学者从多个维度分析了企业家的权威类型、基础要素及建立路径。皮博迪（Peabody，1962）在合法性来源基础上，将企业家权威归纳为两种类型：一是法定权威，基于规章制度和组织中的正式职位；二是职能权威，包括能力权威和个人权威，基于个人才能、知识和人格魅力等，是使组织成员自愿服从和主动追随的权威。杨学儒等（2009）将企业家权威分为职位权威、领袖魅力权威和能力权威，认为在家族企业传承过程中，职位权威作为合法或法定权威可以通过股权转让和管理职位任命而直接继承，而个人魅力权威和能力权威则只能重建。吴炯等（2017）将权威的基础要素划分为三类：家族企业接班人所拥有的个人权威要素（学历、经验等）、正式权威要素（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以及家族权威要素，认为合法性在接班人权威要素与权威之间起中介作用。总之，上述学者均从企业、家族及个人三个维度来研究家族企业中的权威问题，认为接班人的工作经历、管理经验、企业所有权等都会影响权威的建立路径和效果。

同时，不少华人学者从本土文化角度来探讨家族企业中的企业家权威问题。郑伯壘（1995）提出了“家长式领导”和“差序式领导”两种华人组织领导方式。具体来说，“家长式领导”通过确立绝对权力位置、拉大彼此的权威距离来巩固领导，且由威权、仁慈及德行等元素组成；而“差序式领导”是对重要下属采取一种缩小彼此距离的方式来巩固领导。“家长式领导”与“差序式领导”构成了“关系治理”的重要形态（樊景立、郑伯壘，2000；杨光飞，2009）。质言之，在企业场域中，企业家权威

的构建是以让下属心服口服的“个人权威”为基本指向，在市场化组织中表现为“人心式领导”，通过对非正式关系资源的利用来实现对企业的经营和控制（刘世定，2003；沈毅，2014）。

在家族企业中，接班人权威的建立有其特殊性，其是在传承过程中发生的（李新春，2008）。在传承过程中，权威不能像职位一样传递，权威的建立不能一蹴而就，因此，需要在代际传承中考虑权威转换问题，让接班人尽早参与企业经营管理，通过亲身实践建立权威（陈凌、应丽芬，2003）。具体来说，接班人要建立权威，首先要在部门锻炼、培养能力，融入企业，符合员工的心理期待，得到员工的认可；其次，创造业绩、展示能力，唯当能力被承认，企业高层才会认可，为建立权威奠定基础；最后，接班人要依据企业发展状况来推动组织变革，最终完成接班（李秀娟、张燕，2017）。换言之，接班人权威的建立既要依靠法定职位权力，也要依靠个人能力，在家族企业中体现为企业经营权和控制权的顺利转移。

由此看出，家族企业的传承有两层含义：一是家族资产、企业所有权与管理权的传承；二是接班人在掌握经营控制的过程中要实现权威的更替，但这种权威的更替有其特殊性，不可继承，只能重建。借鉴上述研究，本文中家族企业接班人的权威是人们所公认的、并自愿服从的一种力量，基于其个人才能、资历、人格特征和职位等要素，包括领袖魅力权威、能力权威和传统权威等类型，具有非强制性，其核心是对接班人能力与职位的认可，即所谓的“服众”。因此，对接班人来说，权威含有多种要素，在不同的场域中有不同的合法性基础，需要获得创始人、企业元老和广大职工的认可。

综上，家族企业有不同的接班模式，接班人也有建立权威的不同路径。但上述研究没有归纳接班人在企业传承过程中存在的差异性，也没有对建立权威的路径及作用机理进行系统地阐释和总结，如何解释企业传承过程中权威的重建过程仍是一个有待深入分析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以山东省Q市的家族企业为例，聚焦于企业内部，具体探讨如下内容：一是总结家族企业是否存在不同的接班模式，不同模式之间具有怎样的差异性；二是在不同的模式中，探究家族企业接班人是如何建立权威的，并阐释背后的作用机理和解释机制；三是以上述为基础来归纳家族企业接班人建立权威的路径，为进一步破解家族企业的“传承之困”提供依据。

（二）分析框架：基于合法性的视角

合法性作为组织社会学领域的核心概念与解释机制，被用于组织与环境之间的相容性，规范着个体与组织的行为，因而个体和组织必须使用与这一环境相适应的结构或策略（高丙中，2000；Suchman，1995）。换句话说，组织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具有合法性。所谓合法性，是指在特定的信念、规范 and 价值观等社会化建构的系统内部，对行动是否合乎期望的一般性认识和假定（Suchman，1995；高丙中，2000）。一般而言，这个合法性指社会的法律制度、文化观念成为“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之后，就会变为一种约束力量，能够诱使或迫使组织采纳与这种共享观念相符的组织结构和制度（Scott，2008；周雪光，2008）。简言之，一个组织在受众眼中被认为是合法、正当的，将有助于组织获取发展所需的关键资源。

合法性有多种类别。Singh（1986）等依据合法性来源，将合法性分为内部合法性和外部合法性，

且内外合法性对应着赋予组织合法性的不同主体。萨奇曼（Suchman，1995）则将合法性分为实用合法性、道德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斯科特（Scott，2008）的分类被广泛应用，他将合法性分为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三种。其中，规制合法性来源于组织对政府、专业机构等部门所制定的法律法规的服从。规范合法性体现在组织的道德责任上，而道德的要求有时可能会与法律的规定相抵触。认知合法性来源于公众，取决于组织是否与被认为理所当然的状态相一致，体现的是组织被认识、理解和接受的程度。简言之，合法性对企业成长和组织变迁具有重要作用。

近年来，不少学者从制度逻辑出发，对合法性的建立进行了探讨。制度逻辑是指一系列由社会建构的、有历史基础的假设、信仰和规则，为判断行为主体的合法性提供了标准和原则（Thornton & Ocasio，1999）。基于制度逻辑的观点，对合法性的理解是分场域、分层次等的，在不同的场域、不同的维度中，对合法性的解释也会存在差异。而区分合法性来源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合法性的受众，或者叫评估者，评估者不同所形成的合法性也不同（Fisher，Kotha & Lahiri，2016；刘振等，2015）。另外，合法性也存在多元主体的问题，即谁承认、认可依据等（Scott，2008）。换句话说，合法性受众是不同的，合法性的衡量标准也是多样的，会受到具体情境、时间等因素的影响。

因此，从组织场域来看，家族企业接班人建立权威实质上是一个合法性获得的问题，这个合法性问题可以细分为：认可主体（即合法性受众）、认可依据（即合法性的判断标准）等。由于企业存在等级，企业内部的认可主体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的高层，包括企业主、企业高层元老及高层管理者等，他们在企业中拥有决策权；一类是企业的中下层，包括中下层管理者、普通职工等。这两类认可主体背后的制度逻辑是不一样的，对合法性的判断标准也不同。企业高层的判断标准是企业经营成功与否，更关注企业绩效。而企业中下层则关注的是企业家的能力和对下属的关怀程度，更关注企业家个人的德行及能力。

在结合研究问题和实际调研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家族企业的接班主要存在如下模式：基层模式和空降模式，两种模式有不同的合法性受众与评价标准。因此，在按照上述理解的基础上，从两个维度（认可主体与认可依据）提出了关于接班模式的认可主体与依据（如表 1 所示），两种模式有不同的合法性受众与评价标准。质言之，在不同的接班模式中，会有不同的合法性受众，需要不同的合法性基础，并繁衍出与之匹配的权威路径，由此形成了“接班模式—合法性基础—权威路径”的分析框架。本文将以案例的实际情况为标准，在结合“接班模式—合法性基础—权威路径”的分析框架基础上探讨家族企业接班人权威的建立路径及背后的作用机理。综上，本文的基本论点是：不同的接班模式有着各自不同的合法性基础，也会形成与之匹配的权威路径。

表 1：不同接班模式的认可主体与认可依据

		认可主体（合法性受众）	
		企业高层（自上而下）	企业中下层（自下而上）
认可依据	企业绩效、企业经营成功与	空降模式（1）	突发式继承模式（2）

(合法性的 评价标准)	否		
	个人能力和对下属关怀	跨代创业模式 (4)	基层模式 (3)

三、研究方法 with 案例简介

(一) 研究方法 with 资料收集

笔者在 2017 年 8 至 2019 年 3 月对山东省 Q 市多家民营企业进行调研，主要采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调研对象包括企业负责人、管理层、新老员工等，其中深度访谈是主要资料来源。文章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根据研究问题来确定。由于本文的研究问题是探索家族企业接班人建立权威的路径与内在机理，研究内容是“如何”和“为什么”的问题，案例研究方法适合于这类问题的研究，所得结论也更有说服力。因此，本文采用案例法做探索性研究，选取少数的“关键个案”既体现了某一类别现象的重要特征，也可以通过比较的方式揭示背后的因果机制与实践逻辑，这对事件背后机理的把握将更加准确，从而归纳出一些高质量的有待检验的假设（王宁，2002；罗伯特，2010；渠敬东，2019）。基于此，文章通过比较企业 A 和企业 B 的接班历程，从多个维度探讨企业接班人建立权威的路径。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选取的家族企业，虽然不能完全代表山东省其他地方的情况，但也能在较大程度上反映出家族企业的一些共性特征和深层逻辑。

(二) 案例概况

根据研究需要，文章以纺织行业中的 A 企业和 B 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原因在于：首先，两家企业有一定的典型性，属于家族企业，成立时间较长，都拥有自己的品牌，企业有一定的传承性；其次，目前两家企业的继承人基本完成了接班，已经获得了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且年龄与接班时间相近，他们也愿意提供家族企业传承和创业过程的详实资料，案例较为完整，可以作比较；最后，本文以发展中的中小民营企业为案例，这些企业正处在快速发展时期，企业的现代化、制度化程度没有大型企业那么完善，个人因素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仍会起到重要作用。因此，本文以 A 企业和 B 企业作为“关键个案”来探讨家族企业接班人建立权威的路径是可行的，对背后作用机理的把握也将会更加准确。接下来将呈现两家企业的基本情况。

A 公司集团始建于 1992 年，企业占地面积 1600 亩，建筑面积 38 万平方米，总资产 10 亿元，注册资本 1.6 亿元，职工 600 人，企业年产蜡印布 2 亿米，色织布 7000 万米，巾被产品 4800 吨，是中国最大的蜡印布生产基地。WX 从 2007 年开始进入公司，2012 年正式担任 A 公司的集团总经理，随后全面接管了 A 企业。从调研可知，WX 的父亲非常倾向于儿女接班，直接让 WX 大学毕业后从基层进入公司，然后把 A 公司交给 WX。

B 公司创建于 1995 年，是一家生产精品西装、衬衣等产品的大型服装企业，建筑面积 32 万平方米，总资产 8 亿元，注册资本 1.2 亿元，职工 550 人，是 Q 市著名的服装生产企业。ZL 于 2004 年回到 B 企

业，2014 年正式接任公司总裁，而父亲担任公司董事长。在这之前，ZL 的父亲因职业经理人不能成功接手企业，就把交接目标锁定为 ZL。目前 B 企业形成了以“互联网+个性化定制”为核心的智能模式，由传统服装企业升级为平台生态型的现代化企业。

表 2：案例企业概况

研究对象	行业	成立时间	创办人教育程度	接班人出生时间	接班人教育程度	接班开始时间	接班完成时间	开始国际化的时间	初始国际化的时间
企业 A	纺织业：蜡布	1992 年	初中	1980 年	本科（国内）	2003 年	2014 年	2010 年	出口日本、韩国和美国
企业 B	纺织业：服装服饰	1995 年	高中	1981 年	研究生（国外）	2006 年	2015 年	2008 年	出口到欧洲

四、个案研究：建立权威的微观过程

A 企业和 B 企业都是山东省 Q 市著名的服装布料制造企业，但两个企业的继承人 WX 和 ZL 的接班历程却有着很大的差异，WX 的接班是从一线车间开始，而 ZL 则是从企业的管理层开始。研究表明，中国家族企业具有高度的社会嵌入性，接班人建立权威的过程是一个被利益相关者认可的过程，企业内部既有的组织结构、人事网络等因素都会对继任者权威的建立产生重要影响（郑伯壘，1995；李新春，2008）。可见，作为企业的合法继承人，WX 和 ZL 虽具有合法身份地位，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具有被员工认可的权威，仍需要获得利益相关者的认可来重建权威。那么，WX 与 ZL 在接班过程中如何建立权威？两者有何差异？背后的作用机理是什么？

（一）自下而上：wx 的接班历程

接班不仅是个人的成长和成熟，也是企业系统和结构的进化。按照涉入管理企业过程的差异性，即接班的起点是底层还是中高层，两个企业呈现了不同的接班模式。A 企业接班呈现出一种自下而上的路径，可称之为“基层模式”。基层模式是指企业负责人将子女安排在某些岗位上实习和锻炼，先从基层工人做起，学习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培养阅历和经验，建立能力权威，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路径。本节将呈现 WX 的接班历程，具体如下：

1. 基层磨砺，树立典范

基层磨砺是指接班人先在一线车间锻炼几年，获得相关的技术经验，符合正常的传承程序，然后再委以重任。对家族企业来说，接班人在基层磨砺，不仅可以熟悉企业，与员工有一个相处的过程，从而易被员工接受，也可以培养能力、增加生产管理经验，使之对本企业产品的生产流程会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尤其在制造行业中，这一点至关重要（窦军生等，2009）。2003 年，WX 大学毕业后直接回到了父亲打拼的 A 企业，从车间一线开始了接班。在工作期间，WX 以普通工人身份严格要求自己，

每天总是早早来到车间，摸索各种设备的内部结构、工作原理，表现出更高的职业操守与敬业精神。有时车间为了赶交货期，WX 一连好几天和工人吃住一起，互相协作克服困难，逐步赢得了职工的认可。从案例可知，董事长让 WX 尽可能早地参与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中，以一线车间为接班起点，这种从基层开始的接班程序符合人们的传统观念和正常的接班程序，并且通过与员工不断的相处互动，为职工情感上的认同提供了基础，利于建立良好的内部信任关系，也为 WX 尽快融入企业提供了基础。

2. 职位提升与笼络员工

在市场化的组织中，企业家权威的构建是以让众多下属心服口服的“个人权威”为基本指向的，而“个人权威”的建立，一方面需要依靠个人能力以使员工信服；另一方面还需要采取一种缩小彼此距离的方式来笼络员工，使员工自愿追随（樊景立、郑伯埙，2000）。2006 年，WX 被任命为车间主任，此时他除了学会如何管理一个部门外，还要学会处理与员工的关系。在随后几年，WX 带领车间职工积极开展工艺和技术创新，先后自行设计了双轴织造工艺技术、结经机纱线剪刀定位片等 30 项技术革新项目。随着技术和产品质量的提升，A 公司开始了国家化道路，并在 2010 年开始打入日本、韩国和美国等市场，拓宽了企业的发展渠道。

2006 年，我被公司任命为车间主任。此刻，我意识要带领整个车间一起奋斗，让员工们看到希望。对于员工，首先要明白人他们为何要跟着你干，多为员工考虑，把员工当成家人，心存助人之心。

WX20170824)

权威主要依靠人们对其能力和威望的认同来达到，突出强调的是非强制性的力量（西蒙，2015）。同时，“情理法兼顾”的价值与实践常常是一种相当重要的组织文化现象，待人做事要兼顾用公平与人情法则（李新春，2008）。从案例可知，WX 作为车间主任，一方面通过技术革新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通过个人能力的展现说服了车间工人，形成了影响力；另一方面，WX 运用情感、信任等非正式网络对员工进行笼络，这种恩情广施的领导方式是与个人能力特征密切相联的，对员工的关怀也提高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拥戴性。简言之，WX 的这种上对下，并且在兼顾公平与情理基础上施以恩义，再加上自身的技术专长与管理经验，易被员工认可和追随，满足了员工的心理期待，这种认可与期待实质上是一种合法性的体现，来自于儒家伦理中下位者角色的内化，符合传统的角色规范，其结果便是为其权威的建立提供了基础。

3. 推动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经营思想、群体意识和行为规范的一种综合体，并得到全体管理者和员工的认同和维护，成为企业进步和发展的精神源泉（王积超，2012）。一个企业要想长远发展就要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和历史使命。WX 从 2012 年担任总经理以来开始注重企业文化建设，包括公司的使命和愿景。A 企业文化的核心是“品质、精益和创新”，公司以“为员工谋福利、为公司谋发展、为客户创价值、为社会做贡献”为使命，愿景是“做百年企业，成为受人尊敬的世界级企业”。公司还将中国儒家伦理思想“人和、仁爱”与公司的使命相结合来逐步改变公司的文化氛围，从而促进企业内部和谐共处、互帮互助。简言之，WX 通过推动企业文化创新，运用儒家文化

中的“人和、仁爱”，不仅利于协调组织内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利于企业凝聚力和竞争力的形成，为家族企业的持续成长与创业精神的延续奠定了基础。

4. 正式掌舵，完善治理结构

在 A 企业中，“正式掌舵”对 WX 具有特殊的涵义，意味着 A 企业经营权有了质的转变，WX 成为事实上的权力中心，之前的实践经历为其权威建立提供了基础，更重要的是通过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实现了对企业的有效控制，也符合职工的价值观和道德观。2014 年 WX 正式担任公司总裁兼总经理，而其父亲担任董事长，基本退出企业的日常管理。随后，WX 逐步完善公司的组织结构与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导入 EPR 管理系统，重置财务部、研发中心等部门，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管理体系。2018 年，公司开始尝试完善激励机制，优化股权结构，建立虚拟的股权激励计划，计划覆盖集团事业部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级别，股权计划如果实施效果好，公司会将股权激励扩大到中层。股权结构优化是改善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的前提条件，目的是以股权换发展，提高管理层的积极性（何轩等，2008）。可见，WX 通过完善治理结构、优化股权结构，增强了其在行业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也为获得企业的控制权和权威的最终建立提供了前提条件。

（二）自上而下：ZL 的接班历程

不同于企业 A 所呈现的自下而上的路径，企业 B 接班呈现出一种自上而下的路径。ZL 的接班是在继任这一时点直接进入企业高层，以总裁助理或总经理助理职位做起，然后掌管公司，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可称之为“空降模式”。那么，ZL 的接班历程有何特点呢？接下来将呈现 ZL 的接班历程。

1. 初掌部门，走向前台

在家族企业中，法定职位可以通过股权转让和管理职位任命而直接继承，意味着家族企业接班人即使获得了正式权力，也不一定能给自己带来权威，他们还要面对企业元老的挑战和广大员工的认可（杨学儒等，2009）。与 WX 接班的基层起点不同，ZL 的接班是从担任分公司经理开始的，没有接受很多的企业内工作培训，在一线车间呆的时间也不长。在此之前，ZL 的父亲因培养的职业经理人不能成功接手企业，所以把目标锁定了 ZL。2007 年，ZL 从国外留学回来直接进入 B 公司，在其父亲授意下，开始去分公司做经理。但上任伊始，ZL 便面临企业内部元老人物的挑战和员工的认可问题。

虽然承接父业顺理成章，但那个时候 ZL 刚从国外回来，大家对他是否有能力掌舵 B 企业还是心存疑虑，不少公司元老抱着“暂且看看，但不要动我的蛋糕的心态”，看看 ZL 做得怎样。2007 年，ZL 刚到分公司，便根据分公司的实际情况开始着手改变，采取“能者上、不能者下”的用人原则，开除了几个元老的亲戚，结果有几个元老去董事长那里告状，一些老员工不适应离开了。当年对分公司营业额的影响很大，缩减一半，不少元老人觉得 ZL 不适合接班。但在父亲的积极沟通下，ZL 继续担任分公司经理，慢慢度过了危机。可见，对 ZL 来说，虽然具有组织赋予的正式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成员会自愿服从，仍面临利益相关者的认可问题，需要以能力为基础，提升自己的影响力。

2. 用业绩说话，获得认可

业绩作为衡量一位接班人能力的标准，不仅能够让接班人学到东西，也能让部属相信其能力，绩

效好了才能赢得认可与威望，这也是服众的基础（范博宏，2014）。随后几年，ZL 进行市场调研，针对客户需求尝试开辟新的业务。ZL 在渠道方面相继改用批发和 OEM 模式，以及商场专柜、集成店、网点等零售板块，还致力于品牌集合店，实行线下和线上的配合。连续五年，分公司总销售额每年增长 30%，赢得了元老和员工的信服。打铁还需自身硬，有了业绩，企业元老和高层别人才会被认可和尊重接班人，才放心把企业交给 ZL。可见，作为初步参与公司高层管理的接班人，ZL 需凭业绩说话，通过业绩来获取威望，有了业绩意味着 ZL 能将企业经营好，能为企业谋利，也为企业高层的认可奠定了基础。

3. 搭建班底，引进职业经理人

研究表明，随着家族企业的成长，家族成员的代理能力不能适应企业发展的要求，家族主义困境开始出现，此时需要从外部引进职业经理人，以提高代理能力，降低代理成本，采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非家族雇员的贡献。可见，华人企业要想取得成功，一方面是家族企业改造走向制度化管理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家族企业学习和适应跨文化管理的营销转变过程（李新春，2002）。随着 B 公司不断发展，一些家族成员和老员工难以胜任公司的管理工作，从外部引进管理人才成为一个较为迫切的问题。2015 年 ZL 正式担任公司总裁，开始从外部引进人才，让非血缘关系的人加入到企业管理层中，包括人力资源、销售等职业经理人团队，并且在管理人员的任命上打破原来“关系”取向的用人格局，着重以能力和工作态度为标准选拔管理层。但在公司引进人才的过程，因岗位调整，引起了一些元老和家族成员的反対，ZL 为了安抚他们，一方面让他们提前退休，另一方面采取果断措施调整了他们的工作。然而要调动外部人才的积极性，公司还要提供好的发展平台和评价体系。目前，集团的副总裁和部门经理都是名校研究生，这些人都在大型企业工作过，为企业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

4. 转变治理方式，从管理到治理

治理机制是为了在企业内部达到一种权力的平衡，也是企业从个人化向组织化迈进的关键要素，有了这样的内部机制，企业经营活动才能有高的投入产出率（王积超，2012）。随着企业不断发展，原来传统管理方式极易导致企业权责不明、创新意愿不强等问题，企业需要适时地完善治理机制。由此，在 2016 年，B 公司开始调整部门内的组织架构，核心就是将以管控为中心转变为以治理为中心，努力创造一种有助于职工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工作环境与运行机制。具体来说，公司逐步将原来的管控变为现在的数据驱动和流动规范，员工都在一个平台上工作，平台上的每一个岗位就像是一个细胞，以利润最大化作为其绩效主要指标。此外，B 公司每年都对技术创新、改进生产效率进行奖励，注重培养员工的创新意识，以此提高员工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与接班之初相比，目前公司更有凝聚力和创造力，并且在完善治理机制的基础上，构建起了一个配合经营业务的多元化治理结构，实现了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

5. 推动组织变革：“互联网+个性化定制”

进入 2010 年以后，制造行业在市场竞争、信息化、智能化上日趋激励，转型与升级也日益成为制造企业的首要任务，新的发展大势对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发现，在传统制造行业中，技术对于组织具有重要影响，从根本上改变组织的沟通结构、资源配置结构以及管理结构，进而影响企业绩

效（邱泽奇，2005）。2018 年，山东省 Q 市也出台了《Q 市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规划与相关办法》和《Q 市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目的是推动 Q 市的轻工、化工、机械、纺织等行业的升级与转型，并提供相关的优惠政策。上述政策为 B 公司转型升级提供了契机。

2018 年年底，B 公司以此为契机开始探索符合自身的产业升级之路，以提高客户最佳体验和满足客户需求为源点，尝试结合互联网技术，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全新平台化管理模式，用工业化大数据推动企业发展。具体来说，ZL 将原来公司的科层式部门尝试转变成资源提供平台，将组织进行细胞化重塑，打破原来的部门和科层，去领导化、强组织和自组织，并通过运营平台化、过程数据化、结果数字化、背后逻辑智能化来进行呈现，实行因事找岗、责任到人，实现了由人治到自治的新范式。简言之，ZL 通过平台化管理将个性化与工业化融合在一起，通过推动组织变革来适应市场日趋竞争激烈

的环境，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权威路径何以不同？：基于“接班模式—合法性基础—权威路径”框架的分析

按照涉入到管理企业过程的差异性，两个企业呈现了不同的接班模式。A 企业接班路径可称为“基层模式”；而 B 企业接班路径则可称为“空降模式”。基于此，本文通过归纳接班人获取合法性而采取的行动策略，发现了两种模式呈现出了不同的建立权威的路径，两种模式所形成的权威路径具体如下：

基层模式经过进入企业、基层磨练、融入企业等环节（如图 1），呈现出自下而上，上对下笼络、下对上依附的运行特点。这种模式以个人能力和对下属的关怀为基础，符合传统的接班程序，建立权威的路径从一线车间开始，之后再获得职权，完成接班，权威更多地体现为能力权威和传统型权威。总的来看，这样的接班人非常熟悉企业、契合度很高，也符合“创一代”对企业传承的情感需求，利于经营决策的延续性，但问题在于极易面临战略转型需求缺乏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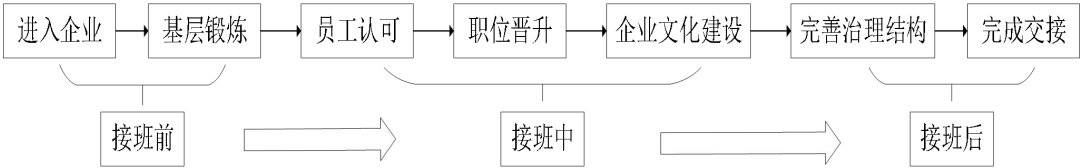


图 1 “基层模式”建立权威的过程

不同于“基层模式”，“空降模式”经过进入企业、初掌部门、组建团队、创造业绩等环节（如图 2），呈现出自上而下、双向选择的运行特点，以能否将企业经营成功为基础，建立权威的路径从法定权力开始，通过创业业绩，获得企业高层的认可，来完成接班，权威更多地体现为能力权威和卡里斯玛型权威。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接班模式优势在于，继任者束缚较少，可以学习不同的管理经验，对企业发展能够提出更有创意的建议，一旦回到企业中，就有可能促成家族企业的战略转型。然而，此种模式的局限在于接班人没有在企业内部成长，不熟悉企业，只因血缘关系而成为领头人，面临企业元

老认可度低、父辈阴影等问题。与“基层模式”相比，“空降模式”的传承风险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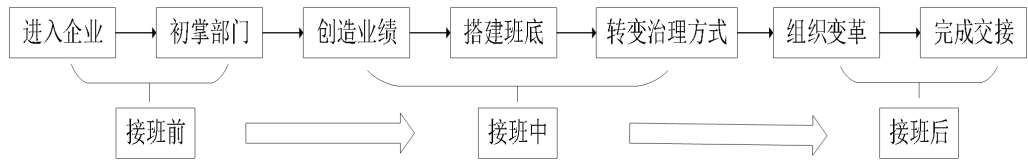


图2 “空降模式”建立权威的过程

从上述分析可知，两种模式所形成的权威路径是不同的，而家族企业接班人建立权威实质上是一个获得合法性的问题。根据“接班模式—合法性基础—权威路径”的分析框架，本文认为接班模式不同，所依赖的合法性基础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权威类型，进而形成不同的权威路径。进言之，两种模式所形成的权威路径之所以不同，原因在于所依赖的合法性基础不同。接下来将论述在不同的接班模式中，家族企业接班人建立权威的作用机理，即接班模式何以影响建立权威的路径（如图3）。

在基层模式中，合法性受众首先来自企业的中下层，他们认可的依据主要是个性特征、个人能力及对下属的关怀程度，这也是建立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对于接班人来说，需要通过展示个人能力和对下属关怀来建立权威。而在空降模式中，合法性受众主要来自企业的高层，他们认可的依据的是经营企业的效果，接班人需要通过创业业绩，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来获得他们的认可。换句话说，空降模式中的合法性基础主要来自于对企业的经营控制能力，接班人需要通过展示企业的经营绩效来建立权威。基于以上论述，笔者认为两个案例呈现了两种不同的接班模式，也呈现了两种不同的权威路径，之所以会出现上述差异，根本原因在于两种接班模式具有不同的合法性基础。进言之，合法性是建立权威的基础，合法性基础与权威类型相联结，进而在接班模式和建立权威的路径之间架起了桥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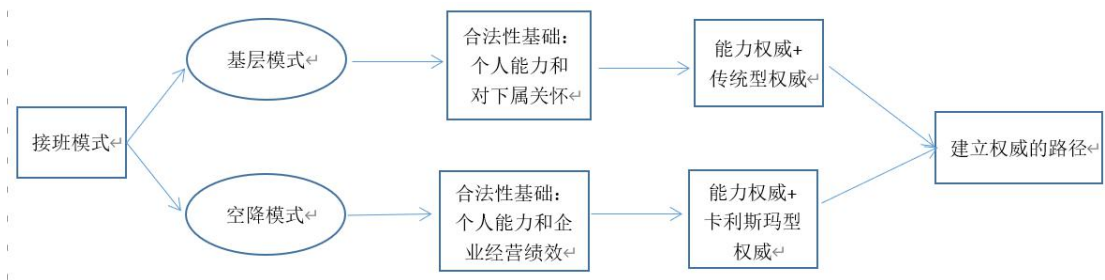


图3 建立权威的作用机理

综上，继任者权威的建立是在接班过程中建立的，不同的接班模式有着各自不同的合法性基础，会形成建立权威的不同路径。由此观之，家族企业有多种接班模式，接班模式不同，需要的合法性基础不同，进而建立权威的路径也会不同。家族企业接班人建立权威的过程，是一个被利益相关者认可

的过程，表现为对企业内部运行与决策的控制力与影响力。总的来说，两种模式各有利弊。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企业传承过程中，接班人需要将制度完善与情感激励紧密结合，家族规则与市场经济规则相结合，既要运用现代管理制度，也要兼顾情感法则，两者达成平衡，才利于企业的传承与转型。

五、结论与讨论

家族企业家权威的建立作为一种重要的研究领域，一直以来被许多学者关注。之前学者主要关注不同文化视域下组织领导权威差距问题、“关系”与“差序格局”在组织领导实践中的基本形态、不同组织场域中的领导模式、权威系统与权威要素等（郑伯壘，1995；李新春，2008；沈毅，2014）。没有考虑企业的传承性与代际性，也没有关注接班人在传承过程中建立权威的路径及作用机理。因此，组织领导权威建构的研究仍存在可以拓展的空间。本文借鉴企业传承与权威建立理论，聚集于企业内部的权威建构问题，探讨家族企业接班人建立权威的路径及背后的作用机理。

以山东省 Q 市的企业 A 和企业 B 为例，通过分析第二代企业家的接班历程，并结合“接班模式—合法性基础—权威路径”的分析框架，从多个角度探讨了家族企业传承过程中的差异性、建立权威的路径及背后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按照涉入到管理企业过程的差异性，家族企业的接班模式可分为基层模式和空降模式；不同的接班模式有着各自不同的合法性基础，形成不同的权威类型，进而建立不同的权威路径；继任者权威的建立是在接班过程中建立的，是一个被利益相关者认可的过程，实质上是通过参与经营管理实现对企业的有效控制。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传承模式、权威建立与合法性结合起来，尝试回答接班模式影响继任者建立权威路径的微观机制，进一步总结了接班模式对组织变革与企业演化的影响。换句话说，不同的接班模式本身即可成为某种权威类型的内在依据，需要突出的是其内在差异而非简单化地加以糅合。此外，本研究对制造业中接班人建立权威的过程分析，或许能为中小企业产权与经营控制权的传承、完善企业治理等提供启发和借鉴。

中国的家族企业在经历了近 40 年的成长周期之后，第一代创业者开始将企业交接给第二代企业家。第二代企业家既是继承者，也是开拓者，承担着推动中国经济实现下一波快速发展的重任（陈光金，2011；梅笑、吕鹏，2019）。家族企业的传承交接不仅是企业所有权的交接，更是继任者成功接过企业控制权的过程。第二代企业家如何顺利传承接班，并保持企业的持续成长，已成为关系中国民营经济能否稳步发展的重要话题，本文的研究问题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

因研究视角之取舍，文章聚焦在家族企业内部探讨接班模式、合法性与权威建立之间的关系，其他如慈善捐赠、政商关系等外部因素对于权威建立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限于篇幅没有展开讨论。再者，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法，所选取的案例位于山东省 Q 市，上述结论是否适合于其他地区的家族企业还需做更多的验证。最后，本文聚焦于中小型民营企业中权威建立问题，其他如制度相对规范的大型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等，企业家权威的问题将在后续研究中继续讨论。

参考文献：

- [1]陈光金, 2011,《中国私营企业主的形成机制、地位认同和政治参与》,《黑龙江社会科学》,第1期。
- [2]陈凌、应丽芬, 2003,《代际传承: 家族企业继任管理和创新》,《管理世界》,第6期。
- [3]陈凌、李新春、储小平, 2012,《中国家族企业的社会角色: 过去、现在和未来》,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 [4]陈文婷, 2008,《家族企业内部接班人的培养模式与路径选择》,《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第7期。
- [5]储小平, 2004,《家族企业成长与社会资本的融合》,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 [6]窦军生、李生校、邬家瑛, 2009,《“家和”真能“万事”兴吗? ——基于企业家默会知识代际转移视角的一个实证检验》,《管理世界》,第1期。
- [7]范博宏, 2014,《交托之重: 论家族企业传承 01》,北京: 东方出版社。
- [8]樊景立、郑伯璜, 2000,《华人组织的家长式领导: 一项文化观点的分析》,《本土心理学研究》,第13期。
- [9]范晓光、吕鹏, 2018,《中国私营企业主的“盖茨比悖论”: 地位认同的变迁及其形成》,《社会学研究》,第6期。
- [10]盖尔西克, 克林, 1998,《家族企业的繁衍: 家庭企业的生命周期》,贺敏译,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 [11]高丙中, 2000,《社会团体的合法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 [12]韩亦、郑恩营, 2018,《组织印记与中国国有企业的福利实践》,《社会学研究》,第3期。
- [13]何轩、陈文婷、李新春, 2008,《赋予股权还是泛家族化——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的实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第5期。
- [14]李新春, 2002,《信任、忠诚与家族主义困境》,《管理世界》,第6期。
- [15]李新春, 2008,《家族企业: 组织、行为与中国经济》,上海: 格致出版社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共同出版。
- [16]李新春、何轩、陈文婷, 2008,《战略创业与家族企业创业精神的传承: 基于百年老字号李锦记的案例研究》,《管理世界》,第10期。
- [17]李新春、韩剑、李炜文, 2015,《传承还是另创领地——家族企业二代继承的权威合法性建构》,《管理世界》,第6期。
- [18]李秀娟、张燕, 2017,《当传承遇到转型: 中国家族企业发展路径图》,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19]刘世定, 2003,《占有、认知与人际关系: 对中国乡村制度变迁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北京: 华夏出版社。
- [20]刘振、崔连广、杨俊、李志刚、宫一洧, 2015,《制度逻辑、合法性机制与社会企业成长》,《管理学报》,第4期。
- [21]殷, 罗伯特·K., 2010,《案例研究: 设计与方法》,周海涛、李永贤等译,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 [22]韦伯, 马克斯, 1997,《经济与社会 (下卷)》,林荣远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 [23]梅笑、吕鹏, 2019,《从资本积累到文化生产: 中国家族企业第二代如何完成社会再生产》,《青年研究》,第1期。
- [24]邱泽奇, 2005,《技术与组织的互构——以信息技术在制造企业的应用为例》,《社会学研究》,第2期。
- [25]渠敬东, 2019,《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社会》,第1期。
- [26]沈毅, 2014,《从“权威性格”到“个人权威”: 对本土组织领导及“差序格局”之“关系”形态的再探讨》,《开放时代》,第5期。
- [27]斯科特, W·理查德, 2008,《制度与组织: 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姚伟、王黎芳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8]王积超, 2012,《企业社会学》,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9]王宁, 2002,《代表性还是典型性? ——一个案的属性与个案研究方法的逻辑基础》,《社会学研究》,第5期。

- [30]吴炯、刘阳、邢修帅, 2017,《家族企业传承的权威基础与权威冲突——合法性的中介作用》,《经济管理》,第2期。
- [31]杨光飞, 2009,《关系治理: 华人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的新假设》,《经济问题探索》,第9期。
- [32]杨学儒、朱沆、李新春, 2009,《家族企业的权威系统与代际传承》,《管理学报》,第11期。
- [33] 西蒙, 耶夫, 2015:《权威的性质与功能》, 吴彦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34]祝振铎、李新春、叶文平, 2018,《“扶上马、送一程”: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的战略变革与父爱主义》,《管理世界》,第11期。
- [35]晁上, 2002,《论家族企业权力的代际传递》,《南开管理评论》,第5期。
- [36]赵晶、张书博、祝丽敏, 2015,《传承人合法性对家族企业战略变革的影响》,《中国工业经济》,第8期。
- [37]郑伯壘, 1995,《差序格局与华人组织行为》,《本土心理学研究》,第3期。
- [38]周雪光, 2008,《组织社会学十讲》,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39]朱斌、李路路, 2014,《政府补助与民营企业研发投入》,《社会》,第3期。
- [40]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家族企业委员会, 2015,《中国家族企业传承报告》, 北京: 中信出版社。
- [41]Davis, P. & P. Harveston 1999. *In the Founder's Shadow: Conflict in the Family Firm*. Family Business Review.
- [42]Fisher, G., S. Kotha & A. Lahiri 2016. *Changing with the Times: An Integrated View of Identity, Legitimacy and New Venture Life Cycl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
- [43]Handler, W. C. 1994, *Succession in Family Business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Family Business Review .
- [44]Hanna, Kuusela .2018, *Learning to Own: Crossgenerational Meanings of Wealth and Class-making in Wealthy Finnish Families*.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 [45]Hauck, J. & R. Prügl .2015, *Innovation Activities during Intra-family Leadership Succession in Family Firms: An Empirical Study from a Socioemotional Wealth Perspective*. Journal of Family Business Strategy .
- [46]Longenecker, J. K. & J. E. Schoen .1978, *Management Succession in the Family Business*.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
- [47]Peabody, R. L. 1962, *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Authori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
- [48]Scott, W. R. 2008,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Ideas and Interests*. Thousand Oaks: Sage.
- Singh, J. V. , D. J. Tucker & R. J. House.1986 ,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and the Liability of Newne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 [49]Stinchcombe, A.L. 1965, “Social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s .” In James G. March (ed.)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 New York: Rand McNally.
- [50]Suchman, M.C.1995 , *Managing Legitimacy: 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 [51]Thornton, P. H. & W. Ocasio.1999 , *Institutional Logics and the Historical Contingency of Power in Organizations: Executive Succession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Publishing Industry, 1958-1990*.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作者简介: 任宇东,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6 级博士研究生
王毅杰,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农村失地家庭的脆弱性研究*

王玥琳 施国庆

摘要：在中国失地农民总量将于 2020 年突破 1 亿人次的宏观背景下，研究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将 AH 省 HF 市 FX 县作为研究地点，按比例选取其下属六个乡镇的 477 户家庭作为调查对象。创新性地从显性和隐性的视角，旨在阐述农村家庭被征地失地后的生活状况。研究得出：公共利益不协调、公众参与不足、土地征收程序不合理、再分配利益失衡等是导致失地农户脆弱性的重要源头。除了要让公共利益的界定明确化之外，进一步协调政策一致性、增加事业认定程序十分必要。需从制度建设、内容补充、方式多元、补偿提高、相关者参与等多个角度，完善农村土地征收公告制度，提前落实安置房的分配、划拨等问题。

关键词：农村 征地 利益 脆弱

一、引言

针对中国征地拆迁的热点问题，中国失地农民总量将于 2020 年突破 1 亿人次，日益引发学界对农民失地脆弱性的关注。就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定义，有界定方式从失地农民权益视角直接突出失地农民产生的体制与制度起因，并将该起因细化为土地产权、政府管理和征地法规的不完善^[1]。相较于对失地农民弱势性的关注，另有定义从动态视角主张突出失地农民群体身份的临时性，其处于农民到非农民（市民）的身份与职业转换过程中，涉及到农民职业和其身份的动态分离^[2]。虽有定义缺乏对失地农民内部特征的综述，但在强调该群体对集体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方面有独到之处^[3]。

单就脆弱性而言，针对城市化过程中人地关系错位与冲突的现实矛盾，学界更多地将脆弱性研究视角转移到社会结构和人类活动上。逐渐认识到社会内部结构中所延伸出的脆弱性问题，更为侧重于去探讨在征地过程中会给群体带来损害的社会、制度及经济因素^[4]，逐步从敏感性、暴露性和适应能力这三个自然环境系统脆弱性指标中剔除暴露性维度，发展出集敏感性与适应能力为一体的二维社会脆弱性分析体系。更多的开始关注失地农户基于不同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家庭结构条件下所表现出

* 本文已刊发于《统计与信息论坛》，2020 年 02 期。

的脆弱性差异。

环境学科已在可持续发展视角下广泛开辟脆弱性研究范式的新视角，社会学、自然灾害学以及生态地理学等众多学科都开始跨学科引用脆弱性理论理念。其理论最先被自然灾害学引用，并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被广泛应用到经济学领域，开始了对贫困脆弱性的探讨，后在人文因素的融合下逐渐跳出以环境为中心的传统研究范式，开始被延伸至自然社会的耦合系统层面，成为人文研究系统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属性。

就方法而言，VEP、VER 以及 VEU 是学界常用的有关脆弱性测量的研究方法，在脆弱性的类型上，Hoddinott 将脆弱性的测度划分为可预期的贫困脆弱性、低期望效用的脆弱性以及风险暴露的脆弱性。首先就贫困脆弱性而言，其定义往往在个体及家庭层面上强调谋生技能、社会资本等社会经济因素对脆弱性的缓解作用，Chaudhuri 在对印度尼西亚国家一组截面消费数据进行贫困脆弱性研究的过程中，指出受教育程度的缺失与消费水平的低下是导致农村家庭脆弱性的主要因素；李丽借助 VEP 的脆弱性研究方法对 2638 户城乡家庭数据进行了贫困脆弱性分解，强调了中国农村家庭的脆弱性程度^[5]；刘红丽在面板数据模型对农村家庭脆弱性进行分析时揭示年龄与受教育程度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高层次的贫困县暗含高程度的脆弱性^[6]。同时亦有研究从 Ordered Logistic 模型的角度，对甘肃与陕西省共 865 户农户在土地经营权和收入满意度之间进行了分析^[7]。

现将农户由于对征地搬迁的敏感性、自身对当前失地的应对能力、对自我在后续生活中的恢复能力所收到的负面影响及预期受损状态定义为农户的失地脆弱性，包括因城市化建设而被强制征地的农民、将自有土地交予财力与设施完备的种粮大户的农民、因主动从事非农职业而主动放弃自有土地的农民，不涉及被征地后成功实现新市民身份转型的失地农民。失地农民的脆弱性程度受土地征收、政策制度的外在影响和农户自身精神状态、收入多样性及生计资本占有情况的主导影响，以敏感性、应对能力及恢复能力为外在表现。国内外基于敏感性与适应能力为一体的脆弱性分析亦不多见。在农村失地家庭已然成为极具中国特色的城市化现象的背景下，关注其在土地持有、粮食供给、收入与消费状况、生活质量等方面，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还具备丰富的实践价值。失地农户个体已经不再是新古典理论所假设的那种只会在快乐和痛苦之间进行权衡选择的机械式个体了，而是填上了一层集体选择行动参与者的属性，集体内农户间在土地补偿上的信任程度开始成为实地研究所需要关注的重要方面。

二、失地农户的脆弱性分析

（一）研究地点与方法概况

依据 2015 年 3 月 25 号国家发改委正式印发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报送引江济淮工程项目建议书的请示》，以改善城乡供水、优化巢湖和淮河水生态环境和发展江淮航运为目的的引江济淮工程，涵盖 AH 省的 12 个市和 46 个县（市、区），拟用地面积 8.15 万亩，征地总面积为 231 027.76 亩，其中永久征地面积 78 822.06 亩，临时用地面积 152 205.7 亩^[8]。工程拆迁影响居民总人口 72 094 人（基准年），有 AH 省“南水北调”工程之称。

研究将处于搬迁安置过程中和已经完成搬迁安置的失地农民作为研究对象，将 AH 省 HF 市 FX 县 SH 镇、YD 乡、TH 工业园、SP 社区、ZPS 管委会和 GD 乡作为样本选取地点，在下属的 BG 村、WH 村、TH 村、LH 社区、XXP 区、ZP 社区、ZP 社区、PH 社区、CZ 村、GX 村、GS 村以及 CD 社区中按比例抽取样本共 477 户（见表 1）。根据农村和城集镇征迁的影响量和本底抽样规则，样本分布主要细化为：FX 县样本村抽样 7 个，样本户抽样 292 户；城集镇样本社区（村）抽样 6 个，样本户抽样 188 户。JK 区农村样本村抽样 1 个，样户数抽样 5 户（其中 JK 区城集镇无征迁影响）。

表 1：实际抽样调查情况

调研市	县	样本量	调研乡镇	调研乡镇下属村	样本户数
HF 市	FX 县	477	SH 镇	BG 村	87
				WH 村	85
			YD 乡	LH 社区	37
			TH 工业园	XXP 区	60
			SP 社区	ZP 社区	40
			ZPS 管委会	ZP 社区	40
			GD 乡	PH 社区	43
				CZ 村	26
				GX 村	16
				GS 村	33
				CD 社区	10

表 2：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变量	类别	百分比
性别	男	51.96%
	女	48.04%
文化水平	文盲	24.7%
	小学及以下	36.64%
	初中	32.9%
	高中	5.1%
	大专及本科	0.7%
	硕士及以上	0%
家庭户结构	户主孤寡	5.8%
	户主去世	3.1%
	单亲家庭	2.4%
	夫妻二人	17.5%
	核心家庭	26.7%
	三代同堂（上有老下有小）	7.2%
	三代同堂（由子代与孙代构成）	30.1%
	四世同堂	1.4%
	组合家庭	3.8%
	其他	2.1%

（二）脆弱性分析

1. 显性脆弱性

引江济淮工程涵盖 AH 省的 12 个市和 46 个县（市、区），拟用地面积 8.15 万亩，征地总面积为 231027.76 亩，其中永久征地面积 78822.06 亩，临时用地面积 152205.7 亩^[8]。现将调查地点所涉及的农村失地状况统计如下表 3，工程所涉及到的永久性征地（耕地）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影响之大显而易见，对失地农户在该工程过程中的影响评估与研究具备重要价值。

表 3： AH 省 HF 市受引江济淮工程影响的农村失地状况表

县区	乡镇	村	工程涉及永久性征 地(耕地)(亩)	基准年涉及组的总 耕地(亩)	基准年涉及组的总 人口(人)
FX 区	SH 镇	BG 村	817.84	1 413.45	1 474
		BH 村	17	1 385.24	1 002
		LA 社区	106.42	892.65	541
		XH 村	101.67	1 450	496
		TH 村	174.02	906	800
		ML 社区	355.91	2 207.94	1 954
	YD 乡	XJ 村	298.9	2 030.29	2 342
		KH 村	427.32	2 730.65	3 288
		LH 社区	319.23	2 160.4	2 947
		LH 村	805.4	1 924.27	1 821
		SL 村	117.09	1 510.39	1 250
		DF 村	123.45	2 007	979
	SP 镇	ZP 社区	364.97	4 680	2 173
		DT 社区	65.75	1 669	1 845
	TH 镇	FC 社区	82.45	1 179.33	713
		FH 新园	39.02	429	119
		SH 家园	261.4	809.6	686
	TH 工业 园	LP 社区	29.05	157.01	375
		YH 社区	89.67	904.41	2 051
		XXP 区	789.67	2 228.09	2 787
		SM 社区	284.51	960.7	969
	GD 乡	CD 社区	1 255.64	5 360	2 100
		CZ 村	533.51	1 849	683
		GX 村	408.68	1 956	752
		GD 社区	273.5	1 208	565
		GS 村	697.94	2 998	1 918
		PH 社区	624.35	2 790.7	1 125
		SF 村	301.61	1 584	561
		TT 村	457.06	3 448.9	1 810
		XH 村	423.16	1 910	1 217
BH 区	-	-	15.61	-	-
JK 区	-	-	102.35	-	-
合计			10 764.35	56 740.02	15.61

土地类型决定着粮食出产。截止 2016 年末，中国全年的粮食种植面积达 11303 万公顷，粮食产量达 61624 万吨，其中稻谷的种植面积有 3016 万公顷，产量达 20693 万吨；小麦作物的种植面积达 2419

万公顷，产量有 12 885 万吨；油料作物种植面积达 1412 万公顷^[9]。其中，AH 省 2016 年全年的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达 6644.6 千公顷，粮食总产量为 3417.5 万吨，其中油料种植面积占 731.1 千公顷，产量达 214.8 万吨^[8]。而 HF 市 2016 年全市粮食产量达 310.38 万吨，其中油料产量 29.62 万吨^[10]。而与粮食出产和种类直接相关的莫过于农业之本---土地。通过对样本地失地农民所失土地类型的调查分析，FX 县农村失地样本村的人均耕地面积达到 2.005 亩，人均园地面积达到 0.028 亩，人均林地的面积约 0.024 亩，人均养殖水面面积计 0.234 亩，人均其他土地面积约有 0.015 亩，征地带来的土地缺失会带来农民的失地脆弱性，且该脆弱性具有普遍性和显著性。

FX 县各农村失地样本村的农作物播种面积共计 46299.96 亩，其中粮食作物计 40144.96 亩、经济作物占 5755 亩、其他作物约 400 亩。同时农村土地年总产值合计约 25590.4 万元，其中大农业的年总产值约 7720 万元，土地出产粮食总产量约有 18551.2 吨。失地后的农作物一去不复返是失地直观脆弱性的主导因素。土地缺失意味着自给自足生活方式的一去不复返，农户无法继续依赖土地播种实现粮食、蔬果等农作物的自给自足与自产自销，需要开始转向市场购买，也无法通过销售农作物获得一定的农业收入，失地直接改变了农户自给自足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粮食销售方到购买方的转变，加剧着失地农民转型期的脆弱性。

2. 隐性脆弱性

依据国家统计局公示的中国农村情况报告，基于对中国 16 个省、市、区合计 2 760 个被征地农村样本户的调查，得出约 46% 的农户的家庭收入水平在失地后呈下降趋势^[11]。宏观视角认为失地造成农民失去土地收入这一基本收入来源。部分人群被迫转向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因各种内因与外因因素其收入水平亦呈不稳定的状态，且人均年纯收入有明显下降趋势，增大农户失地后的心理失衡感和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表现出隐性的经济脆弱性。

研究首先对失地前样本地农户的生活用电条件、通信情况、交通状况及家电拥有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统计出农村失地样本户的有效通电率较高，都能达到 99% 以上，但交通情况差异较为显著。除了 TH、GW、CZ 村距等级公路距离较短之外，其余村距等级公路较远，都在 2 公里及以上，SH 镇中的乡村距市集 10 公里以上，搬迁安置前较为封闭，对外往来十分不便，购买力较差。且因乡镇医院多在市集，农户就医十分不便。失地前农户的生活状况（譬如生活用电条件、通信情况、交通状况及家电拥有情况等）越稳定，生活条件越好，失地后隐性经济脆弱性的影响越是容易显性化，这种显性化主要体现在农户家庭收入金额、成分比例以及消费项目、消费能力上。

同时，土地征用直接冲击着家庭收入与消费形式，对一般家庭而言，家庭存有青壮年劳动力，在用征地补偿增加当期收入的同时，传统农业劳作向新型劳动方式的转型过程，会使得农户家庭的非农业性收入显著增加，在总收入效应影响下，间接影响着农户的收入与消费状况。如下图 1 所示，折线图的横轴代表正常农户家庭依赖土地所得的农业收入，初始收入设为 N；纵轴代表依靠二三产业所得的非农业性收入，初始收入设为 F。当土地明确被征用时，正常农户家庭依赖土地所得的农业收入减少，由 N 向横轴以左开始降低，为满足消费需要，刺激劳动方式向二三产业转型，外出务工或家庭自主经

营等形式刺激非农业性收入自 F 向纵轴以上上升。由于存在正常农户间的个体差异，存在年龄、文化程度、技能和身体素质等变量，存在部分正常农户家庭在明确被征地后无法迅速实现收入转型的现象，即无法短期内实现由 FN 向 F'N' 的收入转型，但大多数存有青壮年劳动力的农户家庭能够迅速达成非农业性收入对土地征用损失的弥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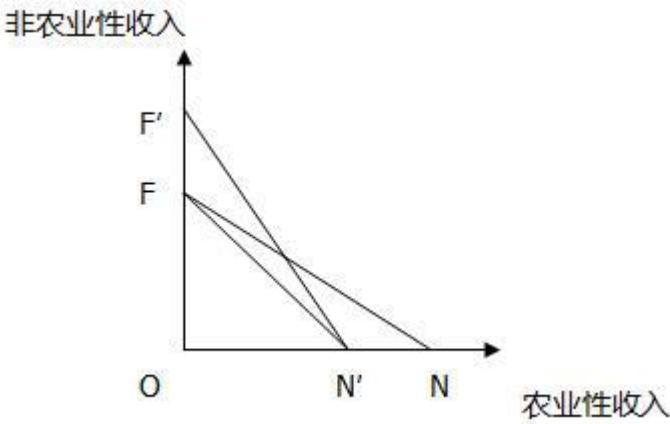


图 1：征地—收入变动图

将收入的变动细化，在 FX 县的农村失地移民样本村中，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最高的是 PH 社区，具体约为人民币 17 500 元；而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最低的是 GX 村，具体约为人民币 13 500 元。同时，贫困户比例最高的农村失地移民村为 GD 乡的 GS 村，占比达到 6.5%。具体而言，FX 县农村失地农民的人均总收入为 23 767.14 元，其中失地农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6 512.83 元，恩格尔系数为 38.87%，同时工资性收入普遍在 12 822.35 元左右，家庭经营性收入约占 9 605.45 元。此外财产性收入达到 132.59 元，转移性收入约占 1 206.75 元。同时，在人均工资性收入当中，本地企业组织的收入约 513.31 元，占到总体的 4.00%；本地非企业组织收入达到 382.59 元，占总体的比例约达 2.97%；外出务工收入约为 11 037.97 元，占比达 86.02%；其他收入约为 888.48 元，占比约达 7.01%。农村失地家庭收入来源和成分比例的变动所展现的不仅仅是土地问题，伴随土地的被征用，隐藏在补偿安置费用下的“家庭经济来源是否匹配家庭日常消费”成为农户所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征地后的生活水平是否不低于原有生活水平甚至高于原有水平”是他们评价工程好与坏的最为重要主观标准。除去现有安置住房的质量、环境、位置等固定资产对比之外，失地后的消费能力高低成为衡量自身“有无从征地中受损”的重要评判指标。

针对 FX 县主要失地农村的收入与消费情况分析见下表 4。

表 4：三河镇农村失地样本户 2017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生活消费支出构成表

	收入（元）	消费（元）
--	-------	-------

	人均 家庭 总收入	人均 可支 配收入	食品	衣着	家庭设 备用品	医疗 保健	交通 通信	文化教 育娱乐	居住	商品和 服务
SH 镇	19 545.9 4	16 502.0 7	4023.08	844. 8	314.5 8	769.2 5	1079.48	1720.92	1535.31	128.3 9
GD 乡	29 991.6 3	16 528.7	4786.30	1129 .34	765.4 7	772.5 0	1201.40	1349.40	1913.12	282.3 1

失地农民在失地后直接收入的丧失，致使他们的收入在寻求可替代收入前，下降难以避免。自给自足的小农业生活被剥夺，生理机能的下降也导致他们无法在补偿安置外寻得其他获得收入的有效途径。其消费水平因租房、新环境下物价较高、新房家电性支出等消费种类增多而高出原有消费水平，出现家庭经济来源与家庭日常消费匹配程度下降的现象，并且在短期内无法得到缓解。此外，失地农民，尤其是青壮年的收入水平呈现出先升高后降低的状态，“贫困”脆弱性程度与收入水平呈反相关系数。先升高主要表现在失地之初所获得的一次性征地补偿费用，一次性补偿后的一段时间失地农民还未寻得可替代收入来源，生活水平开始出现脆弱性。此后，经济收入水平开始出现因人而异的趋势，总体呈升高态势，主要涉及自身除农业外的其他技能，以及是否走出农村转而从从事第二或第三产业。而对局限于种植产业技能、无择业就业途经，而开始从事打零工的大部分失地农民而言，隐性经济脆弱性仍呈显著趋势。农业收入的丧失、第一产业职业的丧失以及经营性收入（主要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民因征地而导致的停业、歇业以及原有商圈的丧失所造成的直接与间接损失）的损失共同加剧着失地农民的经济脆弱性，促使这种隐性脆弱性不断出现显性表征。

三、农户失地脆弱性问题的源头分析

集体土地征收工作背后有大量产权问题与利益纠葛，因此在征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很多过去潜藏未爆发的历史问题。安置补偿政策、征收执行方式等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是问题的高发源头，以下将深入剖析造成导致脆弱性问题的原因。

（一）公共利益的界定范围模糊

2004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首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根据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虽然这一规定为土地征收工作提出“公共利益的”这一大前提，但是由于《土地管理法》中并未对公共利益作出具体的界定。因此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将公共利益曲解、扩大的现象。面对强势的政府与开发商，作为被征收人的集体土地所有者——农民，对于土地征收是否真正是出于公共利益并没有多少发言权。很多和公共利益根本无关的商业开发也被纳入征地范围，违法征地、拆迁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约束。

什么是公共利益，什么是非公共利益，这两者之间其实并没有泾渭分明的严格界限，这给公共利益的界定带来了巨大的争议。在此背景下，如果单纯地采取二元对立的方式，将商业利益与公共利益看作水火不容的两方面，显然对城乡的发展是有损害的。肆意地扩大土地征收范围无疑会侵犯到农民的利益。

（二）土地征收程序不合理，被征地农民的公众参与不足

近年来由于土地征收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一直是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国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 2011 年颁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做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相应的，HF 市政府在 2017 年 12 月 28 日市政府第 107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HF 市被征收集体土地上房屋补偿安置办法》，对征收集体土地涉及宅基地上房屋补偿有效面积和过渡期临时安置费等做出细化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试图规避征地行为对农户利益的损害。但是因城乡建设土地征收而引发的上访事件却并没有减少。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的土地征收程序本身还存在着问题，相关征收程序的明文规定本身相较于征收机关对法定征收程序的无视态度而言，更加令当事人寒心^[12]。

1. 审批程序

作为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自己的土地如何被处置并不知情，这也就意味着政府在将集体所有性质的土地转换成国家所有的过程可以借助于审批程序实现^[12]。无论农民是否同意，起码在审批程序上，政府已经完成了土地性质的转化，农民只能选择服从这个既定结果。

HF 市被征收集体土地的房屋补偿安置同样存在着这个问题，农民直到征地公告张贴之后，才正式知道土地被征收的具体情况。农民在公告期间只能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是否合理提出意见并要求举行听证，而对政府征地这一行为本身是否具有合法性，是否真的是出于公共利益，是否他们真的愿意被征地，没有发言权。并且由于国土部门并没有提高或降低补偿标准的权利，因此在听证会中农民提出的意见并没有多少可以被实际采纳，农民几乎没有议价权，钉子户现象的出现。固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少数农民狮子大开口想获取更多利益，但是也有政府在征地审批前，缺少与被征收人协商这一环节的原因。这一环节是造成农户脆弱性的重要源头之一，如果不解决，征地建设的效果会大打折扣。

2. 公告程序

《土地管理法》中规定了在土地征收中必须实行土地公告，保障农民的知情权。但是就实施情况来看，征收程序的不透明仍然是民众反应最为强烈的问题之一^[12]。于中国而言，国家本位主义仍然市当前公告程序的外在表现^[13]，它并未给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农民充分协商的权利。农民在整个征地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土地所有权归属村集体而使用权归属于农民，致使大部分项目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听证权，其中强势集体通常会“代表”农户放弃听证权这个媒介。“过场”形式的听证会目前仅能给双方提供了一个发表言论和进行讨论的舞台^[14]。

（三）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存在漏洞

依据上文对失地农民隐性脆弱性的分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进入城农民

市务工，纯靠土地生存农民已经是很小的比例，兼业农民是主流。这部分农民常年不在家乡生活，土地或撂荒，或流转。但是由于城市的房价高企，生活成本高，加之中国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土地在农民的认知中，充当着最后一条退路，是自己生活的最后保障。因此农民对于土地的补偿期待很高，但当前的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 土地征收后农民无法分享增值收益

同一块土地，即使尚未进行开发，只要土地征收完成后，其市场价值就已经远远超过补偿价值，更不用谈进行商业开发之后的价值。土地价值是“涨价归公”还是“涨价归农”，这一点在学界也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有学者提出采用累进制比例税形式的渐进式方式并不能在将农地转变成城市用地过程时一次性把增值归公，因此地价税和土地增值税会损害到失地农户自身的利益^[15]。另有说法强调辐射性增值作为土地农转非后的一种自然增值，地价增长原则上应该归属于社会所有，而非农地所有者或土地农转非之后的土地使用者所有，毕竟这种自然增值完全来自于社会整体的经济发展^[16]。

不管学界的争论是如何，现实情况是，现行的土地征收补偿政策在执行中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根据所做的《关于农村土地征收中的利益冲突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对被征地农民的调查结果显示，不满意补偿标准的农户比例占到 74.5%，而表示基本满意的农户仅占 1%^[11]。由此可见“涨价归公”这一点本身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全部“涨价归公”存在明显不合理。

2. 土地征收补偿的范围窄

纵然 HF 市征地补偿安置费用由征地区片补偿费、青苗和附着物综合补偿费两项费用组成，同时还有安置补助费、耕地占用税、耕地开垦费、征地管理费等，然而补偿的项目并不能涵盖被征地人的所有损失。土地法同时规定了邻地损失补偿费，即土地征收可能导致邻接地经济效益的减损。倘若由于土地征收导致邻接地价格下跌，土地征收人应当对损失给予补偿。又如，残地损失补偿，是讲土地征收行为可能导致残地价格下跌，土地征收人应当对于价格下跌造成的损失给予补偿。土地因公共利益被征收，被征地者利用原有财产进行盈利的活动也会受到影响，例如农家乐、休闲农业观光等，因此被征地者遭受了间接损失，对于这一部分间接损失也应当给予补偿才合理。

3. 集体土地产权不明晰，农民利益无法得到保障

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这实际上模糊了所有者的权利，出现了“人人都有权，人人都无权”的情况，这就为较为强势的一方提供了寻租的空间。在实践中村委会、村民小组、乡镇政府成为了集体土地的实际支配者，行使着土地所有者的权利，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民对土地并没有多少控制权。同时面对改变土地用途后的巨大增值利益，以及为了吸引更多的资本投资，地方政府有巨大的动力推动征地工作，甚至在很多地方出现项目已经开始动工，农民才知道土地已经被征收的情况，加剧农户的失地脆弱性。

（四）利益本源：再分配失衡

征地过程作为一种非合作博弈，农户经常以利己主义为目的，在追求各自目标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忽略社会福利和他方需求，低效率均衡的结果在所难免。在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的博弈过程中，不存

在完全理性的当事人，解决因征地和拆迁而遭受的经济脆弱性、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无疑是农户的初衷和主旨。而农户经济脆弱性暴露出“被征地拆迁户的补偿价格大部分未能够达到作为指导的市场价格”的问题。这种利益调整不均衡的原因涉及到制度和预算等多个方面，对征收土地的建设与完工通常都会使附近的地段获得一定程度的升值，明显表现在房价的上浮，这让原本居住于此的被拆迁人愈发感受到自己确实属于非自愿型的被动搬迁户。站在机会成本的角度会认为原有的补偿价格与现在该地段的价值不匹配，强烈的不公与不甘进一步冲击着农户内心所认可的补偿结构。当然，这种立足于机会成本的解释往往也可以称之为征地拆迁后的再分配，补偿结构的不合理蕴藏着结构性风险，长期拖延发酵则会慢慢演变成社会覆盖面甚广的系统性风险，此时征地问题不只是关系着农户个人，房地产市场以及地方政府部门等都会受到波及。

四、农户失地脆弱性问题的源头减生路径

（一）公共利益的界定应当更加明确

在于2017年5月23日国土部在其官网上发布的《土地管理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中，此修正案将国防和外交、基础设施、公共事业等界定为公共利益，其他不符合公共利益范围的事项将退出征地范围。此次的修订虽有改进，但是并没有改变公共利益界定过于宽泛的缺漏。第四十四条所规定的第四、五、六种情形公共利益同样不能规避非法征地的现象出现。例如第四种情形中规定“搬迁安置工程”也算在公共利益中，这里缺乏对搬迁安置工程本身是否具有公益性具体规定。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的移民工程、高铁的建设而引起的搬迁等毫无疑问是公益性的，但是地方政府为了大搞工业园区、开发区等所进行的搬迁工程似乎不应该是。

因此为解决上述实际问题，并结合现行已有法律，针对《土地管理法》（修正案）的第四十四条，可以对确需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当其满足：国家安全和外交的需要；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需要；由政府组织实施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境和资源保护、防灾减灾、文物保护、社会福利、市政公用等公共事业的需要；由政府依照城乡规划法有关规定组织实施的对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进行旧城区改建的需要时，为了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实施征收^[16]。

（二）征收程序中需增加事业认定程序

征收程序中需增加事业认定程序是指，有权机关对需用地人所举办的事业是否符合土地征收的规定做出判断的行为。要判断一个项目是否属于公共利益，光靠列举法显然是不能穷尽的，实际情况在随时发生变化。因此为了尽量减少法律与不停变化的实际之间的矛盾，应当采用一般条款与类型化结合的方式立法。一般条款框定一个大概的范围与认定原则，而类型化则是指在征收程序中增加事业认定程序。而这一点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方式。在日本，事业认定程序包括事业认定前召开事业说明会、事业认定程序中的召开听证会、听取第三者机关的意见、公示事业认定理由等。其主要特点，一是举办事业人与认定机关不能同一；二是需广泛听取意见，对象包括土地所有权人、公共设施建设运营利益受损者及获利者、第三者机关等；三是事业认定过程公开、透明。如此以来既保障了征收土地是真

正出于公共利益的需求，又充分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与参与权，从源头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减少被征地农户脆弱性的发生。

（三）完善土地征收公告制度

1.增加預告制度

建立健全征地中各个关键阶段的“預告”程序，尤其是一些关键阶段的“預告”制度，如征地前的預告以及行政机关拟制定补偿与安置方案前的預告。前者是保障公众在征地前对拟征地相关信息有所了解，后者是保障公众能够就征地补偿与安置方案积极主张权利，在方案制定前就能参与到方案的制定中去。

2.增加公告内容

在征地的不同阶段应当有不同的公告内容，但无论是在哪一个阶段，都需要把握一个原则：充分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与参与权。对于公众表达意见的途径没有具体的公告，建议应当在預告阶段就告知公众征地过程中享有的权利及其实现的方式、救济途径、公告期限等内容；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制定前，应当对拟制定补偿与安置方案的相关事宜予以公告，如参与的方式、时间、地点及享有的权利等，以便公众能够尽早参与其中、积极主张自己的权利；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除了目前相关法律所规定的内容之外还应当公告确定补偿金额、受影响人口、受影响范围等所依据的调查数据、补偿标准等内容。

3.增加公告方式

公告除了张贴在村委会、居委会等地外，还应当采用多种渠道，例如广播、电视、报纸、手机新媒体、互联网等，并建立回馈机制，确保信息投递有效，让更多的利益相关者了解征地以及补偿安置信息，减少因信息不充分造成的问题。

4.增加利益相关者参与程序

政府应当转变自身的行政思维，改变国家本位主义的思想，转而以人民为本位。真正去倾听、去了解被征地农民的诉求，耐心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让被征地农民参与到征地全过程中来，消除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双方作为权利对等的利益方共同商议征地以及补偿安置事项，这样才能真正减小双方的矛盾，最大限度达成共识，消解失地农户脆弱性。

5.提高补偿安置水平

（1）按照市场原则进行公平补偿

土地征收后的用途，无论是招拍挂，还是获得土地后的开发，都遵循市场经济原则，然而在征收土地时却使用产值倍数法确定补偿费用，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否认了农民作为土地实际拥有者使用者对于自己合法财产的处置权与收益权。应当让市场来决定被征地农民的补偿水平，让农民得到合理的补偿，具体标准应当根据土地区位、土地产值、土地供求关系和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综合因素确定，同时为了保证标准的公平性，应当由专业的第三方土地价格评估机构实施价格评估工作。

（2）赋予被征地农民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益

城市居民享有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障、生育保险、儿童卫生防疫免费服务、住房公积金等社会性权益保障，而农民却没有这类保障或者处于一种低水平保障的状态。但是长久以来就这一方面所造成的社会冲突并不太强烈，原因就在于农民拥有土地，土地拥有者社会保障的功能，只要农民还有土地在手中，担忧就会少很多。但是被征地农民已经失去土地，农民不得不走向劳动力市场。尽管当前农村家庭的主要收入普遍都不是来自于农业，但是由于他们没有同城市居民一样的经济权益与社会权益，最后还是要回到农村来。因此对于被征地农民来讲，必须赋予他们同城市居民同样的经济权益与社会权益，才能保障他们长久的生计不受征地的影响。

（3）扩大土地征收补偿的范围

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定当前的征地补偿安置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而修正案虽然增加了农民宅基地及房屋补偿、以及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但是可以看出的是仍然只是针对土地本身所做的补偿，并没有对因征地而造成的所有损失进行全面的赔偿。在实际工作中，应当进一步扩大土地征收补偿的范围，使之能涵盖失地农民的实际需求，包含领地损失补偿费、残地损失补偿、重新择业的成本等，设立就业基金、创业基金等，帮助农民减小被征地后的生活风险。

五、结论与讨论

征地拆迁过程中的失地农民，其显性脆弱性程度主要取决于完全依赖耕地的比重。他们在失地后直接收入的丧失，致使他们的收入在寻求可替代收入前的下降难以避免，且收入水平呈现出先升高后降低的整体态势。先升高主要表现在失地之初所获得的一次性征地补偿费用。此后，经济收入水平开始出现因人而异的趋势，总体呈升高态势，主要涉及自身除农业外的其他技能，以及是否走出农村转而从事第二或第三产业。而对局限于种植产业技能，无择业就业途经，从而开始从事打零工等情况的大部分失地农民而言，隐性脆弱性仍呈显著趋势，且隐性脆弱性程度与收入水平呈反相关系数。尤其是在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孝道理念和“四世同堂”的家庭文化愿景，伴随着改革开放与计划生育的时代洪流，让农村失地老人家庭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家庭形式日益成为学界对农民失地脆弱性的关注焦点，经济脆弱性增大他们的心理失衡感和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加剧“空心”的威胁，这也是研究后续希望聚焦探讨的一个重要方面。

此外，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无疑是农户的主旨。在利己主义的利益驱动下，农户经济脆弱性暴露出“被征地拆迁户的补偿价格大部分未能够达到作为指导的市场价格”的问题，征地拆迁后的再分配补偿结构的不合理蕴藏着结构性风险，可能会波及房地产市场和地方政府。在补偿安置满足市场价值的宏观把控下，地方政府在众口难调的价值取向仍应谨慎“开口”。因迫于压力而息事宁人的增加个别被拆迁户的利息补偿，会引发其他已离开拆迁地农户的内心失衡和仍未离开拆迁地农户的拖延意识。在此基础上，农户个人感知的两极分化会导致农户对自身失地脆弱性的主观判定失衡，认知的脆弱性程度存在超越实际脆弱性程度的风险，继而又回到利益纠缠的轨迹中去。

在源头分析过程中发现，农户对征地行为的前期期望过高、涉地政策、制度存在不一致、难平衡

的问题无疑是主要的方面。除此之外，公共利益不协调、公众参与不足、土地征收程序不合理、再分配利益失衡等亦是导致失地农户脆弱性的重要源头。因此，从认识上，一是应进一步使公共利益的界定明确化；二是抑制、调控失地农户过高的期望值以及盲目的攀比心理。从政策制度上，首先要进一步完善协调政策一致性；其次在集体土地征收程序中需增加事业认定程序等，进一步推动房屋征收程序的标准化；此外，应当从制度建设、内容补充、方式多元、补偿提高、相关者参与等多个角度，完善农村土地征收公告制度。从执政手段上，一方面要有效管制对于包括越级上访在内的不法行为，另一方面也要为农户考虑，尽可能提前落实安置房的分配、划拨等问题。

参考文献：

- [1]王春光，2005，《农村社会分化与农民负担》，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2-193。
- [2]唐忠新，1998，《贫困分化的社会学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29-143。
- [3]陆学艺，1991，《当代中国农村和当代中国农民》，北京：知识出版社：45。
- [4]李鹤、张平宇，2011，《全球变化背景下脆弱性研究进展与应用展望》，《地理科学进展》第7期。
- [5]李丽、白雪梅，2010，《中国城乡居民家庭脆弱性的测度与分解》，《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8期。
- [6]刘红丽，2011，《我国农村居民家庭脆弱性测度——基于 CHNS 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山西财经大学统计学系硕士论文。
- [7]张莉、王礼力、严惠云，2017，《农户收入满意度视角下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和甘肃省的实证分析》，《统计与信息决策》第10期。
- [8]安徽省统计局，2017，《安徽省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9]国家统计局，2017，《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02/t20170228_1467424.html.)
- [10]合肥市统计局，2017，《2017年统计年鉴》。
(http://tjj.hefei.gov.cn/8688/8689/2017nj/201712/t20171220_2427223.html.)
- [11]李小云、左停、叶敬忠，2004，《2003~2004中国农村情况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1-13。
- [12]赵旭东，2007，《背井离乡：谁忽悠了我们？》，《中国质量万里行》第4期。
- [13]习剑平、刘根，2015，《以权利本位重构中国的征地公告制度》，《理论月刊》第12期。
- [14]徐春鹰，2015，《土地征收实务探讨——兼谈云南晋宁征地冲突》，《浙江国土资源》第3期。
- [15]熊金武、王昉，2011，《“涨价归公”正义——对今日中国土地征收制度和房产税制度的反思》，《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第6期。
- [16]蔡继明，2017，《从法律上完善农村集体土地管理办法》，《农村工作通讯》第6期。

☆ 作者简介：王玥琳，河海大学社会学系2018级博士研究生

施国庆，河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责任编辑：胡 麟



空间、历史与发展： 全球叙事对地域社会研究的启示

——《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

李万伟

资本主义及现代世界的起源问题，是一个世界性课题，对此前人也给出不少解释，但这些解释往往走上两个极端，不是陷入“西方中心论”就是走向“民族中心论”，不是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贡献不够尊重，就是刻意抹杀欧洲地区对现代世界发展的客观作用。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通过全球史的研究方法，以全球棉花产业为载体，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重新解答。在时间上，将资本主义发展分为“战争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三个阶段，在空间上，跳出欧洲看欧洲，从全球各地的互动来关照资本主义发展。通过对多元时空的统合考察，贝克特揭示出“战争手段”对资本主义起源的重要作用，资本主义与“国家体制”的对立统一关系及其关系转变对资本主义发展、转折的影响，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讲述的是欧洲主导的棉花帝国兴衰的故事，全书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棉花贸易帝国在“战争资本主义”时代的创建与运作，主要包括本书的第1到第2章。第二部分阐述了棉花制造帝国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腾飞与发展，主要包括本书第3到第9章的内容。第三部分则阐述了全球棉花市场的重建及棉花销售帝国在“全球资本主义”后期的发展趋势，包括本书的第10到第14章。

一、“战争资本主义”与棉花贸易帝国

棉花贸易帝国的诞生，首先建基在全球棉花贸易市场的形成，而全球棉花贸易市场的形成则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公元10世纪以前、公元10—16世纪和公元16—18世纪。

^{*} 本研究受河海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2018B716X14) &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KYCX18_0499)——干旱地区耗水型产业发展的社会机制及其风险研究的支持。本文已刊发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04期。

公元 1000 年以前，棉花种植和加工主要集中在亚洲、非洲和美洲地区，以家庭生产为主，自产自销，较少具有商品性质。随着需求增加，棉花逐渐走出家庭，作坊生产棉花产品变得越来越普遍，职业织工在亚洲出现，为市场而进行的生产逐步增长，地方性贸易网络逐渐形成。此后，经过漫长的时间，棉花生产范围进一步扩大，棉花产品传播到世界各地，棉花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商品。但在全球棉花种植、加工和消费的网络中，欧洲人一直处于边缘地位，主要原因在于欧洲商人缺乏棉花原料来源和贸易地理优势，此时在全球棉花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印度和阿拉伯商人。16 世纪初期，哥伦布登陆美洲发现可以植棉的大批土地，及达·伽马绕过好望角与印度建立贸易关系，欧洲有了重塑全球棉花网络的可能。17 世纪，欧洲各国逐渐在印度成立东印度公司，欧洲武装商人介入亚洲贸易，用武力将曾经占主导地位的印度、阿拉伯商人从跨洋贸易中排挤出去，随后又用印度的棉纺织品在非洲换取奴隶运往新大陆开辟土地，一个欧洲人主导的将亚洲、非洲、美洲紧密联系起来的新贸易体系逐渐形成。到了 1780 年，整个欧洲，尤其是英国，已经成为世界棉花网络的中心。

斯文·贝克特认为，欧洲人之所以能在全球棉花贸易中取得主导地位，与“战争资本主义”的发展密不可分。“战争资本主义”是贝克特分析资本主义起源的独创性概念，也是本书的核心论点。“战争资本主义”将世界分为内、外两个区域，内部区域包括欧洲殖民帝国及其国家主导的秩序、法律、体制和习俗，外部区域则是受到帝国支配的其他地区，在这里原住民遭到屠戮，资源遭到掠夺，人民遭到奴役，大量土地被私人资本家占据（贝克特，2019）。“战争资本主义”重组了经济空间结构，多中心的世界逐渐变为单一中心的世界，以欧洲为主导的棉花贸易帝国正式诞生。

二、“工业资本主义”与棉花制造帝国

棉花制造帝国的诞生，与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密不可分。首先是工业革命起源于棉纺织工人对纺织工具的改造，而其催生的机器工业又推动了棉花制造帝国的发展。同时，在棉花制造帝国发展的过程中，欧洲在前期棉花贸易中形成的“战争资本主义”和“国家体制”对“工业资本主义”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对全球其他地区的发展带来极大阻碍。

1784 年，塞缪尔·格雷格在英国曼彻斯特创建第一家水力驱动纺纱厂，开启了机器革命，“工业资本主义”随之到来。但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却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前两个世纪“战争资本主义”的产物。英国资本家虽然控制了许多全球性棉花产品网络，但是过高的工资成本使其棉花产品无法在全球棉花市场与印度竞争。“战争资本主义”双轨制对内改造促使英国商人、发明家及制造商降低劳动成本，珍妮纺纱机、水力纺纱机、“骡机”等一系列纺织工具的发明提高了纺纱效率，英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下降，棉纱价格也很快低于印度棉纱，英国棉纺织业突飞猛涨。同时，“战争资本主义”对外开拓的经济渠道，也帮助英国棉纺织品扩展到亚洲、美洲和非洲等更多臣服于“战争资本主义”的地区。在这一过程中，“军事—财政”的“国家体制”促进了工业资本主义的扩张。

工业革命开启后，英国纺纱工厂的生产效率大增，旧有原棉供应网络供不应求，原棉价格随之增长，在旧大陆无法解决这一需求时，欧洲商人开始劝说加勒比地区的甘蔗种植园主扩种棉花。在政府支持和价格刺激下，加勒比地区的棉花种植业出现爆炸式增长，其中圣多明各占据着中心地位，而其

迅速扩张主要得益于非洲奴隶的进口，在 18 世纪 80 年代棉花繁荣的鼎盛时期，每年有近 3 万奴隶被运到圣多明各。1791 年圣多明各爆发奴隶起义，加勒比地区棉花出口量锐减，美国的棉花种植业却迎来了决定性突破，1793 年，伊莱·惠特尼发明新的轧花机，美国陆地棉加工突破技术瓶颈，从而带动了棉花种植业的迅速发展。为了大规模扩大棉花生产，美国种植园主引入成千上万的奴隶，并将棉花种植园引入西部和南部更广阔的地区。在棉花种植园主的支持下，联邦政府建立了一个“军事—棉花”综合体，驱逐印第安人原住民，侵略性地获得了许多新领土，“战争资本主义”的区域继续向外推进。

除了棉花原料供应，在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端，即制造工厂与工厂劳工的结合中，“国家体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工业革命主要是关于节省劳动力的技术，但生产率随着机器使用提高以后，棉花产品价格下降，需求增多，就需要更多劳动力参与进来，如何将工人迁入工厂就成为棉花帝国能否成功的关键。虽然依据旧的社会等级制度和权力关系如家长制，儿童、女性率先被动员进入工厂，但要把成千上万的人变成无产者并顺利进入工厂劳作还需要国家在削弱封建精英释放劳动力、压制工人阶级集体运动方面为资本家提供有效帮助。此时，棉花机器制造业集中于欧洲地区，主要原因就在于欧洲能够提供一个能够保护国内市场、进入偏远市场以及建设促进制造的基础设施的“国家体制”。对于欧洲以外的地区，之所以未能建立工业资本主义制度，决定性原因在于“战争资本主义”对外进行殖民扩张、奴隶贸易、发展奴隶制削弱了其他地区的国家能力，同时也限制了新式机器和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劳动力动员也就无从谈起，埃及、巴西和印度就是典型受“战争资本主义”削弱的国家。

三、“全球资本主义”与棉花销售帝国

“战争资本主义”催生了棉花制造帝国，繁荣了“工业资本主义”，但这种对外进行殖民扩张、对内进行劳工剥削的“战争手段”和“国家体制”并非一成不变。1861 年，美国内战爆发，全球棉花市场的最大原料供应链被切断，棉花制造帝国陷入危机。欧洲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发展国家工业，纷纷向殖民地政府施压，埃及、巴西和印度的棉花种植业迅速发展。美国奴隶制危机迫使世界更多地区卷入棉花资本主义生产，这虽然增加了原棉供应量，但也掀开了棉花制造帝国的衰落之幕。

首先，在“工业资本主义”未曾普及的地区，农民原先主要是为了家庭自用种植棉花，为市场种植处于次要位置，欧洲资本家为了改变农民的这种偏好，借助民族国家的权力，通过颁布合法的强制措施，迫使农民变为棉花种植工人。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利用合同法、新的土地财产权、铁路和帝国对领土的控制等手段，将自己的力量投射到世界农村，“工业资本主义”的制造业中心和这些地区的农村建立了新的关系，工业资本逐渐深入到棉花的实际种植者之中。资本家与政治家共同努力加快了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崩溃，越来越多的农民与全球市场相连接，劳动力、土地、资本和国家力量的重组得以完成。

其次，在棉花帝国内部，全球网络不断扩大其覆盖范围，新兴民族国家与传统帝国共同组成了新的全球网络，这些网络反过来又加强了各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力量。随着新兴民族国家的发展，全世界到处都是曼彻斯特，棉花不仅在世界的新地方种植，也越来越在世界的新地方被纺织和加工。一战以后，英国的棉花产业开始失去其全球优势，随后是欧洲大陆和美国，日本、印度、中国等亚洲国家

的棉花工业则迅速发展，全球棉花制造业出现地理大转移。棉花制造业大转移主要在于“国家体制”的不同作用：在新兴民族国家，民族资本家与支持本国工业化项目的“国家体制”相结合，利用工资较低的工人资源，加速了棉花制造业的地理改变；而在欧美国家，随着工人团体进入“国家体制”，其不断组织起来的为改善工资和工作条件的罢工获得国家默许，使劳动力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为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南方国家制造业发展开辟了新的可能。

二战结束后，取得独立地位的南方国家，通过更强大的国家力量整合领土、资源和劳动力，棉纺织工业走上高速发展的道路。欧美国家的棉产品制造业却在不断走下坡路，到了20世纪60年代，英国只占全球棉布出口量的2.8%，纺纱工人不过3万，欧洲对棉花制造帝国的统治悄然结束。今天，中国的纺织工厂拥有世界上近一半的纱锭和织机，消耗世界原棉产量的43%，而北美和西欧分别使用全球棉花产量的4.2%和0.7%。随着制造业转移，棉花种植中心也随之转移，棉花种植对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和非洲国家的经济变得极为重要。2012年，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产量占到全球棉花总产量的62%，其中印度和中国占到全球一半的水平。200多年后，全球棉花的种植、加工重心再次回到1780年以前的棉花产业中心地带。

然而故事并没有结束，欧洲虽然结束了对棉花制造帝国的统治，但并没有回到1780年以前的边缘地位。在全球棉花网络重心回归亚洲的同时，网络中的种植者、商人、制造商和国家的权力平衡也在发生变化，贝克特所称的“资本主义无休止的革命仍在继续”。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全球资本主义”阶段，资本的全球流动性加强，欧美商人逐渐摆脱了以前对特定国家的依赖，为了追逐利润在全球各地进行生产转移，从一个贫穷国家转移到一个更贫穷的国家。以沃尔玛、麦德龙、家乐福为代表的大型零售商和一些品牌服装销售商逐渐取代传统的制造商，成为棉花商品链的主导，棉花销售帝国在制造帝国的废墟中逐渐建成，而欧洲也再次成为新的棉花帝国的引领者。

四、贡献与启示

作为全球史的经典著作，贝克特在《棉花帝国》中运用的全球叙事方法，不仅对资本主义历史研究有巨大贡献，对于历史领域之外的地域社会及其产业发展研究也有很大启示。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棉花生产发展迅速，1982年，中国棉花总产360万吨，占世界棉花总产的24.4%，居世界第一位，2012年，中国棉花总产680万吨，占全球棉花总产29%，依然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棉花种植的主导者。但在中国棉花内部生产中，各地区并不均衡，新疆棉花生产一家独大，占中国棉花总产50%以上及世界棉花总量的15%，然而在30年前，新疆的棉花产量才不过15万吨，只占中国棉花总产的4%和世界棉花总产的1%。短短30年间，在中国棉花生产突飞猛进的同时，新疆地区也发生了剧烈变迁。棉花已经成为当地的经济命脉和主要农作物，这种大规模的棉花种植给当地带来巨大环境风险。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疆南部植棉区的主要灌溉水源塔里木河开始出现断流，90年代断流长度进一步扩大，到了2009年，断流长度超过了1200千米，断流时间也由1990年的16天发展到1995年的67天，2000年的127天，2008年增至228天，拯救塔里木河成为新疆社会各界的广泛呼声。

新疆地区在中国乃至世界棉花生产中占据如此重要地位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中国棉花生产空间转移的结果。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棉花生产发生两次空间大转移，第一次是 80 年代棉花生产重心从长江流域北移到华北地区，第二次是 90 年代华北地区棉花生产下降，棉花生产重心西移到新疆地区。这两次空间大转移背后既有国家的力量，也有资本的支持，还有环境、技术等方面的影响，同时也与中国棉花及棉织品在全球棉花市场中的消涨有所关联。结合对新疆地域社会及其棉花产业的研究，笔者认为本书可以提供以下三点借鉴。

第一，全面考察新疆社会及其棉花产业的发展历程。全面考察的基础在于全面占有资料和深入调研，为了从全球视野来考察棉花，贝克特曾在全球各地高校和研究所从事档案研究，可以说，为了写好这本书，作者的足迹几乎遍布任何有棉花出没过地方，所以这本书才能够呈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丰富的棉花信息。由是观之，我们在做某一地域研究的时候，即使不能从全球范围占有资料，但也要尽量跳出特定地域局限，从更大范围搜集资料。新疆地区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其棉花产业受中国棉花产业乃至全球棉花产业发展的影响，因此，对于新疆社会及其棉花产业的研究，不可避免要从全国乃至全球范围搜集资料进行分析。

第二，突破地方叙事的局限，注重考察特定地域社会在整个网络中的位置以及网络中不同主体的关联互动。全球叙事帮助贝克特突破了国家史和地方史的局限，使我们看到地方性历史和全球史之间的联系及它们之间在更大一个网络中的相互关联。在新的叙事框架下，“棉花帝国的故事犹如一部宏大的交响乐章，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主旋律下，各种相关的历史变奏曲都在其中得到了恰到好处的演绎。”全球史写作与其他历史写作不同，它不仅关注历史进程中的历时性，更关注同时性和共时性，也即关心在同一个时间点上不同地方存在的某些现象之间有什么联系？换句话说，它青睐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奥斯特哈默，2018）。当然，这里所讲的空间，并不是指纯粹的地理空间，而是指依托于空间的互动，毕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群通过接触，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领域实现的互动，是全球史观的核心理念（刘新成，2009）。因此，我们在研究新疆地域社会及其棉花产业时，要在不同地区不同主体之间互动的视角下去观察，毕竟新疆棉花急剧大规模发展与我国主产棉区的空间转移密切相关，而我国棉花产业的发展又与全球棉花产业的空间转移不无关联。

第三，特别注重透过不同地区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发掘某一地域社会发展转型的动力机制。通过分析对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互动”（更多是欧洲单方面的入侵、剥削、霸权和管控）历程，贝克特发掘出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战争手段”和“国家体制”，使我们认识到不同阶段资本主义共同分享一些本质性的特征，如暴力的使用、对外部领土资源的占有、对不同空间劳动力队伍的重组、跨国网络的建设以及资本主义与“国家”的结盟等，这些特征并不是在工业资本主义才出现，而是起源于战争资本主义，并在工业资本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继续使用，只是方式不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互动”愈益增多，西方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对我国影响也愈加深入，新疆虽然地处我国边缘地带，但在市场浪潮的冲击下也概莫能外。因此，借鉴叶敬忠教授倡导的“中心—边缘”的分析范式，从市场、科技、环境、政策等维度讲述后发国家边缘地带的农业生产故事（叶敬忠，

2015), 深入分析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 以及边缘国家内部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的“互动”, 或许可以发掘出新疆棉花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

参考文献:

- [1] 奥斯特哈默, 2018, 《关于全球史的时间问题》,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1 期。
- [2] 贝克特, 2019, 《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 徐轶杰、杨燕译,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 [3] 刘新成, 2009, 《互动:全球史观的核心理念》, 《全球史评论(第二辑)》, 第 3 期。
- [4] 叶敬忠, 2015, 《发展的故事:幻象的形成与破灭》,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作者简介: 李万伟,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6 级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 白静艳

※ ※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社会心态与行为”调查成果正式发布

——呼吁统筹兼顾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

近日,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社会心态与行为”调查成果正式发布。调查发现, 全国人民对疫情防控十分重视, 能够客观认知疫情风险, 充分认可政府制定的政策和采取的防控举措, 及时调整出行计划和生活方式, 通过多种媒体关注疫情和学习防疫知识, 积极主动参与疫情防控, 对战胜疫情持积极乐观心态。调查表明, 人们最为关注疫情后社会经济秩序恢复及发展问题, 希望各级党委、政府统筹兼顾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秩序恢复及发展。

全民动员、成效显著, 公众对政府防疫措施接受度很高

此次调查于 2020 年 2 月 10-18 日进行, 由河海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组织和完成, 河海大学长江保护与绿色发展研究院、公共管理学院社会调查中心、亚洲研究中心等参与调查工作。受访者包括全国各地的中国公民, 受访者年龄覆盖各个年龄段, 但主要集中在 18-50 岁, 非农业户籍人口占 55.69%, 本科和研究生学历占 51.38%。调查采用滚雪球方法, 网上填写问卷, 截止 2 月 19 日零点在全国范围内获取有效问卷 8138 份。调查维度包括公众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关注、态度、行为方式和影响感知, 以及下一步社会经济秩序恢复行为的认知等。

调查表明, 97%受访者表示“非常重视”(79%)和“比较重视”(18%)疫情发展, 96%受访者认为疫情“非常严重”(79%)和“比较严重”(18%)。16%受访者在 12 月 31 日之后、41%的受访者是从钟南山院士提出“人传人”后才开始高度关注新冠肺炎疫情的新闻。受访者对所在小区、社区、街

道的疫情发生情况知情，对确诊、疑似患者普遍表示同情。对打赢对抗新冠肺炎战役，93%受访者表示“非常有信心”（73%）和“比较有信心”（20%）。

调查发起者、河海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施国庆表示，受访者对疫情知识有较正确的认知，主要关注新冠肺炎疫情的形成机制、防范办法、受影响城市信息和应对措施。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严重，信息传播途径多元化，新兴媒体作用显著，对于控制、战胜疫情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在疫情对公众行为与家庭生活的影响方面，调查显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93.64%受访者及时调整春节假期计划，99%受访者调整生活方式。春节期间网购行为呈复杂状态，54.07%受访者明显减少，但是显著增加和有所增加的也分别占12.32%、13.98%，部分家庭生活（31.81%）、工作（15.87%）、收入（24.06%）和心理（18.33%）受到一定负面，但仍在可承受范围之内。82%的受访者对周围的疫情预防措施给予正面评价。

在政府防疫措施的公众感知方面，调查显示，公众对政府防疫措施的接受度很高。89.86%受访者认为，采取的措施非常有效（41.35%）和比较有效（48.51%）。对各地采取的21项措施中，绝大部分受访者都认为，所在社区和地方政府落实到位，基层社区和组织也在防疫措施的落实中发挥重要作用。

统筹兼顾、变危为机，打赢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双硬仗

在公众对疫情社会经济影响的感知方面，疫情控制后公众最关注的是社会经济问题。调查显示，受访者普遍认为疫情对经济衰退、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影响最大，其次是国家财政耗费、经济损失、国力受到影响，接下来影响较大的依次是境外投资、贸易活动减少、效益下降，小微企业倒闭、职工下岗失业，大中型企业亏损、绩效下降，应完善流行病防控运行机制等。

施国庆介绍，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后社会经济秩序恢复方面，公众关注较多的包括公共交通、学校、餐饮商贸旅游业、居民日常生活、工业企业单位生产等恢复正常。人们普遍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只是暂时，希望能在疫情控制之后尽快恢复城市交通、生产、生活和学校教育。

但受访者对下一阶段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恢复的态度复杂。调查中，93.88%受访者认为需“酌情采取其他有必要的措施”，96.87%受访者认为“仍然需要继续防控，直至疫情完全结束再恢复工作和正常生产生活和学习”。56.51%受访者认可“应该抓紧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和学习”，但是55.57%受访者和68.16%受访者对“学生可以正常恢复上课”和“企业正常开工、商业正常开业”表示不同意，占比相对较大。

施国庆表示，受访者对下一阶段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恢复态度复杂，希望政府根据疫情形势变化灵活决策，一手抓疫情统一精准防控工作，一手抓城市社会经济秩序恢复工作，统筹兼顾，变危为机，全面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生产、消费模式，一定能够继续打赢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恢复发展双硬仗。

文明的幻象

——读福柯《疯癫与文明》

郭雪萍

摘要：福柯从科学史的角度出发，对人类习以为常的“疯癫”与“文明”的二元形象进行重新诠释。通过将对疯癫的描述嵌入各个时期不同的社会模式中，揭示了权力场域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强关系。福柯笔下从理性的崛起到疯癫的失语的三个历史阶段，具体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理性与疯癫的“交响”、古典时期理性对疯癫的排斥以及近现代时期理性对疯癫的征服，认为人类社会的文明史，实则只是权力场域建构起的“正义剧场”。

关键词：理性 疯癫 权力建构

“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米歇尔·福柯，2012：1）

——帕斯卡

《疯癫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一书是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成名之作，作者强烈的反抗与怀疑精神在该书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作者从科学史的角度出发，对人类习以为常的“疯癫”与“文明”的二元形象进行重新诠释，并给与科学社会史一种新的阐释。在福柯看来，所谓的文明史并非是人类文明本身的历史，而是人类如何看待和调解与文明相对应的疯癫的历史。换言之，人类社会的文明史应是疯癫与文明相互作用的产物，而不应成为绝唱的一方和独唱的另一方。

相较于强调主体取向的戈夫曼和舒茨，福柯则更为注重关系取向。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福柯把对疯癫的描述嵌入不同时期差异化的社会模式中，揭示权力场域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强关系，以一种考古的形式对权力建构下的文明史进行解构，从而撼动传统意义上权力建构下的文明史所标榜的真实与客观。作者在书中还强调，人们在谈论那些重新置于历史之中的行动时，应该将一切可能被视为结论或躲在真理名下的东西予以“悬置”（米歇尔·福柯，2012：2）。质言之，我们不可将理性与非理性的过往行为视为理所当然，而是应该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重新审视他们之间的关系。

一、从理性的崛起到疯癫的失语：三个历史阶段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疯癫与文明似乎生来相悖，但二者实则只是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模式下发生

的关于不同群体的故事。在福柯看来，理性与疯癫的二元对立并非是天然的，而是由不同时期历史文化话语建构的特殊结果。

（一）文艺复兴时期——理性与疯癫的“交响”

文艺复兴之前的中世纪，疯癫的显性载体是“麻风病”，当时的西方世界为了消除这种疾病，在社会上设立了许多麻风病院，作为切断病源的“隔离墙”。而“麻风病”本身在历史语境中则作为早期“不成熟”的疯癫形象出场，但也正是在这种疯癫的陪衬下，理性才得以显现并发展。

文艺复兴时期，作为威胁社会稳定的麻风病被控制，且渐被人们忘却。疯癫开始取代中世纪麻风病的角色，步入人类历史，并成为人类文明进程中不可抹灭的一股力量。同时，作为一种社会区隔手段的“愚人船”出现，它传承于中世纪人们隔离麻风病人的手段，是一种潜意识的社会排斥手段。但不同的是，该时期疯癫是作为一种文学形象和日常现象相伴出现的，“其意义暧昧纷杂：既是威胁又是嘲弄对象，既是尘世无理性的晕狂，又是人们可怜的笑柄。”（米歇尔·福柯，2012：15）可以看出，人们虽然仍把疯癫作为一种社会不安的象征，但是也会把当成是一种让人啼笑皆非的记忆符号。总体来看，该时期人们对于疯癫的态度是相对温和的甚至是友善的，疯癫和理性一样都是一种日常现象，一种文学作品中的重要形象，理性对于疯癫并没有非常强力的排斥，正如书上所言“疯癫不再是人们所熟知的这个世界的异相，对于这个局外观察者来说，它完全是一个普通景观，是一个时代的特征。”（米歇尔·福柯，2012：29）因此，这是一个疯癫与理性“共舞”的时代。

（二）古典时期——理性对疯癫的排斥

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性与疯癫，即便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已有一种缓慢的分裂，但尚未达到完全分裂的状态。但到了古典时期，“疯癫便不再是揭示理性所无法达到领域的力量了，而逐渐成为理性的仪仗和随从。”自此，疯癫开始在理性的支配下活动，并开始用一种特殊的社会强制行动“大禁闭”使疯癫归于沉默。疯癫再也不能像文艺复兴时期那般神游，而是由理性将其拉归现实，并将其置于理性的反面。理性开始对疯癫进行解剖和研究，并愈渐拥有言说疯癫的权力。

这一时期，疯癫不再只是一种奇特的生理或心理现象，而是被当作一种威胁社会稳定的“社会公害”。在最初的禁闭所中，疯人与穷人、失业者、囚犯等被一同监禁管理，被视为危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寄生虫”。于是将其禁闭的原因在于迫使其劳动，以劳动缓解和消除社会危机。福柯认为这种做法是无效的，因为它是工业化初期的利益导向的社会整治手段，对于疯人未能从人性视角出发善待他们，而是基于所谓的劳动道德准则，试图以劳动作为其赎罪的方式，“在整个欧洲的新教地区都建立起道德秩序的堡垒”。（米歇尔·福柯，2012：61）在此，道德被视为一种理想彼岸，“劳动规定是作为道德改造和约束的一种练习而被制度化”，理性以道德提升作为言由支配着非理性。由此，疯癫并没有得到丝毫的理解，取而代之的是被排斥在社会共同体之外。在这种排斥机制下，关于疯癫的体验也逐渐消失。

（三）近现代——理性对疯癫的征服

古典时期从理性视角对疯癫进行论述，并试图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其进行纠偏。到了十九和二十

世纪，人们对于疯癫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疯癫不仅被当作一种道德缺失，还是一种理性缺失，换言之，理性需要对疯癫这一非理性的形象进行一种理性矫治，将其强行拉回到理性的秩序中，“恢复对自我的意识，成为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主体，从而恢复理性。”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精神病院的兴起是有力印证，疯人的行为受到严格的监管和道德约束。在精神病院里，疯人自身也只是一群被监禁的“动物”。需要注意的是，他们的一举一动不仅有来自外在社会理性的监视，还有来自自身的审视。质言之，疯癫对于被禁闭或改造的做法在逐渐接受，也不再进行任何形式的抗争，他们就像一群未成年孩子，接受着来自理性的摆弄。理性在此过程中成功塑造了自己的地位，并逐渐拥有对疯癫进行言说和支配的绝对权威。于此，疯癫“在禁闭城堡中听命于理性、受制于道德戒律，在漫漫黑夜中度日。”（米歇尔·福柯，2012：63）

二、人类社会的“文明史”：权力建构起的“正义剧场”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把疯癫视为理性权威发挥的载体，而理性抑或文明本身在其看来是权力建构的产物。中世纪麻风病人的消失，并不是医疗的结果，而是社会权力机制作用的结果，即用强制性的隔离手段为社会切断病源，这个过程消除的不仅是麻风病，更是一个个鲜活的人，这一切都是背后权力机制运作的结果。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种权力结构依然有所传承，“愚人船”取代麻风病院，成为排斥疯人的重要手段。另外更重要的是，愚人航海驶向的是一片茫茫无际的大海，不仅是水有净化作用，更重要的是，海域对于那个时期的人们来说，是不可知的神秘世界。理性选择让疯癫独自走进那片神秘领域，以确保对已知世界的控制权威。此外，尽管这一时期疯癫形象仍然会出现在文学作品里，试图做出自由的呼喊，但是大多最终还是走向毁灭和死亡，因而疯癫与理性的博弈本质上还是权力场运作的结果，且最终以疯癫退出告终。古典时期更是不给予疯癫任何的话语表达机会，直接通过禁闭的方式对其监管，这是权力机制衍生并强化的表现。在这一阶段，“禁闭也成为各种滥用权力因素的大杂烩”（米歇尔·福柯，2012：46）直到近现代时期，精神病院的建立，疯癫彻底失去与理性对话的机会，他们自己处于权力的监管之下，并逐渐向权力保护下的理性屈服。

因此，无论是中世纪的麻风病人还是之后的疯癫诸相，他们都没有太多的话语权，并逐步被置于理性的掌控和支配之下。在此基础上建构起的人类文明史，实则是权力导向下的“正义剧场”。他们打着维护社会稳定，拯救道德的旗号尽情的表演，在历史长河中逐渐迷失自我。一种自我迷醉式的“文明的骄傲”被建构而起，并试图对社会的非理性进行矫正和纠偏。具体有两种表现：一种是掌权者的过度自信；另一种是“附庸者”的过度追随。在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中，权力自诞生之日似乎就充满了“正义感”，它能够将掌权者的欲望轻易美化，同时还能有意或无意地让人们甘愿成为权力的附庸。

在该书中，福柯描述的理性对于疯癫的规制，实则是揭示了掌权者对自我的过度自信，以及另一部分无权但渴权的人的过度追随，前者为后者建构了一种“理性”视角的评价机制，后者依据前者提供的标准对疯癫进行审判。从戈夫曼的“拟剧论”视角来看，这本质上就是权力建构的“正义”剧场，不同场域的群体共同参与表演形成一个“剧班”，并不断以各种方式强化自身角色认知。同时面临社会情境的不断变化，处于主导型地位的权力场域会适时调整自己话语、行动等方面的符号机制，及时向

剧班的其他群体传递，以让“表演”的现实情境更加稳定化，从而和思想的理性化进行互动表达。

实际上，权力场既不了解也不真正关心疯癫人的生活，只是在自己的幻想中做出所谓的“理性”抉择。无论是古典时期的愚人船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大禁闭，其真正意图都不是为了解救疯癫，而是按照一部分人的好恶来驱赶另一部分人，根本上还是对“人”的不平等关注。所谓理性真正在做的事情，不过是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借口，让人们按照自己想象的指挥棒翩翩起舞而已。正如福柯在书中所述，“疯癫以一种几乎静止的运动抓住自己而又放弃自己。”（米歇尔·福柯，2012：260）

三、结语

人类的理性试图对疯癫进行一种道德和精神上的纠偏，但是反观历史，我们会发现，权力让我们开始迷失在其建构的现实里，使我们忘却了曾经的道德准则。理性与疯癫，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明，我想不可妄下决断。福柯的《疯癫与文明》无非是想告诉我们，权力建构下的文明只是一种幻象，将疯癫予以禁闭，于社会而言，并非一剂良药，反倒是一种病态文明。原子化的社会，每个个体都是在吞下经权力意识简化扭曲后的“社会事实”，并在幻想中融合为狂热的集体。

从福柯对于不同阶段的理性与疯癫的阐述，可以发现，权力所忽视的是，在不同时代和人群中，存在差异化的文明特质。我们需要做的是理解而非指控或排斥。“尊敬疯癫并不是要把它解释成不由自主地、不可避免的突发疾病，而是承认这个人类真相的最低界限。”（米歇尔·福柯，2012：79）从人类理性与疯癫博弈的角度看，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记录不足以展现和穷尽在权力规则下所能发生的全部情况，需要用颇为不同的理论视角和科学行为来解释和解决。因此，《疯癫与文明》的经典之处，并不只是在于对权力话语的批判。它还试图帮助人类去重新认识疯癫与理性，重新理解这样一对看似对立实则一体两面的二元形象。

疯癫与文明之间历来存在一种张力，二者之间的博弈关系在当代社会中亦有体现，如掌握话语权的大众传媒，其奉行的新闻专业主义，时常被人们认为是理性的权威。在人类社会，它们反映民意的同时又引导着大众舆论，享有对社会话语建构的极大权力。人们把那些体察民情、深解民意的新闻从业者作为理性的代表。但是伴随市场结构的利益驱动，新闻媒体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通常只是意识上的一瞬。原本作为针砭时弊、对抗不公的社会武器，却在利益的驱动下逐渐沦为煽动民众狂热情绪的危险工具。尤其在后真相时代的当下，大众传媒借助抽象的意识形态与焦灼的民意来建构虚幻的现实，逐渐成为常态。但即便如此，我仍然期待这个社会归于理性的那一刻，媒体能够真正充分地通达各方意见。我们的大众也能够不再对我们身边同类予以更多“污名化”的审判，我们相信这一天终究会到来，用福柯的话来说，“当疯癫终于被按照我们长期以来视而不见的真理来认识和对待时，是一个多么幸福的时代。”（米歇尔·福柯，2002：267）

参考文献：

[1]米歇尔·福柯，2012，《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作者简介：郭雪萍，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9 级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吴 娟



乡村 社会

互动仪式链理论对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价值旨向的 启示*

任贵州

摘 要：借助互动仪式链的理论分析，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是高度仪式性的，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不断的仪式互动中得以确定和强化，公共文化框架下情感能量的积蓄与交换促成了乡土人对乡村共同体的认同与依赖。这种以仪式互动塑造生活记忆并形成共同体意识的运作逻辑对现代乡村社区治理具有借鉴意义。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下，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公共文化符号塑造逻辑能否得以改造并运用到现代生活之中，公共文化服务的价值旨向与运行机制起着重要作用。对照互动仪式链理论及乡土社会的运行分析，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在文化符号嵌入、仪式活动配套、乡民主体参与、互动仪式实效上存在旨向偏离，而在现代社会不断强化文化价值引导、情感能量积蓄、乡民文化参与和集体行动指引，进一步革新和塑造乡村共同体精神，是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设计的重要方向。

关键词：互动仪式链理论 乡土社会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 价值旨向

从 17 世纪的欧洲到 18 世纪的美洲再到 19 世纪的亚洲，一个与传统社会迥然不同的全新的社会样态逐渐形成，无论是斯宾塞的“尚武社会-工业社会”还是索罗金的“亲密关系-契约关系”，抑或是费孝通先生的“礼俗社会-法理社会”，都在诠释现代性给人性与社会秩序带来的巨变^[1]。中国乡村社会自然也经历着这场巨变。

中国乡土社会是基于血缘关系形成的，这种关系下，各类文化活动（如红白事、庙事、社火等）通过社会继替演化为固定的互动仪式而得以传承，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不断的仪式互动中得以确定和强化^[2]。互动仪式使得乡土人在共同关注点和共享情绪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相互交流，共同情绪不断升华，驱散异化思维，进而产生集体归属感和群体团结感^[3]。此外，中国乡土社会的互动仪式贯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农业税时代’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村民投入意愿及激励机制研究”（13BSH02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大研究项目培育专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网络的空间布局及协同发展策略研究”（2016B10014）；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现代农村社区共同体精神的构筑机制研究”（2016ZDIXM009）。本文已刊发于《宁夏社会科学》，2019 年 06 期。

穿着各类“人情交换”活动，“人情交换”反过来又限制着冲突和竞争，因而乡土社会是稳定的。伴随现代性对经济关系的重塑，以及近代以来政治权力在乡村的强势注入到逐渐抽离，传统乡土社会的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经历着巨大变革。社会生活的不断发达使得传统互动仪式的数量、形态、功能发生变化，互动仪式的共同体塑造功能逐渐消减。与此同时，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突破了原有的血缘关系网络，使得人情互动在权利义务平衡维持上逐渐式微，也就导致学界常提到的“乡土社会关系松散化、乡土人行动的原子化”，乡村共同体面临解构风险。此种背景下，如何在变革中汲取乡土社会治理的内在动能，并在现代乡村社区加强对个体行动的规训和对社会结构的再整合，将是后现代背景下中国乡村社会发展亟待明确的议题。

因文化符号的嵌入，公共文化所具备的意识规训前置性、演化性和再生产性决定了公共文化服务在行为规约、秩序维持、价值塑造上的特有效能，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思路不可一般地套用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共产品供需框架，而应充分挖掘其在公民理性塑造与公共价值引导上的功能，将公共文化服务作为衔接微观行为规塑和宏观文化治理的重要纽带。面对乡土社会互动仪式的衰弱，公共文化服务所包含的各类文化活动是否可以作为现代性背景下乡村仪式互动的新形式，公共文化服务内涵的文化价值符号是否可以内化于新时代集聚乡村文化振兴力量的共同体精神，这两点亟待深入探讨。在乡村社会急速变革的时代，系统梳理公共文化服务建构符号认同的功能，探讨以公共文化服务更新乡村社会互动仪式的具体策略，对于重塑乡村和谐生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的互动仪式链理论进行回顾，对乡土中国社会秩序的运行逻辑进行剖析，进而挖掘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文化治理价值，为以乡村文化振兴促乡村振兴提供理路借鉴。

一、互动仪式链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在耦合

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的关系一直是西方社会学理论长期争论的焦点。柯林斯通过提出“互动仪式链（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简称 IRs）”理论，试图将微观社会学和宏观社会学统一起来。他认为微观与宏观的区分只不过是偶然在一系列局部情境中发生的相联系的实际存在的结构的不同方面。宏观结构是微观际遇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积累，而“互动仪式”及其经由时间延伸、以文化资本（capital culture，简称 CC）和情感能量（emotional energy，简称 EE）的加强与延续组合起来形成宛如“链条（chains）”的结构，建构起了微观情境与宏观结构的连续统^[4]。

在柯林斯之前，仪式分析主要分散于潜认知仪式主义、功能主义仪式主义和结构主义仪式分析，而对互动仪式链理论影响最大的当属前两者。涂尔干的宗教仪式研究是潜认知仪式主义的代表，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1912）中，涂尔干认为仪式具有塑造集体意识的功能，在他看来：“宗教是一种与神圣事务有关的信仰和仪轨所组成的统一体系”，其主要成分并不是它的教义部分，而是它的集体仪式活动。宗教仪式以一种共同的目标把人们团结在统一的社会生活中，并持续地加强着信仰、情感和道德责任，从而促进社会的整合^[5]。功能主义互动仪式论以拉德克里夫·布朗（Radcliffe-Brown）为代表，强调仪式在引燃群体情感过程中所呈现的积蓄威力和群体整合的作用。随后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从情境的功能需要角度研究了大量日常生活中的仪式现

象，认为社会生活中存在大量的社会际遇结构，人们彼此有直接的身体在场就形成了际遇，而际遇结构中的关键因素是有一个单一的情境定义。在此基础上戈夫曼将“互动仪式”操作化为一种表达意义性的程序化活动，这类活动对群体生活或团结性具有象征性意义^[6]。同时，单一的情境定义在多次连续性的仪式互动后形成对某一事物的一致看法或价值判断，这是形成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础。

基于对涂尔干的宗教仪式、戈夫曼的拟剧仪式以及常人方法论的整合分析，柯林斯对互动、互动仪式、互动仪式链做了明确阐述，对产生于互动仪式过程的文化资本（CC）与情感能量（EE）进行了系统分析。他认为互动存在于一定的情境之中，是参与者在共同的关注焦点下彼此相应感受到对方身体的微观节奏和情感。同时参与者对局外人设定界限，明确参与成员的范围，将注意力集中在共同的互动符号之上，从而形成关注的焦点，加上参与者之间分享共同的情绪或情感体验，最终产生互动仪式。多重互动仪式的组合与扩散形成互动仪式链，进而组成社会关系的基本架构。仪式的作用机制是互动仪式链理论的核心问题，柯林斯认为互动仪式的核心机制是相互关注和情感连带，即互动仪式在参与成员间形成了一种瞬间共有的实在，进而产生群体团结、道德感和群体成员身份的符号（社会关系符号）。在柯林斯看来，互动仪式得以延续和传递的关键在于情感能量（EE）的产生，这是一种采取行动时自信、兴高采烈、有力量、满腔热忱与主动进取的感觉。情感能量不仅是互动的真正驱动力，还是集体行动中支配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只要人们意识到在某一仪式中情感能量（EE）的花费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多回报，他们就会参与其中，从共同关注的焦点、情绪、共鸣和符号来获得回报。同样，人们在互动仪式中投入更多情感能量却不能得到充分的情感回报时，就会转向其他的获益更多的互动仪式中去^[7]。

柯林斯将互动仪式视角与理性行动者视角进行对比，理性行动假设所有的社会行动个体试图将其相对于行动成本的预期收益最大化，致力于从微观互动中建立普遍解释性的行动理论，但柯林斯认为理性行动理论从有动机的行动者开始，较大程度上避免了将诸如文化或结构等宏观实体具体化，因而不能全面概括所有的行动逻辑。这是因为很多通常由道德或价值激发的行为（如情感行为、利他主义）无法依据成本/收益进行分析，且没有共同的衡量标准使行动者能够比较不同行动领域的成本与收益，大多数个体在自然情境中很少算计，无意识的行为与有意识的算计行为最终有可能达到同样的结果。以上三个困扰理性行动者的问题用互动仪式链理论却可以解释，一是情感的、符号的与价值导向的行为取决于互动仪式（IRs）的动态过程，有群体团结的体验产生的情感能量（EE）是社会互动的首要益处；二是互动仪式（IRs）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情感能量（EE），而 EE 作为共同标准决定着在可选择的行动方向与完全不同的行为场所中选择 EE 流的最大化^[8]；三是隔日的思维是由互动仪式所产生的情感能量（EE）和认知符号决定的，这与费算计行为的微观情境证据是一致的。因此，成功的互动仪式（IRs）给予个体情感能量和成员身份符号，后者又可作为文化资本再投资，从而形成进一步的 IRs。其结果将会形成同一种间断性的 IRs 链，一旦短期饱和的时期结束，仪式就会重复。重复的仪式互动不断深化着行动者对组织符号的认知与认同。

据此，回顾人性与社会秩序的变迁，人类社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互动仪式，而仪式的类型反映

了社会关系的类型。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人们的活动是高度仪式性的，“礼”是乡土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是有效应付生活问题和调谐社会关系的重要前提。在长期的基于血缘关系的教化过程中，乡土人对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不加追究，只按照规定的方法做，这套行为便是所谓的仪式，即“礼”是按照仪式做的意思^[9]。从婴儿出生进入抚育家庭，他（她）就经历着社会早已形成的各类仪式活动，无论是个体性仪式（开蒙礼、成人礼、新婚礼、壮行礼等）还是公共性仪式（春节祈福礼、清明崇先礼、重阳敬老礼、民俗庆典礼），都通过情感能量（EE）的传递潜移默化地强化着传统规矩在社会运行中的治理权威。因此，乡土人是不需要算计的，他们只需要按照传承下来的规矩办事，就可以获得邻里的尊重和亲友的帮助，礼治社会自在运行。正如柯林斯所论，长时期、不断重复的互动仪式给予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以价值符号力量，以情感能量为媒介，乡土人在各类互动仪式中不断塑造着自身对乡村共同体的价值认同。此外，互动仪式中情感能量是不断交换的，因而乡土人各自的情感能量是不对等的，拥有较多情感能量的人能够指挥别人的行动^[10]。在乡土社会，拥有较多情感能量的乡土士绅或宗族族长在交往关系中获得的受重视、受礼遇、受关照的感情力量和感情筹码，进而在公共活动中收获支配权力，作为规矩的代理人维持着乡村共同体的稳定^[11]，规矩是在不断的情感能量交换中形成的。

与乡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的人类活动是低度仪式性的，这与社会变迁及由此造成的人们观念的变化有较大关系，市场化的经济结构打破了乡土社会在地域、亲缘上相对固定的成员关系，互联网发展推动下的业缘、情缘、趣缘互动浸染着传统社会的血缘秩序。在当前的乡村社区，传统互动仪式的内涵、形态、功能以及组织形式发不断衰弱，每个人在公共空间中获取的情感能量逐渐减少且不稳定，传统规矩无法依靠相对固定的单个人来代理执行，随之而来的传统权威的式微、公共认同的流失、个体化浪潮的兴起也在情理之中^[12]。现代性影响下，社会系统内部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心理结构、价值观念、分配形式等都有着深刻的变革，囿于传统与现代的制度交织、变与不变观念共生、公与私的利益纠葛等，尤其是“城乡分治、一国两策”带来的发展心理失衡，乡土社会各类“合于礼”的仪式活动丧失作用，农民经历着“精神贫困”，即囿于种种发展障碍和制约因素，造成农民在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知识水平、价值观念、价值取向以及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落后于社会主要物质生产方式，是一个主要反映人的追求、信念的价值理性范畴^[13]。借助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分析，当代乡村振兴亟需一种连接个体行动规塑与宏观价值引导的组织机制，以新时代的治理价值改造乡土社会的互动框架，充分借助互动仪式中情感能量的行动支配与符号塑造作用，延展和强化乡村社会主流价值，建构乡村社区成员公共参与的新惯习和对乡村共同体新的认同，以乡村文化的振兴破解“精神贫困”之笼。

公共文化服务是公共部门向公众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制度与系统的总称。与互动仪式链通过文化资本与情感能量的延续组合从而建构微观情境与宏观结构内在联系相耦合，公共文化服务作为一种国家意志在社会和个人间推行的重要载体，具有微观文化仪式组织、群体符号建构、宏观文化治理的功能，其联结“国家-社会-个人”价值链条、规训社会成员行为、塑造共同体精神的作用也得以

凸显^[14]。从这个角度分析,可以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作为农村社区公共空间重塑的外在推力,承担起将“规矩”重新在现代乡村社区落地的功能:一是国家治理层面可以借助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的生产形成对乡村社区发展的总体价值引导,将国家意志通过服务产品的供给传输至乡村社区,革新乡村社区治理的价值符号;二是基层治理层面可以通过各类现代性公共文化活动的组织重塑公众参与的际遇和空间,为乡民在大范围、高频次的公众参与中重新积蓄情感能量并进行能量交换创造条件,以强化乡民对社区共同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三是充分发挥各类文化活动的整合作用,即将每一次仪式活动作为一种情境的重现,日积月累,使乡民在同类情境中逐渐形成相同的情境定义,从而产生集体行动的价值基础^[15]。

可以说,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于公于私的各类仪式活动对乡土人是一种公共空间的营造,带来的是情感互动与集体认同。仪式所能带来的热情越高涨,它对群体的威力越大,对群体的整合力量也就越大。将公共文化服务作为新时代背景下乡村各类新型仪式活动开展的外在催化剂,就是在现代性变革中汲取乡土社会治理的内在动能,同时加强对个体行动的规训和对社会结构的再整合。通过各类带有文化符号的仪式活动促成公共参与的现代转型,形成对乡村公共价值的重新塑造和共同体精神的再培育。

二、互动仪式链论域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旨向偏差

将互动仪式链作为个体情境行动的理想类型并对中国乡土社会的个体行动逻辑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传统“文化根底”影响下的互动仪式积累促成了传统“礼治”的社会。互动仪式链论域下,与现代国家公共精神相契合的公共文化服务应当成为时下乡村社区共同体重塑的重要推力,在公共价值塑造、互动空间搭建、主体意识培育、成员关系调谐上形成动力机制。细致分析时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实际运作,确存较多旨向偏差,亟待得到优化。

(一) 重视产品供给,忽视文化符号嵌入

公共性是文化的本质特征,因文化符号的嵌入,关涉价值引导、关系调谐、情境建构的价值符号贯穿于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过程。互动仪式链理论认为群体符号是“标志或其他的价值代表物(形象化图标、文字、姿势)”,价值符号以具体形象的物质实体承载抽象高深的价值理念,使互动价值以形象化的符号展现出来,对激发互动仪式中的情感能量、促进主体间的协同合作、塑造集体行动具有重要意义。公共文化服务是建构公共性的过程,是将国家主流价值符号输入乡村社区的重要载体^[16]。但现实来看,当前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内含的价值符号并未得到系统整合,一是中层设计通常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等同于一般性的公共产品,没有按照顶层规划从文化治理的高度推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忽视了文化符号的嵌入性和文化的公共价值,文化的价值引导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二是基层治理主体的具体执行过程中以“行政过程”替代“服务过程”,公共文化服务成为完成工作任务的规定性动作,文化的关系调谐功能也无用武之地。三是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也常被视作提升农民文化素质的“惠民”运动,希望通过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使其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价值,暗含着上层工业文化对乡村文化的歧视,乡村内在文化价值并未得到充分挖掘。

（二）重视硬件支撑，忽视仪式活动配套

互动仪式链理论对互动仪式产生的软硬件环境进行分析，认为以价值符号为纽带建构的互动仪式空间涵盖两个层面，一是外在的“硬件”程序，即整个社会体系有序运行的不可移动的场地、组织机构系统，二是依托“硬件”秩序而开展的“软件”秩序，即为“硬件”秩序提供合法性的一套完整的仪式规则与互动实践^[17]。公共文化服务并非单向度的社会文化实践，而是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整体性的公共文化空间的塑造^[18]。这种公共文化空间不仅限于文化活动中心、文化礼堂、图书室、文化广场等物理空间，更重要的还应在物理空间之上承托相应的公共文化互动。行政型体制逻辑下，基层乡镇政府往往将“投入少、见效快”文化设施作为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忽视了公共文化活动的策划与组织。较多现存文化活动有些是上级模板的套改，有些是个别模式的照搬，抑或原有活动的重演，缺乏价值吸引和互动能效，传统仪式互动衰减与现代公共文化互动缺位并存^[19]。互动空间的缩减造成乡民之间情感能量得不到有效交换和集聚，设施虚设、空转、运行成本过高等问题频发，同时乡民的社区认同度却逐渐消减、集体行动能力不断萎缩，乡村共同体解构风险仍然存在。

（三）重视行政整合，忽视乡民主体参与

柯林斯在建构互动仪式链理论过程中重点探讨了互动仪式中“亲身在场”的必要性，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人们可以通过各类互动媒介进行虚拟现场沟通，但柯林斯认为个体行动者只有以在场参与的形式进入互动仪式，才能完成情感能量的高效交换和积蓄。例如人们可以通过电视直播观看某场球赛，但多数球迷还是倾向到球场观看比赛，这也显示了“在场”是获取情感能量的主要途径。

作为乡村公共文化塑造的主要载体，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若要充分发挥文化治理的功能，自然也需要乡民的主体参与，以体系参与建构乡民的公共理性，从而加强对乡村共同体的价值整合。与之相悖，时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缺乏乡民的主体参与，主要表现为参与频次低、参与深入不足、参与时间较短、参与内容重娱乐化等，公共文化服务仍然秉承自上而下的填鸭式单向供给，服务供给主体与服务享用主体之间没有良好的沟通机制。乡民无法通过公共文化互动积蓄互信合作的价值认同，从而削减文化活动之外的其他各类合作意愿，进而导致农户在现有情境下难以形成公共事务参与的惯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公共性传播与行动整合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

（四）重视政绩竞赛，忽视互动仪式实效

政治锦标赛是基层公共部门长期秉持的行动逻辑，在压力型管理体制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以包含设施配备、人员组织、活动安排等可量化指标从省一级政府下沉至街道（乡镇）和社区^[20]，层层传导的是政绩考核压力，但公共文化服务的文化治理、关系调谐、价值导向功能宣导却层层削弱。乡村振兴顶层设计影响下，中国各省市掀起新一轮的政绩竞赛，这种在过去能够较大激发基层行政机构行动动能的运作机制再次被纳入到乡村振兴运动之中，从而各地对照文件，竞相开展亮点工程的挖掘。一是从产业发展角度建设“共产村”、“共富村”，编写经济增长亮点；二是从管理体制角度打造“网格村”、“联勤村”，凸显治理机制亮点；三是从基础设施建设角度打造“高速村”、“别墅村”，打造设施配备亮点。这些“亮点”工程虽在一定程度上对乡村面貌做了改善，但碎片化的运作忽视了乡村文化

元素的梳理与革新，面对新一轮的乡村改造，乡民获得的是“表的改观”，“里的空虚”依旧存在。政绩竞赛逻辑下，乡村本身的文化价值缺少挖掘，乡民间的互动被硬性拉入至市场化运作，乡村文化逐渐被城市文化所侵蚀，互动仪式积蓄情感能量、重塑共同体精神的效能没有实现空间，如何推进乡村振兴的“表里如一”，亟待探讨。

三、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对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思考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之魂，乡村文化振兴是一个持续价值宣导及创生性行动转向的过程。在现代性影响下的中国乡村，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面临着不可逆的巨大变革，面对回不到的“生于斯、死于斯”的乡土样态，乡村社会整合、社会控制亟待主导性乡村公共文化对社会集体行动进行价值重塑。

运用互动仪式链理论对中国乡土社会的“礼治”何以可能进行剖析，可以发现社区成员间长期的仪式互动能够积蓄情感能量，多方面的情感能量交换形成了共同体精神。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乡村已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乡民暴露在多向度的价值观念之中，因此乡村社会整合、社会控制必然需要外在力量的价值框架搭建，更需要社区成员情感能量的激发，这两方面都可通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价值符号塑造与文化活动组织得以实现。因此，推进乡村社区从“礼治”到“法治”与“德治”转变，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价值引导、能量积蓄、自治培育、行动旨向功能必须在互动仪式中加以强化。

（一）价值引导，强化公共文化符号的持续塑造

互动仪式链理论认为，群体符号产生于连续性的互动仪式，是群体成员对某一事物的一致看法或价值判断，群体符号不断固化群体公共文化，积淀着共同体认同的价值基础。市场化浪潮影响下，乡土社会和集体化时期的各类公共性、个体性互动仪式已在形式上逐步简化、频次上逐步降低、内容上逐步贫乏，乡土人的价值观念与文化信仰迅速瓦解，新的颇具时代特色的符号价值体系尚未有效建构，文化符号的缺失使得当下乡村社区治理成为“无魂”的治理。如此背景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不仅要现存乡村文化样态进行“塑形”，而且需要对文化的内涵进行“铸魂”，挖掘文化服务的“靶向治理”作用^[24]。即借助具有文化符号嵌入的公共文化服务重构乡村和谐的治理价值框架，强化公共文化符号的塑造与价值引导，在公共文化服务的细枝末节注入具有新时代特色的主流价值理念、政策导向，将公共文化服务作为传播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方略的重要媒介，将乡民的行动集中于乡村振兴的大旗之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不仅要破除“产品推送”的行政型供给逻辑，还要充分发挥文化产品的服务效能，满足乡民在精神慰藉、情感支撑上的需要，将公共文化服务作为推进传统乡土社会“礼”与“道”现代性改造的重要机制，塑造与现代公民责任与文明涵养相契合的乡村文化价值体系。

（二）能量积蓄，丰富公共文化活动仪式

传统互动仪式的式微使得乡土社会的礼治价值难以得到传承与强化，社区成员间的公共互动空间逐步缩小，人与人之间情感能量逐步衰减，村庄逐渐演变为半熟人社会。柯林斯认为，情感能量决定着个体的情境定义，高昂的情感能量具有凝聚作用，低沉的情感能量具有分化作用，而情感能量的积蓄必须通过连续的互动仪式加以强化。因此，乡村文化要延续，就要进入到乡土文化的内部，不断挖

掘乡土公共文化活动与乡民情感能量积蓄之间的逻辑和关联,进一步改造乡土社会的互动仪式,创造与时代价值相符的互动仪式。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应充分发挥文化活动在互动仪式塑造上的重要作用,深入村民的精神境界,以多样态的公共文化活动拓展乡民的公共互动空间,抓住乡土文化的意义之魂。当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应进一步增加文化活动数量、提升活动频次、增强活动实效^[22],通过多层次、宽范围的活动组织促进乡民间情感能量的积蓄,以情感能量的交换促进乡土社会“人情交换”的现代性转化,形成新的互动仪式链。同时,将公共文化服务作为乡村社会文化价值互动的新场域,以主体间的良性互动重塑与现代乡村社区适洽的文化伦理及价值认同,不断探寻乡村治理的“柔性之道”^[23]。

(三) 自治培育,促进文化活动的公共参与

乡土社会的各类仪式活动创造了互动空间,在场的乡民受各类看起来“无用”的互动仪式影响,潜移默化地锻造着自身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管理的行为习惯,也不断积淀着“无用之用”的礼治基础。在这些看起来“无用”的修身养性的仪式中,情感能量不断建构和形塑着乡民自身的主体角色,在不断的情境定义中塑造了基于认同的持续参与机制^[24],共同体精神不断强化。与之相比,当前乡村村民自治作为一项基层政治制度是国家建构的,这种通过立法和政治缔造的社会文明,同乡民原有的共同体文化往往在价值沉淀上存在隔膜^[25]。因此,要想在新时代的思想体系下推进村民自治,必须从互动仪式链的思路出发,将乡民对公共文化活动的参与作为自治参与的重要形式和重塑乡村共同体精神的重要途径,在实质上推进村民自治的国家化^[26]。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应更加注重乡民的需求征集,促进供需互动,激发乡民对文化活动的参与热情,以乡民易于接受的形式输入公共参与价值,同时注重乡民在公共文化活动参与过程中对自身成长经历、社会身份、身体状况或价值观念相一致的认同感建构。充分发挥乡民在公共文化参与中的主体能动性,将参与中所形成的认同观念作为决定其后续参与行为的情境定义,不断塑造持久性自治参与的动力机制。

(四) 行动旨向,塑造集体行动的文化环境

在乡土社会,基于血缘、地缘、业缘建构起来的“共同体”通过对“规矩”的仪式化传承,不断传递着关于共同体行动的情感能量,乡土人只要遵照他们再熟悉不过的各类行为准则办事,就会获得共同体道义或行动上的支持。现代性的冲击下,乡村共同体的维护也应从内生性的仪式规矩入手,利用公共文化服务塑造与现代性相适洽的公共文化环境,形成“崇法”与“修德”并存的微观行为准则。崇法是现代公民的行为特征,属于社会外在约束,修德代表着传统个体礼仪的涵养,属于个体内部约束,充分利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将“法的意识”进行传播,同时促进“德的观念”的内生性转化,才能促进乡村公德与私德的有效互动,公序与良俗才能交相辉映。具体而言,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应改变服务产品的锦标赛式运作,充分发挥乡村内生文化组织在特色产品供应、多元需求满足上的功能,传承和传播乡村优秀文化,给予乡民更为丰富的行为互动空间。同时注重新型乡村内生文化要素的培育和积累,拓展文化活动形式,丰富活动价值,形成广泛认同的与现代性相契合的互动仪式和行为规范。在此基础上,不断强化乡民文化参与的自觉性与自主性,锻造乡村集体行动的内生动力,完

善乡村基层社区的柔性治理^[27]。

参考文献：

- [1]周晓虹，2002，《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3页。
- [2][9]费孝通，2011，《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北京：商务印书馆：第76页、第54页。
- [3]刘晓亮，2018，《互动仪式链理论对青年价值观培育的启示》，《中国青年研究》，第6期。
- [4]Randall Collins，1981，《On the Microfoundation of Macrosociolog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86
- [5][法]涂尔干，1999，《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4页。
- [6][美]欧文·戈夫曼，1989，《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黄爱华、冯钢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第26页。
- [7][8][10][17][美]兰德尔·柯林斯，2018，《互动仪式链》，林聚任、王鹏、宋丽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73页、第203页、第87页、第159页。
- [11]周丹丹、魏程琳，2019，《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村文化自组织的发展机制研究》，《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第3期。
- [12]张秀梅，2018，《仪式的实践与乡村共同体重塑——关于浙江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思考》，《浙江学刊》，第3期。
- [13]杭承政、胡鞍钢，2017，《“精神贫困”现象的实质是个体失灵——来自行为科学的视角》，《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第4期。
- [14]陈浩天，2014，《公共文化服务的治理悖论与价值赓续》，《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 作者简介：任贵州，河海大学社会学系2019级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薛孟春

※ ※

新闻速递|45%的学生“非常想”学校了！究竟什么时候开学？

你想不想开学？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的效果如何，主要面临什么问题？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团队近日开展了“疫情期间中小学生学习与生活情况调查”，截至3月7日18时，调查共收到问卷46299份，其中学生问卷15351份、家长问卷29392份、教师问卷1556份。调查表明，丰富的线上教学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学生的学习需求，但线上教学质量有待提高；虽然学生都想着早日复学，但家长和老师仍有一定担忧，也都希望在疫情得到完全控制后再进行复学。

调查显示, 93.98%的学生所在学校都开展了线上教学, 77.89%的老师开展线上教学。83.22%的家长认为线上教学的开展缓解了学生无法进入学校学习的燃眉之急。

线上教学无论对学生还是对老师都是一种挑战。从学生问卷的调查结果来看, 相比于线下教学, 学生中觉得在家(线上)学习效果非常好的只有1174名, 占比7.64%; 觉得比较好的有3960名, 占25.79%; 觉得一般的有8295名, 占比54.04%; 还有1616名学生和306名学生分别觉得不太好和非常差, 共占12.52%。从教师问卷的调查结果来看, 老师中认为教学质量方面降低很多、降低一些分别为346和657, 共占82.76%; 认为学生学习主动性方面降低很多、降低一些分别为359和560, 共占75.83%; 学生学习效果方面降低很多、降低一些分别为355和660, 共占83.75%。

线上教学、自主学习究竟有些什么困难? 在线上学习过程中, 5267名学生表示其存在网络设备等客观原因导致课程中断或未完成, 占比36.51%; 1959名学生表示其存在家庭环境嘈杂无法安心学习的困难, 占比13.57%; 4159名学生表示存在没人监督自己开小差的问题, 占比28.83%。学生在家自主学习遇到的困难中, 6185名学生表示其存在学习没有规划, 效率低的困难, 占比40.29%; 3350名学生表示其存在和老师沟通不畅的问题, 占比21.82%; 6644名学生表示其存在自主学习能力较差的问题, 占比42.28%。

调查显示, 当前, 大部分学生、家长及教师都有了复学的想法, 其中学生的复学想法更为强烈。学生中“非常想”开学的有6898人占45%、“比较想”开学的有4998占33%; 家长中非常想、比较想开学的分别为8777和9334人, 共占61.62%; 老师中非常想、比较想开学的分别为453和496, 共占60.98%。在认为什么时间复学比较合适方面, 家长和教师大多数都认为应该疫情完全结束后再复学。

“如何提高在线教学的质量, 还需要学校和老师、家长以及学生自身的共同努力。”此次调查课题组相关负责人、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毅杰教授介绍, 复学后除了做好疫情防控方面的工作外, 学校还应对学生的学习质量进行诊断评估, 有针对性地制订教学计划; 对已经居家在网上学习过的学生, 有重点地对已学内容进行讲解和复习, 加大对学习困难学生的帮扶力度, 确保每名学生较好地掌握已学知识内容。



疫情 调查

小角色，大使命

——一位农民工抗击疫战的口述史记录

段太香

本文是新冠肺炎疫情中一位农民工回乡过节、返城复工的真实故事。每逢春节，农民工就像候鸟一样在家乡与务工地之间来往，并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现象，然而，今年春运中的农民工却受到了“格外关注”。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返乡、返城农民工的“排查”和“检疫”，成为全国疫情防控中比较关键的一环，每一位流动的农民工都承担着国家疫情防控的重担，同时，疫情过后经济的恢复，企业的复工，农民工用自己的双手奉献着自己的力量。因此，本文通过对李大真实经历的呈现，展现农民工这一群体在特殊时期的独特使命。

一、李大的返乡囧途——小角色，大使命

年关将近，李大总是接到不同的电话，对方在电话里介绍说，自己是镇上工作人员，还有的说自己是县上的工作人员，因工作需要，要询问一些相关问题，“你现在在哪里工作，从哪里回来，住址在哪里”，一开始李大也给对方解释，可是，后来说到了身份证号码，李大寻思着这很有可能是骗子，因为自己坐火车回家的路上，把身份证掉了，李大摁掉电话后，索性干脆关机了。

腊月二十九，晚上十二点多，李大一家人都睡下了。睡梦中的李大听到“咚咚咚”！“咚咚咚”的敲门声，这大半夜的会是谁呢？一会儿，敲门声伴随着熟悉的问候声，“李大，你在家，不在呢？”哦！敲门者原来是李大的大伯，李大赶紧起床去开门，“大伯，半夜还没有睡呢？”大伯站在门口，面容不像往常那样随和，“李大，你在家呢？‘上面’打电话找你，说是确定你的行踪，还说你电话关机了，就打到我这来了。”李大半开玩笑心想：“找我干啥？这一辈子顶多队长来收我皇粮，还没有遇到过县里的领导们大半夜还来关注我这样小人物，关键还这么大费周折的”。

直到第二天上午十点，队长出现在家门口，李大才算是把事情弄明白了。李大坐火车回家时，把身份证弄丢了，回村一段时间后，才去村里登记补办身份证，意外的是，村里的人搞疫情排查，把李大的情况报错了，以为是从武汉回来的，事实上，杭州回四川的火车有些车次并不经过武汉。之后，层层报错，这才导致镇、县一级工作人员不断追查李大的行踪。

自新冠疫情被证实人传人以来，举国上下都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基层社区实

行入户排查，在农村社区，排查重点对象正是有外出务工经历的人员。李大村组长解释道：“疫情防控升级后，打电话找人就是所谓‘排查’，工作人员在履行‘政府疫情防控工作’职责。”队长还告诉李大：“配合‘上面’排查工作，就意味着为国家疫情防控做贡献。”

二、李大的“集体生活”——打好社区“巷战”

自从电话排查事件后，队长就成了李大家的常客，虽说按时间算，李大回来已经有二十天，但是，队长还是每天上午十点左右背着消毒器来李大家消毒，牲口棚、厨房、卧室等等通通消毒一遍，消毒后需要把房间门关上一段时间，李大一家人就坐在自家门口，队长就背着消毒器，站在我家坝子里，给我们和周围几户邻居讲疫情防控，今天又新增了确诊人数多少，劝大家不要走家串户，如果要去地里砍菜，都应该是一个人快去快回，不要逗留，更不要和邻居聚集聊天，不要做害人害己的事。队长还特别强调，李大家和其他家里有外地回来的家户都属于村里风险性较高的家户，更应该自觉居家隔离。李大说：“有时候还是会忍不住要和隔壁邻居吹吹牛，但村里相互聚在一起聊天的好像真的少了。”

每天上午十点、下午三点，村里多年不用的喇叭准时响起，重复不断地轮播新冠疫情防控知识，劝导村民们配合村里疫情防控工作，相互监督，上报武汉返乡人员，上报疑似病症患者，配合政府打赢疫情狙击战。“喇叭里用的四川话，喊的很形象，晓得啥子叫重大一级响应不，就是上战场打仗最高级别了……这场战斗如果打赢了以后天天过年，打输了就没有年过了。”

防控再次升级，正好是过春节的日子，队长入户宣传：“今年，我就是你们的亲戚，我会来走家串户，你们相互之间就不要走了，待在家里，不出门、不串门、不聚餐，打好社区‘巷战’，你们每一个都是战士。”

往年正月里，亲戚朋友们轮流坐席，这下好了，“上面”不让大家坐了，这对李大来说倒也还适应。而那些“重亲”（亲戚关系近），比如，去岳父家，他家和李大的家不是在一个村，需要过的几道“关卡”，这就比较复杂，除了李大家要向村里申请通行，关键是岳父家还得给他们村联系好，“过关卡比较麻烦，给岳父电话上拜年，他们也都还是理解。若是，其他需要去拜年的亲戚家，还要再多路过一个、两个村，这就更麻烦了，干脆不去了，这样一来，今年过春节的好处是钱省下了，力也省下了。”

如果需要到场镇上买生活物资，“必须到村里去拿出行证，全村每天有五张出行证，供村民使用，某天自己去找队长拿，恰巧遇上没有了，那就看所需物资是不是紧要，村里干部协调解决。在农村还好，吃的、喝的地里基本也都有，不让出去，也就不出去，到自家地里走走，日子倒还能过，影响不大。”

有时候，觉得无聊，李大和年迈的父亲去屋后河边坐着钓鱼，一边静静的看着湖面，一边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李大父亲讲起了集体时代过的集体日子，李大父亲说道：“眼前的日子过的有点那些年过集体生活的味道。”李大开玩笑地说着，“今年倒是多了一个亲戚——队长！”

春节期间，举国上下都进入了疫情防控的攻坚阶段，李大的日常所需、娱乐、休闲活动、走动范围与距离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无论是室内生活的固化，还是每天高音喇叭里的劝导，李大的疫情生活受到了国家制度的制约，日常生活隐约透露出隐性集体特征，深深打上了国家的烙印。

三、李大的返城征途——“通关”、“闭关”与“解关”

以往，不出正月十五，李大就会返回杭州，但是，眼看二月出头，自己还在家里呆着。其实，自从两个女儿与女婿带着孩子在四川高速路封路前离开李大家后，李大就想回杭州上班了，虽然老板多次催着李大回杭州复工，但是，目前的形势，也不是李大想走就能走的。

想要复工的李大打电话给队长，询问是否可以出村去杭州复工。队长说：“按照规定程序，身体健康条件下，需要办理通行证，手持通行证才能一路畅通。”李大按照队长说的，先找厂里要了复工函，再去村委会排队登记，等着村里安排，到镇上去体检，体检无恙后，颁发通行证，程序比较繁琐，所幸，折腾了一番，总算是办好了，还附赠一只口罩，李大拿到通行证已是二月初八了。

李大说老板催得紧的很，加上通行证有效期短，这就意味着需要赶紧动身。

闷了两月的李大，期望马上回厂就能上班，兴冲冲地收拾好行李，手持通行证，坐摩托车去临镇坐车，通关时才发现，自己的通行证只能从内江出去，李大努力给“关口”的工作人员解释，“你们也都知道，我们家这段，行政区划上属于内江市，但是我们这里地理位置上紧挨着自贡市，而且离临市的县火车站，也只有40分钟的车程，这你们也是知道的。而且，现在厂里催的紧。”李大反复给工作人员解释，载他的摩托车师傅也帮着他给工作人员说好话，“我们平常都是从这里过去坐车的……”但是，工作人员还是坚持，要按照上面的规定办事，不能“通关”。

“通不了关”，李大只好坐着摩托车又返回家里，眼看通行证的有效日期为一天，如果去本市火车站坐车，得倒车三四次，保守估计4个小时，想想罢了。无措的李大与家人合计后，一致同意打电话给住在隔壁镇上的侄子，让他半夜来接李大，趁“关口”的检查人员还没有上岗，直接开车把李大送到临县火车站，李大说，“一路战战兢兢，生怕被逮住了，万一再被弄去坐两天牢更不划算了”。

整个车站空空荡荡的，李大等了十一个小时，工作人员反复检查了李大的复工通知和健康通行证，再测量体温，终于坐上了去杭州的火车。在车上，李大全程带着村里赠送的口罩，车厢里不像往常那么热闹，闷了两天，好不容易到了杭州，在站里，李大又接受了严格的检查，直到健康码显示为绿码，李大才顺利出了火车站，坐上了厂里派来接自己的车，李大说：“这种待遇，在我的打工生涯中，这还是第一次呢。”

一路上，李大想着终于可以复工了，然而，李大没有料到的是，自己又被带到了社区做登记，填表，最关键的是，社区工作人员给了李大一张隔离十四天的单子，回到厂里，宿管给李大分配了一个单间，李大放下行李，收拾好房间，过起了被“隔离”的日子。第一天，李大觉得除了不能上班，并未感觉“隔离”有什么不好，况且，工友每天还送饭进来。但时间久了，李大开始怀念以前住8人间日子，虽然，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常年几乎没有休息日，可是，大家下班后，经常说说笑笑的，倒也没有觉得日子有多难过。

再看，如今这光景，几天以来，唯一来房间里走动的人，就是拿着温度计、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有时候，工作人员也会安慰李大，“在这间屋里待上十四天，正常就可以上班了。”李大应和着：“第一次觉得一天的日子过的这么慢。”工作人员又安慰李大，“如果一直不出门，十四天还是很快

的，可不能像某某，出去溜达被人举报了，被贴上封条，又是十四天，之后，又被工作人员发现封条被撕坏了，又是十四天，那就等的久了。”李大听了工作人员的话，没在多说什么了。李大回忆道：“我当时都不敢看他们的眼睛，毕竟那些天晚上，看着没啥人的时候，自己就溜出去，到河边坐着抽烟，只是，我运气比较好，没有人揭发我。”

熬过了“解关”，二月二十五，李大终于复工了，看着熟悉的工厂，显得有点空荡，工友半开玩笑道：“老板说我们返工就在给国家经济做贡献”。不知为何，李大却笑不起来，甚至有点悲伤，想起还被隔离的日子，他说：“一开始，自己并没有觉得居家隔离有多困难，可是当我一个人呆久了，没有人说话，没有电视看，只有一个手机，每天不能在有人的时候出门，只能偷偷溜出去，这十四天以来，自己‘分文不进’（没有任何收入），反而，还要每天支付给厂里一日三餐的生活费，十四天里看得见的经济损失就是差不多 2000 元。”看着李大的眼神逐渐暗淡下去，如果说，李大一开始还不完全清楚“隔离”的日子是什么样，有多困难，而此时的他，应该会怀念在老家和父亲钓鱼的日子吧。

李大的复工之路崎岖不平，在某些方面遭到了制度性的阻碍，同时，当“居家隔离”这一制度切换到城市，作为家在遥远农村里的农民工群体，“居家隔离”就只剩下“隔离”了，在这期间他们所遭受到的心理、身体、经济方面的影响，似乎比原本他们在农村要付出的更多。不管李大是否察觉，他对制度的遵守与灵活处理，都为国家的疫情防控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结束语：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政府的疫情防控全面升级的特殊时期，李大的返乡、过春节、返城个人生命轨迹被纳入到国家制度之中，李大的个体经历承载着国家的宏大历史。因此，通过记录农民工李大的口述史，鲜活的回忆深入而细腻的刻画了个人与社会、国家命运的交织，灵动地呈现了在特殊历史时间里小角色的大使命！尤其，耐人寻味。

正如社会学家贝克所言，全球进入了风险社会，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被卷入系统性的风险之中，并可能遭受风险性后果。因此，当个体嵌入与被嵌入到全球社会与国家制度之中，个体的行为不仅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稳定运行，整个社会的运行也需要个体行为为其负责，但是，对于社会位置不同的每一个人，风险后果却不是均分的，承担防范风险责任也不是平等分配，值得反思的是，流动的农民工群体似乎更多暴露在风险之中，也承担了更多的风险后果。

☆ 作者简介：段太香，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9 级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吴 娟

与苏州市四名产业管理者在疫情不同阶段的访谈

——对本市部分防疫措施的思考

李 汀

疫情发生以来，不同的产业在疫情期间是何种状态，未来将如何恢复等问题受到聚焦式关注。民营与中小企业是苏州经济的基石，可以说在疫情对产业与政策的影响上该市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笔者于2月8日-2月12日疫情拐点期和3月10日-3月12日疫情恢复期这两个不同阶段，与苏州来自旅游业、电子制造业、机器制造业、建筑业的四名企业管理者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访谈，并在访谈中对苏州市部分防疫措施形成了一定的切实认识与思考。

一、与旅游公司青年创业者的访谈

李先生是一位青年创业者，2016年末与朋友合资成立了一家旅游公司。各种经济预测都认为，疫情将对中小微企业（尤其是创业期的企业）以及第三产业（尤其是旅游业）产生更大的影响，李先生创办的旅游公司恰好两种情况都符合，故而疫情带来的行业冲击在他身上的体现尤为明显。

首次访谈中他提供了一份数据，是截至2月10日他本人所负责的境外旅游订单取消数量：

表 1：境外旅游订单取消数量

国家及旅行形式	取消订单数
日本（散客）	14 人
文莱（散客）	14 人
埃及（散客）	6 人
西班牙（散客）	6 人
法国（欧洲连线）（散客）	8 人
韩国（散客）	2 人
新西兰（散客）	8 人
马来西亚（整团）	2 个（公务团 1 个、考察团 1 个）

注：本文数据来源于青年创业者李先生

上述取消业务营业额达到 230 万元，亏损额也有数十万元。他的企业中共有 7 名业务人员，退单业务接连不断。从 1.22 日放假以来，李先生和同事都认为自己的状态无异于失业，“复工遥遥无期，就算复工也没有用，上下游都断了。”

在首次访谈前，苏州市于 2 月 2 日率先出台《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苏“惠”十条》、2 月 7 日出

台“惠外”十二条，被认为是极有力的举措。对此，李先生表示，政策的确可以缓解压力，是落地的好政策，但对于他本人来说如今面临的困难是前所未有的，这种情况下，政策并不能够挽救他的经营颓势。出于这一点，李先生更愿意将疫情冲击看作一次行业洗牌。

3月10日第二次访谈时，李先生的企业仍旧没有获得复工许可。即使复工，他的企业也不能运营：供应商、地接、航司等上游部门不能启动，下游客人也不会选择在此时贸然出游。许多人用“非典”时期的情况来预测本次疫情情况，但李先生对大多数理论认可的未来第三产业的“报复式”发展依旧不乐观：“时间节点有区别，旅游是要时间+花销的，本次疫情集中影响了春节假期，就我个人而言，未来的恢复有限。而且内生的因素刚下去一点，外生因素又起来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疫情促使李先生和他的同事们思考他所处行业的抗风险能力。他们也关注到了以自媒体行业为代表的线上行业在疫情中体现出的韧性。如何将公司资源与线上发展结合起来，成了李先生与同事思考的主题。同时，李先生也开始询问线上教育行业的相关情况，希望能够拓展一个副业，或者说干脆抓风口，借此机会丢弃原来行业。

表面上看，李先生的情况比较悲观，但是从中我们能够体会到初期创业者寻求改变不断拓展的积极状态。

二、与电子制造厂决策者的访谈

吕先生的公司是一家规模不小的电子元件制造企业，员工总人数达到2200人。他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复工管控问题。

我们的首次访谈在2月10日。他将自己描述为“苏州最大胆的决策者”。

2003年“非典”时期，他就是该厂的决策者了，他有带领企业防控疫情的经验。在1月23日甚至更早，他听到新闻说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播，就为制造厂准备好了5万只口罩和大量的消毒液等物资，并且在相关政策规范指导出台之前，就建立起了自己工厂内的消毒防疫机制。后期疫情爆发，所在区政府便向他请教相关经验，他本人也对外捐出了一定的防疫物资。可以说，吕先生的一系列举措富有前瞻性，也为他的企业后面顺利复工提供了可能。

吕先生是一个细致入微的政策研究者。因为他的工厂规模大，涉及的方面多，他研究了各种各样的复工指南和防疫条例。对于各区的指导规范，吕先生认为存在一些不相容的地方。这些不相容不是成文的不相容，而是不成文的不相容。有时因为各个区的管控方法都不一样，复工人员需要到处开证明，他本人最多的时候一天要接到90几个电话。这是复工流程极为繁琐的体现。2月12日，苏州出台“复工通”平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复工的繁琐以及对指南不熟悉带来的麻烦。



图 1：苏州“复工通”平台

吕先生认为复工和防疫管控存在矛盾，这也是政府订立政策的困难之处，面对这种困难，苏州的做法是给人信心的。谈到苏州的政策，他认为失业保险、缓交租金这两项帮助最大，但是他希望责任主体在未来能够更加明确，“复工后的责任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企业复工自己还是要承担压力的。”

3月10日，吕先生的企业复工率达到百分之百，全面复工并且2200名员工都身体健康，这是一个很理想的复工效果。尽管在外地的相关合作企业并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并没有完全常态化，财务上大概亏损一半，但是吕先生相信，对他的企业来说，这只是一次性冲击，长期看是不构成很大影响的。

三、与在多个地区有机器制造公司的经营者的访谈

张先生在江苏、山东、安徽、浙江有多家企业。在苏州的制造公司有员工70人。

他的外地员工中，有一人确诊新冠肺炎，两人被隔离，这个原因再加上比较传统的公司管理机制，2月26日企业复工率为55%，即便是到了3月10日，他的企业复工率依旧只有85%。张先生今年56岁，他对政策呈现的状态跟吕先生相比比较被动。但是他也严格按照政府条例在企业内进行防疫管控。

在责任机制这个问题上，直接与企业进行补偿管控对接的是区、县一级，这点在他所拥有企业的四个省份几乎都没有差别。而四个省份也是有区别的。比较突出的是张先生觉得苏州的复工调研更频繁，政府也更积极地进行资金补贴。

尽管有大量的采供合约不能履行，目前只达到一半的生产水平，但他依旧觉得4月份能够基本恢复。在社会影响方面，张先生的生产线上有空气净化设备，他向不同地区的政府部门捐出了一定数额的设备，这说明在处理自身亏损的同时，企业也在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共克时艰。

四、与建筑公司管理者的访谈

李先生是苏州一家比较有规模的建筑公司的项目管理者。

在他眼中，建筑行业涉及的最突出的是基层建筑工人的问题。建筑公司是项目制的，新建项目和在建项目对于企业来说，短期停工意味着工期延长，并没有直接的项目损失，短期损失中长期向好。但是以外来农民工为主要人群的建筑工人将面临比较严重的问题，到3月10日依旧有超过20%不能复工的工人，他们将面临的可能是1-2个月无法领取工资。

2月10日的情况是，在苏的建筑工人，居住在工地的工棚中，由于停工令无法进入工地，企业也需要负担管理费用。到3月10日，复工情况依旧不理想，是访谈的四个企业中复工进程最缓慢的。其中还包括建材缺乏的问题，四川、福建等地的砂石材料不能到位，只能进行一些零零碎碎的建设，大型建设无法操作起来。

但是李先生在疫情期间关注到了BIM建筑信息模型比较广泛地被用于统筹规划，他认为这是在疫情期间得到发展的门类。

从建筑行业投资机会上看，李先生认为新冠肺炎对经济的冲击比较大，政府必然再出台刺激政策，建筑板块估值优势显著，势必迎来较大幅度的反弹。

五、总结

综上所述，从总体上看，大多数企业主都能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即便疫情带来了亏损，只要不是毁灭性的，都可以发现内在的转机，并且在普遍艰难的情况下，长期还是看好的。之所以要研究不同的产业，是为了探求结构性认识，这比总体认识要来的更为有意义。因为从03年至今，我们的产业发生的不是共同的起落，而是结构性的变化，我们要避免“正确地回答错误的问题”。

另外，企业主都能够积极与政府部门配合，寻求政策指导、政策扶持，这实际上透露给我们的是一个很好的信号：政府服务职能越发显著。

苏州市的政策应对是积极的，从2月2日的“苏惠十条”到2月7日的“惠外十二条”，从2月22日全城启用“苏城码”、大数据精准定位人群，到3月6日推出“人才贷”，3月11日的减半征收相关企业医保都能体现这一点。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教授认为，苏州等地的举措，体现的是地方政府“GDP竞赛”正向“公共能力治理竞赛”转变，新的发展理念开始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

当然，对于政府来说，还有一些问题可以更好地完善，比如责任机制的明确，这是简化各类流程的必需措施。另外，还有一些问题需要预防，那就是积极的政策与过度干预的度的问题。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就是经过疫情的考试，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能加强现代机制的革新。面对疫情，止损之外，我们还要要求更好的未来。

☆ 作者简介：李 汀，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9 级本科生

☆ 责任编辑：吴 娟

※ ※

新闻速递|疫情期间高校毕业生的学习与就业情况调查

2020 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毕业生的学习与工作计划。疫情期间，毕业生处于怎样的学习状态？目前就业情况如何？学校采取了哪些措施，成效如何？毕业生还希望得到什么帮助以实现顺利毕业和就业？

为了解这些情况，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开展了“疫情期间高校毕业生的学习与就业情况调查”。3 月 28 日，该调查成果出炉。本次调查面向江苏省高校毕业生，采取网络调查法，自 3 月 3 日以来共回收问卷 9535 份，其中高职或专科毕业生 1721 份，本科毕业生 6502 份，硕士毕业生 1312 份。同时，调查组成员也访谈了若干毕业生。

调查发现，在学习方面，毕业生对最后一学期有不同的学习期待，但受疫情影响，他们大多居家学习，效果一般，毕业论文/设计完成进度也不理想。毕业生对自己能否（按时）毕业充满了担忧，希望围绕知识学习、论文指导、送审以及答辩等环节提供毕业配套在线服务。

调查显示，在毕业去向选择方面，找工作是当前各类高校毕业生的首选和实践，接着依次是国内升学和出国留学；疫情对正在找工作、国内升学复试和出国留学的毕业生都有一定负向影响；仍有 73.94% 的受访毕业生没有明确就业去向；毕业生希望国家继续落实稳就业的相关举措，完善相关就业途径的毕业生配套服务，克服疫情带来的就业风险和挑战。

疫情影响毕业生学习方式和效果

毕业生基本都上完了学校规定课程，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学习欲望较强烈，对最后一学期充满期待。调查显示，总体上，有 53.08% 的学生表示“学无止境，想好好把握”，18.51% 的学生表示“不管怎样，最后一学期也要学点东西”。受疫情影响，毕业生只能居家学习，然而居家学习效果并不理想。总体上，仅有 2136 名毕业生觉得“很好或较好”，共占 22.30%。相较于女性、农村户口和理工农医类学生，男性、城市户口和人文社科类学生觉得效果“很好与较好”的比例略高 4.55%、6.41% 和 0.17%；而相较于高职毕业生，本科以上毕业生觉得效果“很好与较好”的比例略低 8.24%。

毕业论文/设计是高校毕业生最核心的学业任务。针对个人毕业论文/设计完成程度的自评结果显示，有 68.65% 的学生打了“5 分及以下”，31.35% 的学生打了“5 分以上”（1 代表还没开始，10 代表已经完成），即大部分学生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进展不顺利。

调查显示，有 4599 名学生表示疫情对自己的论文完成有消极影响，占 48.23%，其中男性和本科以上学生表示“有消极影响”的比例更高，分别为 52.44%、54.13%，而城市户口和人文社科类学生表示“有消极影响”的比例较低，分别为 46.90%、44.55%。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身边没有参考资料（60.90%）；

与老师交流不畅（47.66%）；缺乏安静的写作环境（47.25%）；不能到学校做实验，论文缺乏数据支撑（34.61%）；不能去外面调研，论文资料不足（32.09%）；疫情信息影响写作心情（21.94%）等。

疫情导致普遍的毕业担忧和烦恼

最后一学期既是毕业生查缺补漏的宝贵时机，也是进行毕业论文/设计的关键时期。然而，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打乱了毕业生的学习与写作计划，也对其毕业安排和实践带来了较大挑战和难度，进而让他们普遍对自己能否（按时）毕业充满了担忧。

调查显示，受访的所有学生（9535名）均担心毕业问题，其中49.75%的学生有“3项担忧”，27.56%的学生有“2项担忧”，22.68%的学生有“1项担忧”。担忧主要体现为：需要补考或重修的课程如何解决（10.23%）、毕业论文/设计的质量要求有没有达到（61.19%）、毕业论文/设计什么时候能送外审（16.97%）、因疫情影响无法参加答辩（17.01%）、能否按时毕业（58.13%）、会不会影响下一阶段的学习与工作（56.52%）和其他（7.03%）。

大多数高校及时采取了应对举措，也取得了一定成效。调查显示，有8466名学生表示学校采取了一定措施保障学生完成学业，占88.79%，包括学校督促老师提供学生毕业论文/设计在线指导（81.74%）、指导老师和学生利用学校毕业信息化系统加强沟通（65.34%）、允许学生调整毕业论文/设计题目与内容（23.56%）和其他（14.79%）。然而，这些措施的成效一般，有待改进和加强。调查显示，只有13.83%的学生表示“帮助很大”，39.22%的学生表示“帮助较大”，46.95%的学生表示“帮助一般或较小”。

为了保障顺利完成学业，毕业生希望学校提供哪些服务？调查显示，有8506名毕业生希望学校提供便利服务，占89.21%。其中11.99%的毕业生想获得“重修或补考课程安排事宜”，50.46%的毕业生想获得“专业指导”，40.71%的毕业生想获得“论文送审服务”，44.83%的毕业生想获得“论文答辩服务”，21.19%的毕业生想获得“心理支持”和2.88%的毕业生想获得“其他服务”。可见，与毕业论文/设计相关的服务是最主要的。

调查组成员认为，疫情对毕业生学习带来的影响涉及众多方面，应在国家相关部门指导下，依靠学校、老师和毕业生自身的共同努力来克服。对学校来说，需要摸查毕业生的论文完成情况以及遇到的具体困难，提供针对性线上服务，并对受疫情影响而难以完成毕业论文的学生，适当延迟答辩与毕业时间。对老师来说，需要加强与学生沟通，对毕业生居家学习和论文完成情况远程监督，并提供及时指导。对毕业生来说，需要充分利用学校和老师提供的便利条件，并结合自身实际，努力完成或适当调整论文/设计，达成毕业要求。

希望高校提供就业相关服务

在就业选择多元化的今天，进入劳动力市场是当前高校毕业生的最主要选择。当问及他们毕业后的打算时，有6430名学生回答是“找工作”，占67.4%，远超过一半；2467名学生回答是“升学再造”（如读研究生）。然而从当前情况来看，2020届高校毕业的就业情况不太理想，有2485名毕业生明确了就业去向，仅占26.06%。有7050名毕业生没有明确就业去向，占到了73.94%，远超过一半，其中，正在找工作者有3896名，正准备国内升学复试者1131名，正准备出国/出境留学学者211名。

调查显示,当前就业形势严峻,疫情对正在找工作、准备国内复试以及出国/出境留学的毕业生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从“找工作”方面来看,疫情不仅改变了高校毕业生找工作的方式,也增加了他们找工作的难度。国家、高校和企业都为毕业生就业问题作出了重要努力。其中,针对国家出台的政策,毕业生认为有效的包括:支持毕业生多渠道就业(64.81%)、推进加强网上就业服务(56.13%)、对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提供两年户口和档案托管(49.56%)、引导用人单位适当延长招聘时间(44.09%)、做好职业指导和心理辅导(10.29%)。

尽管如此,但是毕业生就业依然存在诸多难题。调查显示,几乎所有的“找工作”者(3896名毕业生)都认为在就业方面有困难。这些困难主要是:了解面试信息的途径少(62.99%)、招聘平台减少导致就业机会降低了(60.04%)、不适应线上面试的方式(48.33%)等。

调查显示,希望作为直接培养主体的母校提供多元服务,包括:及时发布更多的招聘信息(76.36%)、与更多企业联合开展在线招聘(62.09%)、提供就业教育与经验分享(61.83%)、加强毕业生自主创业指导(15.73%)、提供就业心理辅导(10.06%)、重点帮扶如重点疫区毕业生等特殊群体毕业生(8.83%)、邀请招聘平台专家开展针对性讲座(5.78%)。

继续深造是高校毕业生的一个重要毕业去向选择。面对疫情,教育部印发《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关于做好202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和普通专升本招生计划管理工作的通知》,指出2020年将适度扩大全国硕士研究生。高校本科毕业生对该举措也是看法不一:在被访的1131名准备研究生复试的本科毕业生中,有53.76%的人认为“可以有效缓解就业压力”和56.23%的人认为“增加自己考研成功的可能性”,而有55.61%的人认为“今年复试竞争压力增大”、36.43%的人认为“增加未来硕士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准备复试的毕业生担忧率最高的为复试不确定性(如复试时间、方式和指标等)与居家准备没有效率。

此次疫情的全球性暴发和扩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毕业生出国留学实践。调查显示,在被访的211名准备出国留学者中,33.65%的受访者明确表示此次疫情“会”影响自己的出国留学申请或行程,58.77%的受访者处于模棱两可状态,表示此次疫情对自己的出国留学申请或行程的影响“不好说”;仅有7.58%的受访者明确表示此次疫情“不会”影响自己的出国留学申请或行程。尽管充满担忧,但是70.14%的高校毕业生仍希望实现出国留学,也有29.86%的受访者开始动摇,并做了相应打算。

调查组成员一致认为,新冠疫情对不同就业选择和实践的高校毕业生都带来了一定负面影响。降低疫情带给毕业生的负面影响需要政府、高校、企业以及毕业生共同解决。首先良好的经济态势是保障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前提,各级政府部门要积极响应和贯彻落实中央指示精神,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其次,高校要完善就业相关服务,不仅要做好就业信息与数据的采集与分析,更应当关注毕业生的心理状态,做好思想教育或引导工作;要调整复试相关方案,为准备复试的毕业生备考做好保障;也要及时关注准备出国的学生群体,做好流动记录与其他帮助。第三,疫情之下在线招聘或复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要进一步加强部门协作、校企合作和资源共享,为毕业生就业提供社会支持。最后,毕业生要进行自我心理建设,消除焦虑心理,同时关注就业信息,并保持与学校就业指导老师的联系,积极应对当前就业的不利局面,相信终究会战胜困难。

疫情之下灯饰行业复工调查

——以中山市古镇镇为例

龚 宇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至今,已经成为席卷全球的大型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此次疫情不仅对社会生活造成严重影响,更是对经济产生巨大冲击。作为世界四个最主要的灯饰灯具专业生产基地和销售市场之一的古镇,也深陷疫情泥沼。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控制,古镇复工复产逐渐提上日程。企业艰难复工的背后,新的经销模式乘势而起。

关键词：疫情 复工

一、引言

2019年年底,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于武汉爆发。此次疫情传播广、破坏强、影响深远。1月20日,国家卫健委第1号公告将新冠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采取甲类管理。由于局部防控和全面防控的阶段性胜利,2月8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切实加强疫情科学防控,有序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工作的通知》,标志着我国战“疫”进入统筹兼顾阶段。疫情防控的同时,复工复产也刻不容缓。

古镇是一个有着超40万人口的专业镇,灯饰产业是全镇支柱型产业。新冠肺炎爆发后,全镇积极防控,截至4月18日,辖区内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零。2月9日,在全国疫情基本得到控制的大背景下,古镇镇政府在广东省委、中山市委相关文件的指导下,出台《关于古镇企业安全有序复工的通告》,并成立“古镇镇加强企业安全有序复工管理专项工作组”,确保企业复工安全有序进行。

当前疫情仍未彻底解决,而企业复工无疑意味着人员的接触和流动,病毒未知的传播风险,给企业是否决定复工带来了深度不确定的影响。即病毒传播可能性的大小未知,演变趋势也难以预测和把控。作为第一安全负责人的企业法人代表,决定复工意味着需要承担员工感染疾病的风险,而不复工对其持续性经营可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两难之下,企业负重前行。本调查在尽可能兼顾大中小企业的基础上,采用非随机抽样的方法,对三家企业进行了访谈。对疫情之后古镇灯饰行业的复工情况有了基本的了解。

二、文献综述

新冠肺炎攻坚战进入统筹兼顾阶段后,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双管齐下,在最大限度保证人员流动安全的情况下,恢复生产,促进国家经济复苏,尽可能减少因此次疫情所带来的损失(陈一飞,2020)。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家相关部委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企业复工。然而不同行业受疫情影响程度和

好坏不同，有的行业如医疗、互联网行业业绩节节攀升，而零售、制造、物流、餐饮等行业却遭遇“寒流”（陈一良，2020）。政府“有形手”发力的同时，市场的“无形手”也在起作用。企业在深度不确定环境下进行决策，更要明确优先级，将“保持零感染”作为复工的先决条件（陈意，2015）（胡越秋，2020）。在这样的疫情背景下，外来人口超过 50%的“灯都”古镇（熊晶，2015），灯饰企业为什么决定复工？又该如何保障复工安全？又将如何避免“复工即停工”的尴尬处境？本文将从对大中小三家企业的定性访谈的分析出发，尝试厘清上述问题，并给出回答。

三、三家企业复工调查介绍

（一）三家企业复工现状

1. 大型 A 企：复工刻不容缓

A 企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型照明企业，现有员工 5000 多人（中山）。产品涵盖家居、商照、电工、光源等领域，主要产品节能灯、吸顶灯、筒射灯、LED 照明等。A 企是最早向古镇镇政府提交复工申请的 802 家企业之一，并且是最早完成复工的一批企业。2 月 18 日前，已有员工陆续到岗。公司负责人表示，随着复工政策不断向宽松调整，员工的到岗率不断提高，18 日的复工率已达到 40%。并且在之后一周内复工率达 60%-70%。公司对返岗人员进行体温监测，进厂前也要先消毒双手。

随着复工号角响起，在 A 企的点光源车间，机器又重新热闹起来。这里一共有 15 条生产线，如果满负荷的话，一天能够生产 18-20 万个球泡。2 月 14 日开工后，5 天的时间内，这里已经重开了 3 条生产线，日产量可以达到近 5 万个球泡。值得一提的是，A 企的这批球泡灯将陆续送到疫区抗疫前线作为医疗照明使用，为抗击疫情作出贡献，展现企业担当。

作为最早复工的一批企业，A 企负责人明显感受到了疫情对于全行业所带来的破坏和影响：“我们供应商的复工率很低，到 2 月 14 日我们供应商还不到 10%，而且还不是中山市内的，是中山市外的。到 2 月 18 日，我们的数据就好很多了，我们上下游的配套资源都可以恢复正常开工。”



图 1：大型企业工人工作图

2.中型 B 企：观望后决定开工

B 企是一家经营组装和成品灯销售的外贸型企业，现有员工近 100 人。主要有台灯、吊灯、吸顶灯、壁灯等中高端产品，出口到欧洲等地。B 企原计划 2 月 21 日开工，受疫情影响推迟到 3 月 9 日。3 月 9 日，全厂员工复工率不足 20%，且以管理人员为主。在之后的一周内，该数据也没突破 50%。在问及为何管理人员到岗率几乎 100%时，负责人坦言，因为会统一为管理人员购买五险一金，并且都是在厂工作 5 年以上的老员工。而普通员工本身并没有福利待遇，流动性大本就是常事。普通员工到岗率低属于招工难，与此次疫情的影响关系不大。

随着疫情形势的变化，B 企产品的主要出口地——欧洲，逐渐成为此次疫情的重灾区，在这一变化的影响下，国外订单明显减少。一般而言，在接到订单后，会根据要求进行物料采购，主要是灯饰配件的采买，再组织生产。当产品生产好后，会有专门的贸易公司进行质检，只有质检合格后才会出货，流程图如下：



图 2：外贸订单生产流程图

B 企多年来的主营业务都是外贸，有固定的客户和订单。但是由于疫情的影响，原本每月最起码有一个订单能够出货，现在却被要求暂停和延缓出货。B 企负责人比较好的预料到了疫情的走势，所以一复工就立即把 2 月份下的订单装柜出货，成功脱手。而更多的同类企业却因为出货不够迅速，导致货物搁置在自己的手中，没有办法拿到项目的尾款，因此带来财务周转上的困难。

较晚复工的 B 企在开工时，下游及配套资源，如贸易公司、物流公司等都已经恢复工作，故没有造成什么影响。疫情所带来的影响更集中的体现在了产品的销量上，原本 3-5 月份每月应有 200 万元以上的产值，但是今年两个月的产值也不到 200 万。复工之后的财务压力，才是负责人真正头疼的事情。国家有相关文件要求房屋租金可适当减免，但是 B 企房东并没有准备减免，只是把房租三月一付改为了一月一付。除此之外，B 企负责人格外关注员工的健康问题，每天进厂前都要量体温和消毒，并且每天分发口罩。

3.小型企业 C 企：缝缝补补又一年

C 企是 2018 年刚刚进入成品灯市场的，产品主要是水晶蜡烛灯和铁艺灯，对自身的市场定位是面向中低端市场。国内主要销往郑州、重庆、常州等地，国外主要销往土耳其和俄罗斯。现有员工 10 余人，主要负责的和 B 企一样，也是成品灯的组装和销售。开工时间也由原来的 2 月 5 号，推迟到了 3 月 1 号。工厂的两名管理人员由于大巴停运，无法过来上班，C 企负责人就亲自开车到广西接员工回来复工。而对于普通员工，C 企和 B 企一样，认为流动性大，在联系不上或者没办法自己返工的情况下，都选择了重新招收新员工。

C 企国内的订单主要来自于装修公司和承包商，受疫情影响，家装行业无法正常开工，这导致订单

数量锐减，甚至到了没有订单的程度。而国外订单主要来自于出口国的商场和专柜，在国外疫情尚不严峻时，每月也是有产量的。然而国外形势急转直下，原本已经做好的订单由于港口关闭等问题无法出口，导致货物积压，资金周转困难。值得一提的是，土耳其客户在这样的形势下依旧向 C 企下订单，负责人解释说，外贸单通常会有一个月至 45 天的备货期，加上海运到土耳其大概需要 20 天至一个月左右，所以现在下的订单，真正到土耳其大概是两个月以后。这表明，土耳其客户对于疫情的控制持积极良好的态度。“尽管如此，订单量也由原来的每月一单，变成了三月两单。”负责人说。

早在刚进入成品灯市场时，C 企负责人就开始在抖音和微信朋友圈上传成品灯的视频和照片。据负责人自己说，起初是为了更好的宣传，并且能够做一些零售的生意。但是在疫情的影响下，这种线上零售成了 C 企的“支柱”。因为古镇作为成品灯的生产基地，在价格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客户如果在当地购买的成品灯，大概会溢价 1.5-3 倍。但是到目前为止，这种零售还是以“朋友推荐朋友”这种模式展开的，“信任”是 C 企在线上销售过程中遇到的明显的瓶颈。



图 3：小型企业工人工作图



图 4：微信朋友圈线上销售截图

（二）主要制约因素

1. 疫情反弹风险犹在

在重大疫情还未得到完全有效控制之前，大规模复工复产恐带来聚集性交叉感染，造成疫情复燃，威胁国家疫情防控工作大局。国家战“疫”进入统筹兼顾阶段后，复工复产企业就曾出现聚集性疫情感染的情况，如攀钢重庆钛业公司在复工后就发现两例新冠肺炎感染者，造成 131 人密切接触。此外，杭州、山西、苏州等地复工企业也有类似情况。这对企业负责人的复工决心无疑是一个动摇。在此次调查的三个企业中，中型 B 企表现出了最大的担忧，相较于 A 企，B 企管理经营模式不尽完善，没有成立专门的疫情防控小组，在预防疫情传播和及时发现疫情方面，也没有 A 企周全。而 C 企由于规模小，人员接触相对较少，在预防手段相差不大的情况下，B 企所承担风险无疑是更大的。疫情反弹的可能无疑是安全复工的一大绊脚石。

2. 防疫物资采购难

突如其来的疫情对各行各业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于与此次防疫物资相关的企业来说，更像是迎来了“行业春天”。据天眼查数据显示，2020 年 1 月 1 日至 4 月 20 日，全国口罩相关企业新增 46339 家，额温枪企业新增 149 家，消毒产品相关企业新增 18636 家。金盾医疗股份公司测算，2020 年一季度净利润相比于去年同期净增 900%-950%。在如此庞大的供应之下，防疫物资仍存在总量失衡、供给结构失衡、价格偏高等诸多问题。例如 C 企负责人坦言，由于口罩供不应求很难买到，并且价格偏高，有时只能将一天最少发放两次口罩，改为一天发放一次口罩。这对安全复工复产是一大考验。

3. 配套资源不同步

产业链环环相扣，一个环节阻滞，上下游企业可能都无法运转。灯饰行业的上游企业涉及荧光灯

管或 LED 芯片、塑胶、电子元器件、五金、包装材料等。下游应用领域包括家庭住宅、办公楼、写字楼、商店、工厂、景观景点、市政照明等。尽管古镇镇政府多措并举，对原材料、包装、物流等企业加大疏通力度，鼓励复工复产，但正如 A 企所面临的困境，疫情影响之下，大企业供应都显艰难，中小企业的处境可想而知了。此外，如 C 企负责人提到的，由于家装行业短期内很难开工，产品销量不佳。可见，复工容易复产难，复产容易复销难。

（三）复工促产的具体操作

1.政策保障促复工

古镇镇自 2 月 10 号起，解除禁止复工令，成立专门主管小组，科学安排企业复工相关事宜。出台“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十条”，共计安排 8800 余万元专款，降低企业税租负担，协助解决企业防疫物资需求等，全力助推企业安全复工，共克时艰。

前期稳抓严查是如今大好局势的奠基石。在 3 月中下旬后，湖北籍员工和企业老板开始回返古镇，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恐慌。但在政府的严格把控下，返岗当日，要做“三个一律”：一律发放一份健康告知书，重点提醒返回 14 天内除上下班外不要外出，不组织、参加聚餐、聚会等活动；一律开展健康状况问诊，询问是否出现发热、干咳、气促等呼吸道症状；一律验证健康通行码信息，指导其每日在粤康码上申报至少 3 天的健康状况。迄今为止，并未出现一例疑似或者确诊病例，这为企业复工打下了“强心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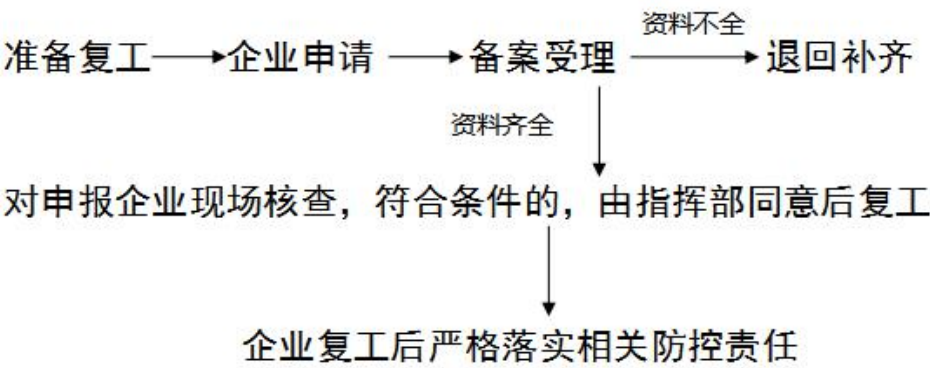


图 5：企业复工流程图

2.线上销售模式发力

疫情严重时，国家通过“封城”、“封路”、“居家隔离”等措施，有效遏制了疫情的发展和蔓延。进入统筹兼顾阶段后，由于仍有疫情反弹风险，复工复产紧锣密鼓进行的同时，复销成为一大难题。古镇灯饰行业的销售模式仍以线下经营为主，而在疫情风险的影响下，客流量大大减少，因此而造成的店面倒闭、转租的情况时有发生。例如在一项针对疫情后批发和零售行业面临困难的调查中，市场萎缩占比 35.54%。这让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目光投向线上经营这一销售模式。早在 2003 年，古镇就设

计开发“古镇灯饰网”这一提供网络营销推广的专业 B2B 平台，但是长久以来，知名度不高，使用该网站的供应商和客户都较少。

近年来传统的经销模式不断受到挑战。由于行业透明化程度不断加剧，生产地利润空间不断减小，“生意难做”已成普遍感受。在这种情况下，大型企业早早改变自己的经营模式，利用淘宝、京东等网络销售平台进行产品的销售，甚至欧普、华艺等知名品牌设计开发自己的销售网站。中小企业在这一方面则相对薄弱，但短视频自媒体平台的兴起，为中小企业的线上销售提供契机。如 C 企负责人除了利用微信朋友圈，还通过快手、抖音等短视频平台进行产品的宣传销售，而这也是相当一部分小企业或者个体经营者的选择。

四、分析与建议

（一）转型销售模式

“单丝不成线，独木难成林”，不难发现在线上销售模式中，大企业占尽优势，而中小企业往往受限于自身的规模、能力、人员等诸多因素，导致在线上销售中举步维艰，甚至盈不补亏，而不得不退出。同时也能看到政府甚至个人都作出过相关努力，例如中国“灯网”电商平台创始人梁锡坤，就想要为中小灯饰企业提供线上宣传和交易平台，有所成效，但是总体而言，没有充分发挥出古镇“灯都”的产业集群效应。政府如果能统筹规划，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中小企业“入网”，进一步打通交通物流等关键节点，利用此次疫情倒逼的契机，进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通过数据流打通全产业链，真正实现线上线下资源整合。

（二）提高风险管理意识

此次疫情暴露出中小微企业普遍缺乏风险防范意识，风险管理机制薄弱。一二月份中国疫情严重，无法生产，海外客户紧急催单。进入三月份，国内疫情得到控制、企业复工后，积极复产交付订单，却不料国外疫情严重、市场低迷，原本催单的客户纷纷推迟订单，甚至取消订单。这给企业造成了巨大的仓储压力和资金压力。不得不通过“少上班，多放假”的方式来缓解现金压力，甚至有相当部分企业因此倒闭关门。尽管政府部门通过减费降税、企业补贴等方式向企业“输血”，但若事前能够做好风险预案，便能够更好应对风险，保持企业长久稳定发展。

五. 结语

新冠疫情防控期间，企业选择延长假期还是复工都有其考量和合理性。此次疫情虽然对灯饰行业带来了比较严重的影响，但同时也暴露出雇佣关系混乱、产销模式单一等问题。复工容易复产难，复产容易复销难。政府引导员工有序回到各自岗位、企业安全复工，只是行业复工的第一步。上下游行业的断裂、市场的萎缩，都会给企业带来“复工即停工”的尴尬处境。贯通的产业链、蓬勃的市场、更加合理的经营机制等等，要想真正“复工”，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 [1]熊晶, 2015,《古镇灯饰产业在专业镇转型升级中的竞争力提升研究》, 电子科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论文。
- [2]陈一良, 2020,《疫情之下的企业众生相——旅游酒店餐饮业遭遇寒流、互联网行业迎来机遇、上市公司转产防疫物资》第 8 期。
- [3]陈一飞、周伟, 2020,《重大疫情后全面推进复工复产的思考与建议》,《决策与信息》第 5 期。
- [4]胡笑旋、陈意, 2015,《深度不确定环境下的决策分析方法——研究现状与展望》,《控制与决策》, 第 30 期。
- [5]胡越秋、王军、董泽华, 2020,《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复工决策分析——基于行为经济学视角》,《统计与决策》第 36 期。

☆ 作者简介: 龚 宇,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8 级本科生

☆ 责任编辑: 吴 娟

“停课不停学”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居家网络学习的个案观察

胡宇洁

为阻断新冠肺炎疫情向校园蔓延、确保师生的生命健康，教育部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于 2020 年春季学期延迟开学，坚持“停课不停教、不停学”。一时学生居家网络学习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本文聚焦于南京市 L 初中，观察该学校“停课不停学”的工作安排及学生的学习状况。受疫情限制，本次观察以 L 初中七年级 E 班的同学——李昊（化名）为例。

随着新城区建设和教育部宏观布局的调整，L 初中由两个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合并而成，学校的在读学生中约 50%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L 初中所在区域有几所办学实力较强的名校，“掐尖”影响 L 初中的生源质量。尽管学生构成较复杂、生源质量受影响，该校在学生入学分班、教学、课外活动等方面秉持公平原则，保障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权利。L 初中七年级 E 班班主任称班上有 29 名学生，其中一半的学生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她是一名数学老师，在 L 初中已经任教多年，和刚入职的班主任相比也算得上是“有经验的老班主任”了。根据她的描述，班上学生在课外活动中的参与率很高，例如在校运会等大型活动中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任务。在学习上，不少外来务工人员家庭的孩子很有志气，成绩排名属于中上游。李昊便是班主任口中“有志气”的学生之一。他是安徽人，从小学开始在南京上学，爸爸是一名司机，妈妈是厨师，在爸妈工作都很忙的时候，爷爷会照顾他。

L 初中的网课是从原本计划的开学时间开始的，要求学生统一在学校所在区的“云课堂”平台上网课。平台上的网课都是录播，有本校老师的教学视频，也有外校老师的视频。网课涉及的科目包括语文、数学、英语，其他科目没有网课安排，L 初中设置的攀岩、轮滑等特色课程也暂停教学。学校没有统一规定学生的网课学习时间和学习进度，不同课程的学习均由学生自主安排。E 班的班主任会经常在班级群发布网课学习进度和作业要求，随机抽查学生的作业，还私信班长或副班长提醒同学们少玩游戏。语文老师要求学生读完《骆驼祥子》等考纲必读书目并背诵课文，英语老师要求背写单词，但难以通过线上方式检查背诵情况，因此这两位老师要求开学后检查背诵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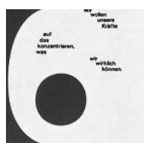
疫情期间，李昊一家人都在南京，没有回老家。他的一天是这样安排的。因为他妈妈要求他早起，所以他早上八点开始网课学习，一般学习两节内容，但每个网课视频时长不一样，具体学习时长不确定。除了学校的网课，他还在“作业帮”APP 购买了数学课程，结合“云平台”的网课同步学习。中午是他的打游戏时间，通常他会在只有同学的 QQ 群里找同学约游戏。疫情严重时，下午他会在家里

运动。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后，他会在小区里打篮球，大多数情况都是一个人，偶尔和小区里认识的几个叔叔一起打篮球，直到晚饭时间回家。隔两天他妈妈会抽查单词。说到妈妈时他有些停顿，平时他妈妈会监督他的网课进度，但文化水平不高，“顶多让我好好学习，只认识 26 个字母，所以只能抽查单词”。因为司机这一职业的特殊性，他的爸爸每天工作，没有时间过问他的学习。他在英语的网课学习中遇到不少困难，但由于网课不是直播，并且没有集体答疑时间，他就只能把问题留到开学之后。在空闲时间，他喜欢读课外书，既有语文老师布置的书目，也有几本励志类的书。他特别强调的是，没有搜到这些励志书的作者信息让他很不安，但他依然选择继续读这些书。李昊很喜欢读散文，提到的都是考纲要求的必读书，对课堂之外的书不太了解。此外，平时买课外书都是他妈妈帮忙网购，妈妈会根据他的要求有选择地买书。

李昊和他的同学们即将开学，除了卫生防护措施安排以外，伴随开学而来的还有对居家网络学习质量的检验。学生个人的自主学习能力与自控力、家长对学生学习的关注程度与辅导能力、学校的应急措施科学性都会在恢复正常教学的过程中得以显现。希望学校、家长和学生可以及时发现网课学习的问题并努力克服，尽各方所能保证教学质量。

☆ 作者简介：胡宇洁，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8 级本科生

☆ 责任编辑：吴 娟



我的 疫情故事

我身边的疫情故事

徐依婷

2020 年春节发生的“新冠”疫情应该是我生命历程中第一次真切地接触到全国性的重大事件。2003 年北京“非典”时上小学六年级，正常上课，每天老师要求喝学校统一熬制的中药，小脑袋中完全没有恐慌的意识。2008 年汶川地震时，上高二，因不是震中，我所在的地区伤亡较少，印象较深的是全校紧急转移操场时感受到的地面上起伏的地震波、回教室看到的满地狼藉，历经混乱回家时老人正在收割粮食的从容、恢复上课时远端语文老师声音中的哽咽。可以说以往发生的重大事件因地域距离较远对我和家人的生活并没有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生活秩序短暂混乱后又恢复如常。而这一次，我在疫区，生活在管辖区确诊病例人数最多的小区，楼下就有疑似病例，能强烈感受到新冠疫情对于芸芸众生的重大打击。

1 月 20 日钟南山院士在采访中坦陈“病毒可人传人，已有医务人员感染”时，此次事件才引起武汉人重视，在此以前，大家只知道有人散布“谣言”，华南海鲜市场可能存在某些卫生问题以致有人被感染莫名其妙肺炎，疫情可防可控等。在此前提下，武汉人民沉浸在春节前夕的幸福与忙碌中，有的盘算回老家过年，有的计划外出旅游，有的准备去超市“打年货”，有的在家炸藕夹、鱼丸等湖北传统春节食物。而我，1 月 10 日在光谷最大商圈排队等吃海底捞、1 月 18 日小年夜跟家人、朋友在武昌中心地带聚餐。随着疫情严重性的凸显，武汉人民的心理从无所谓到心理咯噔发展到极度恐慌，现在已经接受了这一事实。1 月 20 日最后一次出门散步，带上了口罩，还特意发了朋友圈，根本没有预料到这将是一场波及千万家庭的灾难。1 月 23 日早上起来闻知十点即将“封城”，昨夜民众纷纷逃离武汉的消息时，恐慌逐渐漫上心头，我和家人成了留守武汉的 900 万分之一。1 月 24 日除夕夜，心不在焉地观看了春晚，看着对面楼栋的灯火，不知留守武汉的他们心情是否也如我一样既有恐慌也有侥幸，应该没有那么严重吧？应该很快会结束吧？每天都希望这只是一场噩梦，明日醒来所有一切恢复正常。接下来所发生的无情地打破了这一幻想，每天不断上升的确诊人数，微信群里散发的“小道消息”、口罩一只难求、外卖快递停业、冰箱食物越来越少，感觉自己像被网困住的鱼，不知道何时会被呈上餐桌，简直是精神摧残。离开和留守，各有利弊。不过我和家人都很庆幸没有离开，一是无处可逃，谁能预知哪里是最安全的地方呢？二是并不想给外地的人带来麻烦。即使挣扎，即使焦虑，我们也始终在熟悉的环境里。离开武汉的人，日子并不好过。外地人视武汉人为“病毒”，同学带着孩子回老家，已主

动在家自我隔离，还差点被村里领导带走。滞留海南的朋友不仅无法回鄂，还得支付高昂酒店房费。我也接到打来骂湖北人的令人哭笑不得的电话，只因疫情妨碍了他们的正常出行与串门。面对这场疫情，其实谁也不是局外人，地域距离、心理距离，各地疫情的严重程度不一，很快划分出“我们”与“他们”。最开始，我们也认为疫情发生地的汉口人才具有威胁，直到后来，3公里以外发现确诊病例，小区发现确诊病例，甚至楼下的一户人家也发烧隔离。病毒扩散的范围变大，使得更多的人成为了局内人。从局外人到局内人，心态的变化十分复杂。角色是局外人时，心里想的多是华南海鲜市场糟糕的卫生环境，老汉口拥挤老旧的街区，顶风作案的过年聚餐；角色是局内人时，一天测三次体温，大量喝水，不自觉地去对照网上流传的感染症状，难以忍受抹黑武汉的段子，对疫情的扩散深感担忧。

疫情完全打乱了普通人的生活计划，也可能改变部分人的生活方式。准备正月结婚的朋友不得不推迟婚礼，计划春节赴云南旅游的朋友无奈取消订单，同学的毕业调研工作只能延后，预约了产检的孕妇不敢去医院就医。社会犹如一架机器，各部门是其中大大小小的齿轮，一旦某个齿轮停摆，整个机器就无法正常运转。冠以科学的名义，孕妇生产之前要经历大小几十项检查，平日里，她们已是更容易焦虑的群体，检查单上的数字、医生不经意间的语气、眼神都让新手孕妈忐忑不已，而重大疫情的发生，使得这一群体的焦虑程度直线上升。有孕妈不顾家人反对坚持按照预约时间去产检，也有孕妈发扬经验育儿思想，安慰自己母辈基本没做产检也能顺利生产。除产检外，中介机构停止派遣月嫂、育婴店停止营业，生活不便的同时，人们是否能看清以科学的面具带来的无谓消费与服务？信奉“断舍离”的前沿人士、以保健品代替正常饮食的老年人，盲目追星立志做网络主播的青少年是否会因此反思此前的行为进而改变以往的生活方式？并非对以上群体的生活方式进行价值判断，只是客观地思考重大疫情对于群体可能产生的后续影响。不论个体的思想、行为如何变化，经历疫情后，整个社会应过滤掉浮躁的气息，留下本真，以更加务实、脚踏实地的态度来建设我们的家园。

经常有人问我“武汉怎么样？”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不知道。因为自1月20日后我没有出过门，我没有亲自观察过这座城市的状态，无法给出定论。现实生活、网络空间、电视里成了三个不同的世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在解决旧有问题后也带来新的社会问题、信息不畅通与信息过于畅通都有可能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网络空间中的消息多由草根发布、负面消息最多，同时反转也很快。电视里传递的是疫情严重但同时又有必胜的正面消息，而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在权威信任式微时往往更偏信小道消息。相关部门加强对网络传播的管控后，微信群安静下来，心态也逐渐好转，接受了疫情发生并且短期内难以攻克的事实。朋友圈里开始流行探索在家里如何娱乐的视频，全国人民尝试洗面做凉皮、电饭煲做蛋糕等。根据我的观察，微信群里老年人多，群里发布未经证实的视频、链接的多，群员的发言也比较极端；微信群成员学历层次高，正能量与负能量内容均有，来源更为可靠，评论更为客观。

重大疫情下不同阶层群体的生活样态不同但在感染风险较大、医疗资源严重紧缺，权力、人情、资本失效后大家又是同一粘板上的鱼。任何人的逝去对于一个家庭而言都是重大打击，普通人可能只是官方通报的一个数字，而官员、教授、导演等这些占据一定社会阶层位置的人还能得到社会关注。当然，疫情并不会主动区分患者的身份与阶层，但不同阶层群体的身体健康状况、免疫能力、居住空

间、抗风险能力、社会资本状况存在显著差别。可以看到，武汉市疫情重灾区往往在市中心地区，人口密度高，住宅老旧，社区绿化、卫生环境较差，一个物业公司需要对接几千户人家，当然，房价其实并不便宜。而住在别墅的群体，被感染的可能性大幅减少，物业公司能提供细致周到的服务。这些细微的差别还表现在，“封城后”公共交通停止运行，依赖公交、地铁出行的普通居民连囤菜都面临着较大的困难。虽大部分家庭已能够实现温饱有余，但在房贷、车贷、奶粉等硬性家庭支出下“月光”家庭可以说苟延残喘，经济压力与精神压力并存，一天两餐，家里肉类只剩下火腿肠是我周围朋友的真实写照。人尚且能发声，而楼下的流浪猫早已瘦骨嶙峋，连垃圾桶里的厨余都没得吃。紧急状况下，熟人组成的单位小区、职工小区优势得以显现，他们可以寻求单位的支持，建议单位统一购买蔬菜，也能集中力量要求物业公司提供服务以满足生活所需。而陌生人居住的小区，信息混乱，难以拧成一股绳，物业公司面临各种喷涌而来的个性化需求又不知所措。

有研究显示，汶川地震之后，结婚率与离婚率同步上升。重大事件给予人们重新思考家庭关系与生命意义的机会。生活应删繁就简，平时无谓的应酬、酒宴、会议占据了人们大量时间，当然，并非所有人都热衷于此，只是碍于人情、面子等中国式社交规则的制约。接近一个月不得外出，家庭成员在封闭空间中有更多时间相处。面对外部疫情冲击，有家庭凝聚力不断提升，夫妻重归于好，守望相助，分工合作解决家庭事务；也有因封闭空间无法释放情绪、回旋余地减少，家庭冲突不断升级，虚性和谐关系被破坏。坚持独身的人士信念可能动摇，平时相互忍耐的夫妻也可能看透人生而选择分道扬镳。从“忍”到“不忍”，从“不忍”到“忍”，夫妻关系、家庭关系冲突与和谐的转换值得深思。听闻湖北疫情可能扩散，有亲友从福建开车8小时到湖北黄石与独生女儿、刚出生的外孙团聚，临行前周围人的劝导都无法阻拦他们，随着疫情逐渐严重，一家人一定要在一起共同面对难关的意志更是坚定。重视家与家庭文化，始终是中国社会的文化底色。个体化的潮流虽对年青一代夫妻关系有所冲击，但在纵向的家庭关系上，中国人仍对子代毫无保留，即使子代反馈的不一定是养老承诺、金钱与尊敬，即使子代与亲代在对待谣言、对待人生的态度上迥异。

疫情发生后，除一线医务人员以外，这座城市的普通人也加入到抗疫行动中。周围朋友有志愿去高速路口做体温检测与防疫工作；有大学职工小心翼翼整理将作为方舱医院的学生宿舍，有政府工作人员在防护薄弱的农村一线值守，有科研机构工作的朋友为政府出谋划策，上交咨询建议，有素不相识的微信群友为疑似感染患者家属提供信息上、心理上的援助。家人中有去社区参与消毒、排查疫情、运送物资，也曾冒着感染风险给方舱医院工作人员捐献爱心物资，还有小朋友录制“武汉加油”等正能量视频。可以说，身处暴风眼之中的很多武汉人是以正面的、积极的方式来帮助这座城市抗击疫情。我们在批判文件内容与实际操作脱节、一刀切的规定与个性化需求相悖时也应该用建设性、积极性地态度来参与社会实践，这个社会不缺旁观席上高高在上的批判人士，缺的是用行动改善社会的“行动派”。每个人都应立足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择其擅长之处，发光发热。

疫情何时会结束，还未可知。除湖北外，其余地区的生产、生活秩序逐渐恢复，令人欣慰。疫区的生活秩序也从混乱变得逐渐有章可循，成功经验得以迅速推广。忍受宅家不自由的同时，也应感恩

有家可宅，毕竟通报文件上的每一个数字都关系到一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后续还有很多事务待政府处理，疫情后的重建工作、抗疫的经验与反思也应逐级列入日程。对于普通人而言，春暖花开，我们必心怀感恩地仔细观察这座城市、每座桥、每条街道以及生活在其中的每个普通人。抗疫行动结束后，它将成为武汉人的饭后谈资，同时也会成为武汉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最后，感谢每天发信息关心身体状况的辅导员、导师以及我的朋友们。

☆ 作者简介：徐依婷，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8 级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吴 娟

疫情下的农村“人情”

杨兴鑫

“人情”的本义是人与生俱来的情感，是每个人都有的，人与人之间能够共通的情感，人的常情、世情；情谊、情面等。最开始出自《史记·太史公自序》：“人情之所感，远俗则怀。”随着历史的发展，尤其是农业文明的定居行为，人情有了特定的表达形式，就是农业文明里共同体之间的互相帮衬，在婚丧嫁娶的时候给予的帮助，这种帮助由以前的搭工搭料进化成货币的支付，并以“报”的形式，人情在农业文明里固定了下来，一步步成为农业文明里影响农民实践的重要影响因素。人情在农村不能不走，这事关自己是否遵守与他人以及整个农村共同体的心照不宣的约定，而且也是促进感情交流的重要形式，每年过年都有轰轰烈烈的走人情运动。那么今年新冠疫情影响下的“人情”是否还和往年一样呢，在走人情遇到疫情的客观影响的时候是否会发生某些变化，这又体现了人情本身的什么特点？笔者尝试以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做一点回应。

病毒爆发前，人们一如往常的走人情。笔者表姐在1月15号举办酒席，婚丧嫁娶之中，婚在第一位，也是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最重要的事情，事关主人的“面子”与主人在亲戚中的地位。酒席的举办兼顾了宣扬确认自己在共同体中的地位的作用，以及强化自己与“关系”的感情的作用。表姐家在县城的鼎鼎有名的a酒店单独包了一层楼，之所以选择这个酒店，一是因为很有名气，从外地回来的朋友只要给出租车司机报这个名字，都能找到。二是因为这个酒店的消费很贵，档次很高，是一种夸耀自己身份与实力的炫耀性消费，来这儿的客人们会受到出租车司机的赞叹，而客人自己能受邀到这种级别的婚礼，也能沾一点光享受。表姐家请的客人不仅有在外面的朋友同事，还有老家的邻居和亲戚，尤其是老人们，表姐专门派车去农村老家把相熟的老年人专车接来。宴席大摆了三十多桌，延续了15号的午饭和晚饭两餐，婚礼结束后，表姐家合计收到礼金二十多万元，刨除成本，赚到了十多万元。看起来是“赚”的一笔，但是表姐却并不这么认为：现在到手的只是以前捐出去的一次回本，也是以后要还的。从这句话可以看到，人情是一个循环往复，不能跳脱的经历，以前随的别人的人情，这次能够收回来一些，但是这并不代表人情就结束了，是一个封闭的“交易”了。相反，这只是一个漫漫无期的往来账目的一部分，现在收得多，以后还的就会更多。此外，除了经济上的收入外，对亲戚、朋友和社会关系的感情维护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通过人情的由头，将许久未联系的社会关系联络一下感情，迎接乡下老人，当众展示自己“敬老、不忘本”的美德、夸耀自己的社会资本等，这些是人情背后的真正考量以及人情无法断绝的原因。

疫情防控形势下，为了安全，政府通知停止一切酒席活动以及封路，无数个本来打算在过年办酒席和走亲戚的计划被临时打乱。村民一开始显得很慌乱，很多村民抱怨，提前买好的菜都囤在那儿没用了，为了不让菜坏掉，得天天吃大菜。很多村民都有这个预期家里会来很多客人，这种预期来源于

对人情习惯的信任，相信没有特殊情况，这些人一定会来的。人情的力量之强可见一斑。但是疫情影响下的人情开始被强制性的中断了，亲戚们只能纷纷打电话宣称：今年不过人情了，不聚会了。平时由于顾忌彼此的面子与和气，大家一般不说对走人情的真实态度，这次没有亲戚的在场，对人情的真实态度就可能显示出来了，村民们是否真的如他们日常所说的“人情还是要走，不走不亲近”呢？笔者观察访问了自己妈妈以及其他几位村民的意见，出乎笔者意料的是，很多村民都觉得很开心，显示大家其实都很不喜欢走人情，太累了。事实真的仅仅是太累了吗？不可否认的是，确实会很累，每年过年走人情的时候，要准备很多食材，要安排很多客人的床铺，还要不断地在不同亲戚间彼此轮转。但是以前也这样啊，比如笔者母亲说，前几年，至少五六年前吧，感觉都没有这么累。为了了解村民对走人情态度变化的原因，笔者回到了走人情的本来意义以及现在的状态，发现走人情一开始的目的是互相帮衬的货币化表示，背后是一种邻居互助的善意，所以人情还有个别名叫“礼行”，但是后面随着经济发展，这种帮衬本身已经变得没有必要，而支持人情运行的，更重要的是“报”这个因素，也就是对对方的回馈，由于农耕文明的传统，地理上具有不可脱离性，因此报才能够在一片地方长期运行，形成一个停不下来的“跑步机”。另外一方面，因为大家长期在外打工，彼此交流和情感联结也很少，并没有“情感联结”的需要，所以走人情已经部分变成了“鸡肋”。然而考虑到村民们对于“和气”的推崇和对“不通情理”舆论指责的害怕，虽然大家心里都觉得走人情的意义不再，但谁也不敢第一个喊停。因此疫情下刚好给劳民伤财而很少有实际意义的人情安一个冠冕堂皇的暂停键。

然而人情真的可以就这么停下来吗？或者借助疫情，让“跑步机”暂停一下，然后孕育更为新颖的农村交流形式？抑或这个长期的暂停键能让村民们好好思考走人情的意义？为了解这个问题，笔者继续观察等疫情稍微缓解的状态下，人情有没有变化。3月初，疫情基本缓解，道路也解封了，压抑的走人情开始复苏，出乎笔者意料的是，走人情开始出现报复性的上涨，村民对人情的态度也从负面开始走向正面，对人情的看法也开始变得积极。解封以后，道路上人来人往，笔者观察到邻居的家里每天都有客人来，同样负责做饭的女主人却显得很开心，不仅如此，来做客的客人也开始主动帮主人做饭，男客人则帮主人劈柴砍树等体力活，这在以前是很少出现的，以前的客人都是仅仅是来做客的，很少主动帮主人做家务。笔者家也是，笔者父母和姑爷等亲戚聊天的内容和深度明显更深入了，几个以前有过节的亲戚也很快冰释前嫌。之所以会这样，一方面是疫情下的控制让村民有时间可以静下心来认真感受自己的需求，尤其是情感需求。村民们还是对村庄共同体有很强的归属感，在外务工的都是工具性关系，能满足工具性需求，却很难满足情感性需求，每年只有在过年走人情的时候，才会借助血缘关系这个不可逃避的纽带，来互相信任，倾诉，帮助与安抚，通过各种亲戚关系找到自己在家族中的定位，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另一方面，新冠疫情让大家都感受到生活不易，同处于灾难之中能加强群体内部的认同。看着新闻简报上一天天增加的数字，不断收紧的交通管制和产业限制，村民们开始有了共同的危机意识，在危机之中会看到团结和团体的重要性，以及家族的力量，人在脆弱的时候会习惯性的找回自己的归属。因此村民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自己所能依靠的力量，然后发现，村民们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亲戚，只有通过亲缘、血缘和姻缘而互相联结的亲戚才是自己归属

的家族。因此村民们之后走人情的心态更加平和，对亲戚更加同理。

走人情一开始是基于互帮互助的原则而发生的彼此资助现象，由于“报”的运行而让人情变成一个无法停止运转的“跑步机”。虽然后面人情也参入了炫耀性消费、社会资本以及情感联结的因素，但是整体上民众对于走人情还是比较负面的态度。疫情之下民众正好可以冠冕堂皇的停止人情的运作，这也给民众一个反思和冷静的机会，能看清人情到底在人们生活中起到什么作用。疫情之下的危机感以及人们对情感的需求使得民众发现自己对人情还是有需要的，自己唯一能依靠和归属的只有靠血缘、姻缘和亲缘联结起来的人情网。因此疫情后人情马上死灰复燃并且呈现报复性走人情的趋势，另外，疫情下的共同经历和体验也加深了人们对彼此的感同身受和对彼此的认同感，增加了走人情的温情。

☆ 作者简介：杨兴鑫，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9 级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吴 娟

半山坡上的网课女孩

荣显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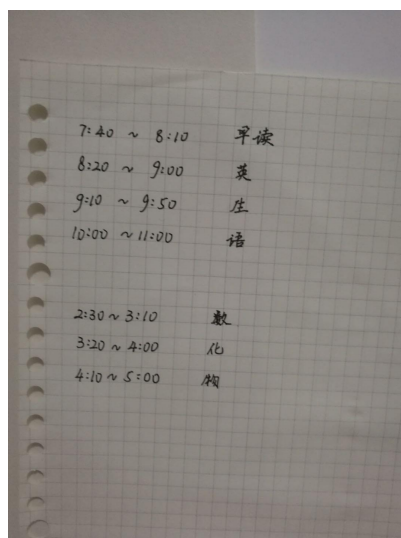
冬末春初的清晨，还有丝丝凉意，天际刚泛起鱼肚白，年过六旬的奶奶就已经在为正在读高中的孙女准备早餐。柴火灶里的粥冒着热腾腾的白烟，刚把粥呈上饭桌，孙女岳静云已经起床洗漱完毕，匆匆忙忙吃完，就跑到窗台前，拿起书开始晨读。晨读结束后天已经完全亮开了，岳静云开始收拾书本、搬上凳子、裹上厚厚的外套，准备去自家房屋后面的小山坡开始网络课程学习……受疫情影响，学校无法开课，从2月10日安岳县安岳中学就开始采取网课教学。“停课不停学”，网络课程的教学方式，削弱了疫情带给家庭的学习压力，让无数望子成龙的家长感觉非常欣慰。但是却使像岳静云这样的农村孩子面临着网速缓慢、智能设备缺乏等一系列“网课困难”的学习挑战。网课确实是一项“极具挑战”的授课方式，隔着屏幕的教学，给予了学生自由，却也考验了学生的自我约束能力以及各方面的配合能力，更是对学习设备、网络速度有着高标准要求。



图 1：岳静云在坡顶学习

岳静云每天的学习计划大都是晨读、网课、课程练习、作业提交等。早上七点至七点五十晨读；八点，接收老师发布在班级 QQ 群里各科当天需要完成的作业，反馈各自的问题；上午八点半至十一点、下午两点至五点进行网课学习；晚上观看新闻和老师分享的视频；每天分别对学习情况、身体状况进行三次汇报。高中的课程难度大，每天的网课是岳静云学习中重要的部分，刚上高一的她非常担心落下功课，所以非常珍惜通过网课接收老师讲授新知识、讲解例题、分析难题的机会。由于在家里手机网络信号不好，即使在窗户边上网课，视频也断断续续，效果很不好。一个偶然上坡赏花的机会，她发现山坡上的信号更好，从那之后，带上板凳、穿上厚衣服去坡顶上课已成为她的学习日常。虽然是初春，但是气温还是较低，偶尔遇上下雨，打着伞、穿着雨靴，双手冻的通红也坚持在坡顶完成网

课学习。



7:40 ~ 8:10	早读
8:20 ~ 9:00	英
9:10 ~ 9:50	庄
10:00 ~ 11:00	语
2:30 ~ 3:10	数
3:20 ~ 4:00	化
4:10 ~ 5:00	物

图 2：岳静云的课表

“当时第一节课在钉钉上进行，老师提前两天就通知我们下载、注册钉钉账号，特别麻烦。在开始上网课之前刷抖音、微博啥的看到别人老师觉得好搞笑，心里还是很期待，想看看我老师会不会也很搞笑，但是正式上课后，网络真是意想不到的卡，完全没有耐心听课。”第一次上课，岳静云从期待变成了失望，后面几次网课也无一例外的卡顿，这样的情况让她非常的苦恼，有想过让家里人办宽带无线网络，也有想过重新申请一张移动的流量卡，但是在疫情影响下出不了村庄，各种念头只好作罢。遇到听不到的课就让同学帮忙录屏进行回看，就这样辛苦的坚持了几天，勉强完成了第一个星期的网课学习。后面无意间发现房子后面的山丘网络好，她就这样踏上了“坡顶”学习的辛苦路。岳静云说“坡顶上网络比家里好多了，至少不会卡得很厉害。风景也挺好的，但是就是很冷，有时候吹冷风感觉脑壳都空了，我又有鼻炎，总是鼻塞不舒服，但是没办法啊，还不是必须得学。”

疫情下，网络课程既是救急，也是创新，更是挑战。网课填补了学生居家学习的空白，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学习时间。岳静云说“我觉得上网课可以，不懂的知识点可以反复看回放，更利于知识的学习和渗透，而且在家里学习很自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我都想一直在家里面学习了。”相对于无法在校上课的情况而言，网课成了学习的最后一道保障，但是高度自由的网络课程，也存在一些弊端。对于老师而言，隔着屏幕的教学是否是对学生有效的知识输入方式，学生到底有没有认真听课，教学知识吸收的程度如何等种种问题都仍待考量。对于学生而言，在网课学习中更需要学生高强度的自觉性和自律性。“我觉得网课虽然挺好的，但是它非常考验学生的自觉性，自觉性差的肯定不会学。”，“那你会写作业吗？”“我可能写三分之一，老师要检查的作业我一定会写！”，“那你知道你其他同学的学习状态如何吗？”，“勤奋的勤奋，懒惰的懒惰，我觉得如果继续这样持续进行网课的学习，我们学校的升学率都可能会下降！”“那你觉得网课还有什么弊端吗？”，“老师讲题，因为没有学生的及时的提问，知识点过了就过了；连麦不及时，第二次老师讲下题的时候，连麦已经迟了！”相对于直观的课堂学

习，网课更容易出现学生知识掌握度不够、作业完成度低、师生沟通不畅等问题。

温馨、自由的家庭环境突然变成了紧张、忙碌的学习场地，对于很多望子成龙的家长而言是希望的曙光，也是身兼多职的挑战。不少的家长负担起家庭教师、监督者、娱乐约束者等多重身份。兼顾工作和家庭的家长面对网课也是分身乏术，有在冷风中陪伴孩子去村支部蹭网络的父亲；也有因为上班无暇顾及孩子学习，孩子调错电视频道后却坚持上完高一网课的一年级“可爱”学生；更有没及时监督孩子，通过直播打赏主播十几万的“荒唐”学生。家长的监督作为网课学习的重要保障条件之一，然而很多家长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很好地将工作和“网课”结合起来。岳静云的家里就只有她跟奶奶两个人，爸妈都再出务工了，有时候奶奶也会搬一个小凳子，坐在岳静云的不远处陪着她学习。唐奶奶说“我没读过什么书嘞，也没有文化，她爸爸妈妈都在外面找钱去了不能监督她学习，平时她拿着手机也不知道在学习还是在玩，我有空了就上来看看她，监督一下她。”提高网课的学习质量，需要“他律”更需要“自律”，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特殊时期，面对在线网络课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体验和感受。为了更快更好适应这段特殊的过渡期，各方都在积极努力的配合，老师辛苦备课、上课；家长积极监督、约束；学生努力投入网络课堂；网课形式、时长、教师权益等规定都在细化；各大在线教育平台也不断优化课程软件、服务内容等。总的来说，这是一场越来越规范化、细致化、完美化的“网课战役”，所以只要学生足够努力、积极，控制得住惰性，好好利用网课的资源，足以能收获满满的知识。像岳静云所说“虽然在山坡上饱受风霜很辛苦，广阔的山坡上就只有自己一个人顶着反光的屏幕在学习，但是对我来说都一样，能够克服的都不叫问题嘛！”，迎难而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不找任何借口，不怕任何困难，拿出“山不就我，我去就山”的勇气、成为疫情结束后一匹学习中的黑马。

☆ 作者简介：荣显琳，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9 级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吴 娟

疫情下的人在囧途

吴 娟

在春节期间爆发的“新冠”疫情，由武汉开始向全国范围内扩散，1月23日武汉封城。这次突发事件，给人们的心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对新型冠状病毒慎之又慎，政府、社会组织和群众们纷纷采取紧张而迅速的安全措施进行病毒的防控，一部分人们对有可能接触到病毒地区的人们唯恐避之不及，同时又有一部分人们冒着感染病毒的风险对疫情的防控献出自己的绵薄之力。

在共同抵御疫情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条新闻。2月8日，陕西汉中出现湖北50岁货车司机被困高速近20天事件引发关注，有热心网友为其捐助10096.6元。这件事情的经过是，1月29日，已经两天没睡觉的肖师傅在应急车道停车休息，被汉中高交大队执勤民警了解情况之后带他到了附近的服务区，肖师傅说，“年前1月7日，从湖北荆州拉一车货出来之后，一直到今天再也没回过，我唯一的奢望是能有个地方让我停下来，好好的睡一觉。”2月8日，汉中高速交警协调了服务区为肖师傅准备了一间房子，热心网友还为肖师傅捐助了206笔善款共10096元钱。肖师傅说，“感谢这么多人的关心，大家都不用再捐款了。疫情过去后还是想靠自己的双手赚钱，养活一家人”。

看到这则报道的同时，我深深感受到了工薪群体讨生活的心酸，近两个月的时间，肖师傅被迫流浪在高速上，被家乡拒之门外，不能与家人团聚，回不能回，走不能走，自己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落脚之处。那么多天孤单的在高速上开车，估计连一顿像样的饭都没有吃过，更不用说睡个好觉，如果在某个疲劳的瞬间他懈怠了，放松了警惕，让人不敢想象接下来的发展。于家庭而言他是家里的顶梁柱，是丈夫，是子女，是父亲，于芸芸众生而言，他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小存在，在顾全大局之中，他是有可能被忽略了的那个存在。

封城、封村、封小区，严格控制人们的出行，减少人员流动，仔细筛查过往的人员车辆，进出的人员车辆都会让大数据进行控制检查，拒绝新的成员流入，让被堵截的车辆原地返回是最为合适的措施，至少对于陕西省整个省而言是最佳的，不仅是整个省，全国全社会也是如此，但是人们却忘记了被堵截的车辆，可能也会被自己的省份拒绝进入。就像徐峥和王宝强主演的《人在囧途》一样，春节回家的路上被封路，两个大男人无奈挤在一间小旅馆里，发生了一系列鸡飞蛋打啼笑皆非的故事。肖师傅的经历只是一个个例，可能是严重的也可能是普遍的，我了解到的被家乡拒绝困在外地的湖北人员还有很多，他们之中有在酒店宾馆进行隔离的，有在出租屋进行隔离的，面对着花销大、精神创伤大、失业风险大等情况，本是在春节进行阖家团圆的日子，但是他们却远离了亲人和家乡，被漂在外地，这其中不断被城市、社会成员拒绝的坎坷路途，在肖师傅身上可以窥探一二。

在突发事件爆发的时候，考验着整个社会的应对能力，无论哪一个层面的社会机制不完善，就会不可避免的出现一些社会问题。医疗物资的配备，社会成员的流动，舆论的走向，经济的波动，关系

国计民生的问题，给医疗卫生系统和政府统筹调控带来一个又一个新的挑战。我们要知道的是防止疾病传播不仅需要利用科学知识来救人，也需要各个社会阶层的共同努力。

疫情严重的时候，死亡率的上升，感染率的升高牵动着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心。感染病的可怕之处在于两个陌生人之间的接触会在不经意间感染上病毒，病毒的存在拉大了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自我隔离、与他人保持距离成为了人们的共识，几个月前我们不会想到出门要三思而后行，但是现在谁要是擅自聚餐玩乐，打破了这个新建立起来的社会规则，一定会为大多数人所不齿。所以我们看到的肖师傅，他并没有因为被拒之门外而产生对这个规则的反抗。从另一个侧面看，人们共同抗击病毒，相互之间的心理距离和社会距离拉近了。人们会因为同情小师傅的遭遇而施予援手，他们是身处远方的陌生人，与肖师傅互不相识，但是会因为看到其他人为了抵御病毒产生的难处而伸出援手，大量的捐款、捐物，各种形式志愿服务活动，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加密切了。

从这次隔离疫情的过程中能看到，人们隔离病毒的措施虽然非常的严苛，但是符合医学要求，隔离的措施也是有实实在在的成效在的，新冠肺炎患者死亡率的下降，确诊病例的减少使得人们渐渐安心。疫情当前，大家更清楚了什么叫做社会责任感，人们纷纷扛起自己身上的责任，自我约束、自我隔离，有很多人因为这次的突发事件，有家不能回，有觉不能睡，这些人们需要社会群体的关心，值得庆幸的是，我也确实看到了社会上人与人之间温情的一面，他们也确实得到了关心。

疫情不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让大的社会冲突变少，焦点聚集在病毒身上。人们由刚开始的对于病毒的担忧和恐慌情绪，也渐渐变得积极乐观。他们拥有的共同社会角色是攻克和抵御疫情的社会群体，只要是符合这个角色的设定，人们都可以行动起来。不一样的社会阶层，由于共同的社会角色，让一群陌生人成为自己人，不同阶层的人们成为同一个战线，凝聚了社会力量。不同阶层群体的人们也因为疫情一改从前的生活方式，他们有的选择在家“坐以待毙”，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做到真正不出门就为国家做贡献，有的按耐不住活跃在疫情地区为大多数人送去温暖，舍小家而为大家，为那些行动不便的普通居民提供服务，有的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奔赴疫情前线，与病毒感染者接触，防止疫情的进一步扩散，除了这些还有很多的小人物都在为这次的疫情贡献自己的力量。

当疫情有所好转的时候，所有的生产生活即将回归正轨，我们要反思的是，新的社会危机来临之时，新的风险和机遇也随之出现，如何考虑可能面对的问题，怎样预先做出应对社会问题的方法。面对群体的心态变化，控制焦虑，以及舆论的走向，避免出现一些不理性的集体行为，这些都是推给整个社会的问题。“新冠”疫情使我们意识到社会是一个守望互助的整体，每个人都离不开社会。这次为了抗击疫情每个社会群体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中不免牺牲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包括时间、金钱、人力，重要的是我们不仅要治病，也要治心，整个社会在尽力弥补人们在这次危机中出现的创伤，试图改变人与人之间冷漠的关系，建立一种和谐的社会关系。

☆ 作者简介：吴 娟，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9 级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吴 娟

※ ※

河海大学公管院与爱德基金会深化合作交流座谈会圆满举行

6月5日，河海大学中国移民研究中心主任施国庆教授带队，社会工作教育中心主任王毅杰教授，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陈涛副教授，社会保障系主任韩振燕教授，社会学系主任顾金土教授、胡亮副教授、亓迪副教授、党支部书记邵占鹏博士及毛绵逵博士，一行九人赴爱德基金会就深化双方合作进行座谈交流。爱德基金会理事长丘仲辉，秘书长凌春香，副秘书长褚朝禹，秘书长助理、社会组织培育中心主任田梅梅及相关团队负责人和主管参与本次座谈会。

座谈会上，爱德基金会理事长丘仲辉对我院的老师们表示了热烈欢迎。他强调，希望此次交流能够成为河海大学与爱德基金会推进“产学研”深度合作的重要契机，将更多的理论研究与公益实践相结合，助力公益行业的发展和公益理论的创新。

中国移民研究中心主任施国庆教授详细介绍了参加座谈的各位老师所擅长的研究领域、未来重点课题等；陈涛副院长介绍了学院的历史沿革、学科概况等情况。

爱德基金会凌春香秘书长在座谈会上提到，河海大学公管院与爱德之间已有多年的交流合作，包括研究生实习、项目评审、研讨交流等多方面。她感谢我院师生对爱德工作的大力支持，也希望借此机会让双方相互更加了解并深化合作。随后，秘书长助理田梅梅代表爱德向来宾们介绍了爱德的发展历程、工作重点和服务领域。河海大学王毅杰教授、韩振燕教授、顾金土教授、胡亮副教授、亓迪副教授、毛绵逵和邵占鹏老师等也分别围绕科研合作、学生实习、人才交流等进行了发言和交流。

座谈会上，双方就未来“产学研社”领域的合作意向与内容进行了详细探讨，围绕人才培养等领域也达成共识：

一方面，在养老、扶贫、助残、助学及社区发展、灾害管理、社会组织培育、青年国际交流等多个研究领域进行深入合作，发挥河海大学公管院的研究优势，推动我院与爱德在多个研究领域开展深入的合作交流；

另一方面，依托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中国移民研究中心的资源与中国跨国企业的资源，爱德基金会丰富的合作网络，开展“校+企+社”深度合作，提高青年公益人的知识储备和国际视野。另外，围绕我院各专业优势，推进社会学、社会工作、社会保障等多个学科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等利用爱德基金会平台实现实习、科研、工作等多方面交流合作，拓宽双方合作交流的形式，创新合作机制，深化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合作交流。

双方坚信，彼此协同、校社联动，就一定能在科研合作、人才培养、公益创新等方面推出更多成果！



博士毕业 论文摘要

2019 年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摘要*

农村水库移民社会分层及其机制研究

古安琪

指导教师：施国庆

答辩日期：2019 年 3 月 14 日

关键词：农村水库移民；七阶级；四阶层维度；阶层地位获得机制；LRC 移民村

摘 要：中国农村水库移民是由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占）地所致，规模大且相对集中，是一种特殊的移民群体。水库移民是以政策和规划为依据，由政府统一组织搬迁到异地进行生产生活安置，具有很强的非自愿性，在移民安置和社会经济系统重建过程中，移民社会分层结构发生新的变化。目前，政府、社会及相关企业对移民群体内部的差异性缺乏足够重视。作为研究对象，水库移民往往被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以往社会分层研究的对象并没有将非自愿移民纳入其中，而已有水库移民研究也缺乏社会分层视角。本文试图从社会分层视角切入，对农村水库移民的分层标准和分层机制问题尝试进行研究。

先从“等级论”出发，结合移民实际，选取职业、收入、土地和住房四种资源作为移民等级阶层划分指标，再从公共权力因素、市场能力因素、社会资本因素以及移民政策四个方面分析移民阶层地位获得机制。同时，结合“公共权力”和“市场”两种动力因素，从“关系论”出发绘制出移民的七阶级图式。研究发现：七阶级、职业声望、家庭等价人均纯收入、住房可以作为农村水库移民社会分层有效指标，特别是阶级作为基础性划分，无论是在各阶层中的分布还是在地位获得模型中的解释能力均具有较高的效度，能够清楚、显著并且稳定地区分移民群体。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移民是农村水库移民的代表，本文是以村为单位的个案研究，调查数据通过 2012-2016 年在河南省南阳市 LRC 移民村实施的“水库移民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调查获得。在具体分析中分别运用差异比较分析不同人口特征移民以及不同阶级移民在职业、收入、土地和住房上的差异，并比较搬迁前后各阶层及差异变化情况。在阶层地位获得模型中，将因变量操作化为职业声望、家庭等价纯收入、家庭使用土地面积和住房综合得分，运用多层线性模型以及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 以答辩时间和作者姓名首字母为序。

阐述阶层地位获得机制，并对搬迁前后地位获得机制进行深入对比研究。最后探讨移民社会分层特性，并提出政策建议。LRC 移民村个案分析表明，总体上看，除土地面积外，搬迁后的职业声望、收入、居住点内住房等差异均比搬迁前减小；在阶层地位获得机制方面，公共权力作用增大，村庄管理者、党员在职业声望、住房方面搬迁后优势增强。体力资本凸显，“年轻移民”在职业声望、收入与家庭使用土地面积方面优势明显。文化资本失灵，技能劳动者在职业声望、收入方面均出现地位下移，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作用并不明显。移民原有的社会网络遭到极大破坏，社会资本作用下降。移民政策造成移民发展区域不平衡，影响移民的发展机遇，同时对土地、房屋资源分配有直接影响。政府应重视移民社会分层信息，逐步削弱政策结构性影响，通过建立长效保障机制、加强公共资源投入、重视市场作用及移民家庭功能等措施对现有移民政策进行改进。

新型农村社区共同体的实践逻辑

——基于鲁南“规划型社区”CF 社区的个案研究

卢义桦

指导教师：陈绍军

答辩日期：2019 年 3 月 14 日

关键词：新型农村社区共同体；规划型社区；实践逻辑；形塑机制；多维互构

摘 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配套工程，是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基层政权的重要举措。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战略部署，首次将农村社区建设与城市社区建设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表明农村社区建设的总体目标和方向是新型的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这种“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实践样态是本研究的逻辑起点，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所塑造的社区共同体的实践逻辑是本研究的核心问题。

本研究以鲁南“规划型社区”CF 社区为个案，以物理空间集聚以及由此带来社区政治、经济和文化实践样态为分析维度，总体性审视作为一种整体性社会事实的新型农村社区共同体样态，并系统性提炼新型农村社区共同体的实践逻辑。新型农村社区共同体是指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在政府引导与村民自愿结合的基础上，由地域相近的多个村庄合并而成，且以行政区划为边界、能够满足人们共同利益和需求、拥有多元联结纽带、为实现社区集约发展而形成的一种带有社会建构特征的地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可以说，新型农村社区共同体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空间场域所组成的大的集合体，在每一个具体的空间场域内发生的互动都不同程度地向社区提供社会整合的粘合剂，衍生出不同的社会关联，从而形成一个有机联系共同体。

首先,从物理空间转型视角系统性考察 CF 社区共同体的空间样态。第一,CF 社区是统筹城乡发展理念的规划性产物,主要表现为居住空间的集聚化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两个方面。第二,家庭空间的转型包括居住方式由院落散居变为楼房聚居的生活空间和生产性院落的消失的生产空间两个方面。第三,公共空间的转型表现为以村庄办公场所变迁为特征的正式公共空间的转型和由传统村落时期的房前屋后、晒麦场等空间转变为社区中的楼前房后、棋牌室等空间的非正式公共空间转型。CF 社区空间变迁的理想图景是借助于新的社区物理空间改变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扩大人们的社会联结和社会交往,不断建构起社区生活的新秩序,为新型农村社区共同体提供空间运作基础。

其次,从社区组织、社区选举与办公以及社区权力视角系统性考察新型农村社区共同体的政治维度。第一,社区组织体系建设和社区网格化管理等社区组织一体化实践是社区共同体运作的政治组织基础。第二,“合推合选”与“分推分选”并存的社区复合式选举以及作为整体化工作实践的集中办公制度,为政治组织运作提供了制度化保障。第三,“社区集权”与“村庄均权”的权力新结构以及“四议两公开一监督”的权力民主化实践是社区共同体运作的权力表达。

再次,从社区经济发展、社区经济管理、社区村民经济联结等三个方面系统性考察新型农村社区共同体的经济维度。第一,通过社区村民生计变迁以及镇域和村集体经济发展脉络阐释 CF 社区作为经济共同体的培育;第二,CF 社区采用社区三资和社区建设发展资金统一管理的方式实现了社区经济层面的整合;第三,基于经济组织发展案例,阐述 CF 社区在“强个人一弱集体”的经济特征下,通过具有地域经济特色的合作社联合社,实现了社区居民现代经济意义上的联合经营及经济利益联结纽带重建。

第四,从社区娱乐生活、社区精神生活以及社区互助生活等三个方面系统性考察新型农村社区共同体的文化维度。第一,从以社区广场舞为代表的“自发型娱乐活动”以及以露天电影和送戏下乡为代表的“组织型娱乐活动”两方面阐述社区娱乐活动之于社区共同体的整合功能;第二,从以红白理事会和社区公墓为案例的社区移风易俗,以及“CF 好人”与“四德建设”为代表的社区道德评比等两个方面,阐述社区精神生活对社区共同体的行为约束与规范作用;第三,社区邻里交往和社区公共事件等社区互助生活为社区共同体提供了“事件团结”的可能。

最后,通过上述分析,提炼出新型农村社区共同体的地域样态、实践特征以及形塑机制,回答在社区空间变迁的基础上如何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维度形塑为新型农村社区共同体。新型农村社区共同体是在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等三大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形塑而成,其地域样态包括地域边界的开放性、社会结构的复杂性、社会空间的公共性以及形塑机制的复合性等,其实践特征表现为社会空间的流动性和社会整合的现代性。另外,展望了新型农村社区共同体的未来。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新型农村社区共同体的形成是以空间变迁为前提,以政治维度的组织和权力运作实践为基础,以经济维度的社区经济一体化及合作组织联合为关键,以文化层面的社区公共生活重建为根本。新型农村社区共同体是在国家、市场与社会三种力量“多维互构”下的实践结果,可以视为“多维互构型”共同体,表现在共同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实践维度互相

关联，三大形塑机制存在交互作用关系，以及与村落共同体在培育机制、联结纽带和资源配置上存在显著的不同。当然，新型农村社区共同体并非是完美的，有其自身的困境，需要进一步的整合与完善。新型农村社区共同体是一种已经出现雏形并在走向完善的共同体，其生成和发展必然是一个漫长且杂的过程，而且它依然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生新的变化。

垃圾分类政策修正中的竞争与妥协

——以 N 市激励方案为例

王泗通

指导教师：陈阿江

答辩日期：2019 年 5 月 22 日

关键词：环境治理；垃圾分类；政策修正；体制壁垒；竞争；妥协

摘 要：环境治理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环境治理制度体系。理想状况下，地方政府所出台的环境治理政策在“下级执行反馈与上级纠偏调适”的良性互动中趋于完善。然而，受压力型的科层管理体制和“政绩”竞争的影响，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即使在执行过程中发现政策设计存在的某些缺憾，也多会优先选择权变式的行为策略进行“自我”消解。本研究重点围绕实践中较少出现的“反馈—调整”政策修正过程，解释并探讨地方环境治理政策运行中相关主体的利益竞争行动及其具体策略，反思非正式的行动策略所潜藏的制度风险。

在国家层面的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指导下，N 市政府与世行展开项目合作，通过引入世行贷款并借鉴其垃圾分类处理经验，在全市范围内系统化地推进生活垃圾分类。为达到世行的项目结项成果条件，实现 N 市政府的实践模式创新诉求，N 市财政局委派专人制定了社区参与垃圾分类的激励方案。该方案从社区能资源化的垃圾分类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设计了考核指标及折算公式，并以资金奖励的形式来引导、调动社区及其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方案设计者过于推崇技术至上的理念，方案设计明显脱离于 N 市的实际情况，导致在“自上而下”的层层分解落地过程中，社区普遍反映激励方案操作难度大，不仅难以有效规范并监督督导员的数据采集行为，而且关键指标也难以精确获得。而垃圾分类办为确保如期完成目标任务，选择性地忽视或弱化了社区的意见反馈，反而将实施重点调整到强化社区考核上来，致使社区不得不采取“掺水分”、“撂挑子”和“躲事情”等消极应对策略，以此“倒逼”方案的修正调整。

在社区的反向“倒逼”下，垃圾分类办逐渐理解了社区的消极应对行为，并聘请第三方专家来寻找方案难以操作化的问题根源。在第三方专家看来，唯有以社区实践反馈为依据，彻底修正激励方案设计中的不合理之处，方能摆脱在社区层面的落地困境。但迫于方案设计方的“威压”和较高的修改成本，垃圾分类办选择了购买社会服务的变通方式来消解执行梗阻，但因成本控制不佳和专业性欠缺，又滋生了社会企业“磨洋工”和社区争当“甩手掌柜”的新问题，直接导致购买社会服务的变通方式“难承其重”。

在屡次遭遇失败后，垃圾分类办不得不直面方案设计方，并采用正式及非正式的行为策略向其施加压力。垃圾分类办先是利用体制内的正式协商程序，尝试与设计者进行协商沟通，但因方案附加了多方主体的利益诉求，方案设计者利用个人“权威”坚决阻挠方案的修改。迫于无奈，垃圾分类办转向寻求体制外的世行力量和上级分管领导私人关系的帮助，并联合第三方专家、各区垃圾分类办及社区等多方力量，最终获得了修改方案的权限。但在具体修正过程中，垃圾分类办并未采取釜底抽薪的方式彻底纠正方案的设计问题，而是在兼顾科层内相关主体利益的基础上，主动向方案设计方“示弱”、妥协，在保留原框架的同时仅对部分标准作了微调，从而使方案执行与修正之间达成了短暂平衡。

透视激励方案的修正过程可以发现，无论是社区对垃圾分类办，还是垃圾分类办对设计方，都较难依托正式的科层体制有效地“向上”反馈方案设计问题，多只能通过非正式的行为策略反向施压，才能实现对方案设计问题的有限修正。就其效果而言，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政策设计问题的修正，但也造成了较大的科层损耗，降低了政府治理的效率。因而如何将实践中较好的非正式行为策略吸纳到正式制度设计中，并使其形成相对稳定且具有合法性的运作机制，既是理论所向，又是实践所需。从本研究得到的启示在于，政策运行和政府治理应充分动员并整合社区及居民参与其中，构建多中心协同的治理机制，从而密切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底层力量对科层体制的优化和监督。

农村老年人健康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宗占红

指导教师：黄健元

答辩日期：2019年5月22日

关键词：农村老年人；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综合健康；分层 logistic 模型

摘 要：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城乡二元体制尚未从根本上消除差异，人口形势也面临着一些新现象、新问题。当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已经逆转，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人口老龄化程度存在城乡倒置现象，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老年人口健康存在城乡差距，

农村老年人口健康处于弱势；城乡健康服务资源分布不均，农村滞后于城市；农村老年人不健康现象引发个人、家庭生活转轨，甚至行为失范。国内外文献中关于老年人健康的相关研究并不少，并且已经在老年人健康发展及其影响因素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关注我国农村老年人健康的却相对较少。以往研究中，老年人健康维度比较单一，鲜有多维健康的全面研究；健康影响因素多局限在个人层次，鲜有对个人、家庭、社区多层次因素的综合考量；研究数据多局限于横断面调查，鲜有健康追踪研究。为全面了解我国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丰富国内农村老年人口健康研究，促进农村老年人口健康发展，促进农村老年人口健康水平与服务提升，本文开展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研究结构主要分为研究设计、实证分析、研究结论三个部分。研究设计通过文献梳理，基于社会支持的人口健康影响理论提出农村老年人健康影响研究的理论框架，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选取2011、2013、2015年连续追踪满3期的3773名农村老年人作为研究样本，对他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综合健康及其影响因素开展研究。农村老年人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综合健康分别用BADL/IADL能力受损、抑郁症状发生、良好自评健康测量。在重复测量的时间基础上，影响因素包括个人、家庭、社区三层次，其中个人特征包括人口学因素、健康相关行为及病患状况三个子特征。人口学特征包括出生队列、性别、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健康相关行为包括体力活动、社交活动、吸烟、饮酒，病患特征包括身体残疾、患有慢病、身体疼痛、充足睡眠，家庭特征包括家庭收入、居住方式、有人照料、隔代照料，社区特征包括社区区域位置、外在形象、老年人活动场地、卫生服务可及性。实证分析首先利用文献梳理提出研究假设，在变量间关系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分层logistic模型对农村老年人健康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多元回归分析，验证假设并解释健康影响机制。研究结论部分提炼全文，形成主要结论，对研究结果进行讨论并提出政策启示。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一是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较差，综合健康水平持续下降。农村老年人普遍存在不健康现象，以综合不健康发生率为最高、心理不健康次之，躯体不健康紧随其后，并且躯体、心理及综合健康是一体多面的关系，两两关联、互相促进。跟踪期内，农村老年人良好自评健康发生率呈现“ $\searrow$ ”形变动，抑郁症状发生率“ $\downarrow$ ”形变动，BADL能力受损发生率“J”形变动，IADL能力受损率“U”形对称变动。

二是个体特征对农村老年人健康有显著影响。(1)存在健康高龄门槛效应，女性健康水平较低。不同出生队列的健康效应显示80岁更像是一个重要台阶，跨过80岁门槛的农村老年人虽然躯体功能严重下降，但心理健康、综合自评健康最积极；女性健康水平比男性差；教育程度与躯体健康、心理健康正相关，与综合健康负相关；有配偶的心理健康更好。(2)健康相关行为影响农村老年人健康，体力活动、社交活动对健康均有促进效应，吸烟、饮酒增加了抑郁症状发生风险。(3)病患特征损害健康，身体残疾、身体疼痛、缺少充足睡眠及患有慢病大大降低了农村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并且健康负效应更甚。

三是家庭特征对农村老年人健康有显著影响。较高家庭经济收入的健康影响效应是积极的；生病

或需要时有人照料的健康影响效应是积极的；隔代照料对心理健康有消极影响，但对综合健康有积极影响；与子女同住仅与农村老年人 IADL 能力受损发生率存在正相关。

四是较好的社区支持环境对农村老年人健康有积极效应。东部社区的农村老年人健康程度普遍高于中西部；社区内建有老年活动中心对健康有积极效应；除 BADL 能力，较好的社区环境形象对 IADL 能力、心理健康及综合健康都有正向显著影响；较好的卫生服务可及性仅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有积极显著影响。

制度变迁中的乡村民办教育转型

——以中部仁县为例

丁百仁

指导教师：王毅杰

答辩日期：2019 年 5 月 31 日

关键词：制度变迁；乡村民办教育；教育转型；“制度—选择”范式；市场竞争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民办教育获得了快速发展，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增长点和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已有的乡村民办教育研究大多停留于上个世纪 90 年代末本世纪初，似乎逐渐被学术界所淡化，与其迅猛发展形成鲜明对比。为此，在振兴乡村教育的新时代背景下，论文以中部仁县这样一个欠发达地区的乡村民办教育为研究对象，试图将其拉回研究视野。

生存与发展是民办教育永恒的主题，而转型是民办教育谋求生存与发展的不二法则，尤其是在急剧变化、纷繁复杂的社会转型期，犹如相关研究所指出的，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民办教育发展的主题词依然是“转型”与“升级”。是故，本研究将聚焦欠发达乡村地区的民办教育转型问题。同时，与以往研究从组织内部变革（比如校长视角）或外部环境决定（比如新制度主义视角）考察不同，本研究秉持组织与环境共同演化的基本立场，在借鉴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和战略选择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选择”这一理论新范式，该范式既强调了环境尤其是制度环境对组织影响的外在性，又凸显了组织包括组织领导者对环境的能动性，并以教育竞争（或市场竞争力）作为分析切入点，在大历史事件法指导下深入考察了欠发达乡村民办教育转型的演变过程、特点与机制。

首先，仁县乡村民办教育的发生学考察揭示了其转型的基础和起点。本研究发现，该县乡村民办教育始于一个离岗“民师”的办学之举。这虽然是个体化事件，但将它放置于仁县民办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却带有历史必然性，又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性事件。该事件表明，在教育体制改革下，正

是由于当地老百姓对公办教育质量的不满，才促成了乡村民办教育的兴起。而且，随之而来的乡村民办教育迅速扩散更加证实了这一点。也即，对以仁县乡村为代表的一些欠发达乡村来说，民办教育也可能是作为“优选”的“质量替代”，应该归属于差异需求说，而不是“次优”的“国家办学的补充”，即超额需求说。同时还发现，此阶段的“办学质量”虽然优于当时公办教育，但仍然是较低水平的。一个显而易见的标志就是其组织形式表现为“家庭作坊式学校”，无论是从学校的硬件设施（比如，庭院式的校园），还是从学校的软件设施（比如，初、高中毕业的师资）来看，都是有欠缺的。这也造就了今后转型的必然。

其次，借鉴大事件历史法的思想，本研究厘清了乡村民办教育发展史上的三个重大历史事件，以及由此触发的三次乡村民办教育转型。第一次始于 1997 年，以《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为代表系列法规的出台标志着，民办教育从此进入依法办学、依法管理、依法行政的新时代。与此同时，“先上船再购票”的仁县乡村民办教育由于自身身份的“不合法”，再加上，周边公立村小的联合抗议，导致了其在躲避关停危机的同时，采取向公办村小看齐的方式寻求合法性。并且，还与公办村小进行着质量取胜的趋同竞争。在此过程中，实现了由早期的“家庭作坊式学校”到走读制的“正规化学校”演变。第二次始于 2005 年，“两免一补”政策贯彻落实以及随之而来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促使乡村地区开始逐步进入免费义务教育时代。本研究发现，“两免一补”政策启动时的“区别对待”把公办村小带到了优势地位，从而，一方面，让乡村民办教育顿时面临“发展性瓶颈”，另一方面，使乡村民办教育在“流动的社会”中寻找到了机遇——留守儿童的生活服务。在此过程中，实现了由走读制教育到开放式半寄宿教育的转变。第三次始于 2016 年，突如其来的全面教育均衡化，促使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面貌焕然一新。然而，在改善和完备公办学校办学条件特别是包括校舍、操场、食宿、功能室等硬件设施同时，也冲击了乡村民办教育，并且，还使它们对即将到来的高质量优质均衡化充满隐忧。因而，乡村民办教育再次把目光转向了作为教育消费者的学生家长，有所不同的是，它们此次捕捉到了“完人的教育”这一回归教育本真的发展战略。由此，乡村民办教育在校园文化运动开展中实现了“文化立校”。但因为在发展战略落实过程中转向了狭义的作为“完人的教育”的主要抓手——“德、艺”，也导致了“未尽的转型”，会在今后的环境或条件下继续完善“完人的教育”。

第三，在此转型过程中，民办教育实现了优势的生产。总体上，三次教育转型对应的优势分别是人有我优的“知识竞争”、人无我有的“生活竞争”和人优我特的“育人竞争”。其中，“知识竞争”主要是面向考试、分数和成绩等；“生活竞争”主要是面向食、宿、行等；“育人竞争”主要是面向完人、核心素养、全面发展等。同时，它们具有以下特点：从竞争形式来看，是由趋同竞争到差异竞争；从竞争实质来看，是由工具取向到育人（价值）取向；从竞争时效性来看，是由短期竞争到长期竞争。而且，对于乡村民办教育（学校）来说，“知识竞争”、“生活竞争”和“育人竞争”这三种优势的生产并非彼此排斥，而是具有互补的叠加性。由上，本研究发现，虽然乡村民办教育的三次转型都是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但是，第一次转型和后两次转型的触发起点有所不同：第一次更多的是始于（合法）身份危机，尽管后来也是为了解决趋同竞争之质量取胜；而后两次直接始于效率危机，且一贯如此。

同时，乡村民办教育的三次转型也都反映除了它们背后共同的演变逻辑，那就是“制度诱导下的市场化应对”，其至少具有以下三层含义：其一，制度性约束是诱因，更多的是起到外部刺激作用；其二，市场机会只是提供了转型的现实可能；其三，乡村民办教育组织尤其是其举办者的市场化应对才是促使转型的根本。换言之，乡村民办教育转型既不是完全国家主导模式，也不是完全市场主导模式，而是国家（制度）诱导下的市场化追逐，即在国家与市场之间，但更强调市场导向。

转型社会中城一城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研究

卢楠

指导教师：王毅杰

答辩日期：2019年5月31日

关键词：流动人口；社会转型；邻里效应；社会比较

摘 要：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城一城流动人口的规模逐渐增大，但他们在城市社会的状况尚未得到学界关注。由于主观幸福感既包含了对客观生活质量的认识又能反映主观体验和感受，对城一城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有助于认识这一群体在城市中物质和观念上的情况，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当前我国区域不平等的影响机制和后果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以工业化和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转型，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交往特点，频繁而又持久的人口迁移和社会流动导致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和原有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它不仅引发了中国城市社会的物质利益分化，也带来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巨大的嬗变。这双重变化的影响体现为人们原有的住房状况和社会比较倾向的转变，成为影响转型期中国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因此，由于当代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引发了人们的物质利益分化和观念转变。在这一宏观社会背景下，从住房分化和社会比较倾向入手来探讨当代城一城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或许是一个更有效的切入点。

本研究试图回答的基本问题是：转型社会中城一城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受哪些因素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问题：我国城一城流动人口群体有什么样的特征？与乡一城流动人口有何不同？在物质利益和思想观念两个维度上，各自影响城一城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是什么？其作用机制有哪些？本研究运用2014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2014）的全国数据和8城市专题调查数据，首先对全国城一城流动人口的总体特征进行了描述和说明；其次在物质维度上，考察“住房分化”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这既包括住房作为资产如何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财富效应，也包括

住房通过所处社区的环境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邻里效应；最后在观念维度上，分别从参照群体（和谁比？）和参照系（比什么？）两个方面探讨“社会比较倾向”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据此探讨社会转型对于城—城流动人口观念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城—城流动人口是不同于乡—城流动人口的群体，他们的在城市中的社会经济地位更高。具体而言，城—城流动人口的职业层级更高，受教育程度更好，在城市中拥有房产的比例更高，更倾向于长期居留城市中。然而大中城市城—城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与乡—城流动人口几乎没有差别，体现出客观地位与主观心态相悖的情况。

第二，在物质利益维度上，住房分化对城—城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这种直接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流入地城市拥有个人产权住房有助于提高主观幸福感，但由于城—城流动人口与本地城市居民拥有房产的差距较大，房产倾向于扩大两者主观幸福感的差距，体现出住房的“财富效应”。但移民的选择性效应使得城—城流动人口比本地城市居民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本和心理资本以提高幸福感，才使得两者最终相差不大。其次，住房所在的社区环境有利于提高主观幸福感，但这一“邻里效应”存在户籍异质性，即仅对城—城流动人口有影响，而对乡—城流动人口没有影响。这是由于两类流动人口的观念存在差异，城—城流动人口的期望更高，更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邻里效应通过“相对剥夺”这一心理机制发挥作用。

第三，在思想观念维度上，社会比较倾向的幸福效应也十分明显。总的来说，在社会比较中处的位置越高，其主观幸福感越强。从参照群体的选择倾向（和谁比？）来看，“自身在全社会层级中的位置”这一主观认识，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大，说明城—城流动人口更倾向于“总体参照”——即将自身与全社会的人进行比较，而非已有研究所强调的“流入地社会”或“流出地社会”等“局部参照”。从参照系的选择倾向（比什么？）来看，以经济地位为比较内容时，认为自身所处位置高低的影响最大，说明城—城流动人口更看重利益，而非以往传统社会中的尊重。研究还发现，上述两种现象也适用于乡—城流动人口。这体现出社会转型不仅使社会本身发生深刻变化，身处其中的人也深受其影响。

本研究从社会转型入手来探讨城—城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不仅有助于拓展幸福感已有的理论解释，还丰富了“社会转型的影响及后果”这一研究主题的已有研究成果。同时，对城—城流动人口这一群体的研究，将为探索转型期发展“以人为本”城镇化的途径和策略提供重要的经验资料，并为政府及相关部门制定社会建设的有关政策方案提供学理依据。

生计实践中的农民组织化研究

——以吉县果农产业实践为例

乔文俊

指导教师：王毅杰

答辩日期：2019年9月12日

关键词：农户；组织；生计实践；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业链

摘 要：乡村振兴首先要产业振兴。农业产业兴旺既是乡村振兴的起点，也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农业产业发展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各界，特别是学者们所关注的重要内容与核心领域。现有研究大都从市场主义、制度主义、文化主义与网络主义的研究范式出发，更多关注市场机制、政府及其产业政策、地方知识与社会网络等方面的影响与作用，却较少关注甚至忽视了农户自身这一决定农业产业发展的关键性力量。本文从农户协作出发，分析并讨论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农业产业发展间的互构关系及实践过程。研究发现，农户作为推动组织发展的重要主体之一，其是在与市场、国家等外部力量的产业实践互动过程中，完成了自身组织化的实现。由此，本文尝试回答这样一个理论问题：农民主体性如何在经济领域中体现并实现。亦即在小农经济下，农户协作与组织化在产业实践过程中的实现问题。

回溯人民公社时期，国家对乡村社会进行“统合”，完成了对地方政府和广大农民的全权“管控”。在此阶段，国家跨越社会、垄断市场，并对乡村主体进行整合，这一具有革命性质的改造过程，颠覆了传统乡村的社会结构及主体性质。在高度“统合”的集体经济实践逻辑下，“以粮为纲”的国家政策得以贯彻执行，此时的集体经济组织成为推动地方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唯一组织形式。然而，在此期间集体经济组织的实践过程中，制度供给日渐乏力乃至固化，一种农民自我行动逻辑伴随着地方现代农业——吉县苹果产业的萌芽，在集体组织内部生发。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将市场逐步交还给社会，农民的自我行动能力进一步释放。然而，面对外部市场的深刻调整与变革，广大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却因村庄内部组织行动缺乏而裹足不前。在吉县则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地方政府强推苹果产业政策，由此引发农民不满甚至反抗，在“推”与“挡”的过程中，集体经济组织从重建走向悬置；另一方面，农民自建果业协会，引致地方政府介入并加以管理，地方政府与农民专业协会组织之间形成了“建”与“管”的关系。可以说，国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亦是地方政府与乡土社会对经济组织进行重塑的实践过程。在此过程中，吉县苹果生产格局伴随着经济组织重塑而逐步形成。

在探索农业产业化阶段，农产品市场进一步放开，市场机制开始从城市向乡村渗透，村庄内部市场逐渐成形。农民专业协会成为这一阶段吉县农村苹果销售市场变迁中的重要组织形式，由此也带来了地方经济与乡土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吉县农民开始对当地政府所推行的苹果产业政策逐渐接纳，并主动参与到市场建设和经济实践当中。以农户为主的联合促使农村基层社会逐渐成形，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果业协会组织在吉县农村广泛创建并推广开来。此时的农村，农户们找寻着农业生产领域外的其他增收渠道，吉县农民在苹果销售领域的组织化进程开始启动，并呈现出产业化、区域化的特征。

为了缓解销售压力,进一步延长产业链,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地方农业产业新业态——吉县苹果仓储行业逐渐兴起。在仓储行业的嬗变过程中,农民苹果专业合作社发挥着重要作用。至此,地方仓储行业的产生、发展及其组织形态的演进便进入到产业研究的视野当中。冷库作为新组织主体的出现,使吉县农村社会、经济与组织结构再次发生变化,伴随着一条“产、贮、销”的全产业链在乡村社会与经济组织内部建立,国家、市场和农民等多方主体愈发频繁地在合作社组织场域中,对农村社会与经济资源展开新的配置与安排。各利益主体开始在组织内部展开博弈,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结构进行改造,使得后者逐渐演化出不同的组织形态,并表现出不同的组织特征,随之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及困境,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经济组织社会合法性的追求与实现。

通过对苹果产业发展历史的逻辑分析和规律总结,本研究发现,吉县苹果作为地方农业产业化的特殊实践,为我们展现出农业产业发展的具体组织路径。而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变迁过程中,不同层次及深度的嵌入与融合,表现为农民主体的不断卷入与协作,最终使得农村农业产业实践走上了多元化、组织化发展的实现路径。换言之,农民正是在不断深入的农业产业实践中,通过与市场、国家等外部力量的互动,完成了自身组织化的最终实现。

易地搬迁移民社区的空间再造与秩序重构

——基于陕南西乡县的田野考察

郑娜娜

指导教师:许佳君

答辩日期:2019年11月14日

关键词: 易地搬迁;精准扶贫;空间生产;空间再造;秩序重构

摘要: 在反贫困治理实践中,易地搬迁不仅是扶贫开发事业的一部分,也是一项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政治目标的治理技术。在国家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下,“移民上楼”使村落原有的土地边界消失、政治边界瓦解、经济边界模糊和文化边界消解,使一个守望相助、以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强调互惠合作的乡村秩序逐渐淡化,传统乡村共同体消失。易地搬迁过程不仅仅关涉时空变换,同时也是“文化置换”“经济转型”和“组织嬗变”并存的过程,新的空间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重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

本研究以陕南移民搬迁安置活动为载体,以空间社会学等相关理论为基础,以移民社区空间生产与再造为主线,以空间秩序重构为关注点,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和“过程—事件”分析方法,试图对移

民社区多维空间及其秩序重构进行全面考察，探索移民社区再造的动态性过程，并分析其空间建构的实践逻辑。易地搬迁移民社区再造和秩序重建是在多维空间的互动中实现的，沿着“社区何以可能”这一经典社会学问题思路，本研究可以分为以下几部分：

首先，从顶层设计、空间实践以及底层回应三个层面探讨社区空间的生产机制，研究发现，易地搬迁移民社区的建构是国家权力的全面干预，社区空间是权力运作的中观场域，无论移民是居住环境恶劣被迫搬迁还是经过理性计算主动迁移，他们面对的都是国家规划好的社区空间，这说明我国依然是“强国家—弱社会”的基本结构，但通过移民案例发现，这种基本结构有所松动，某种程度上国家与社会向着相互融合的方向发展，移民社区生产与再造的过程是国家自上而下的权力渗透和移民自下而上的诉求反应两股空间关系之间博弈和融合的结果。

其次，移民社区空间再造的类型化分析。本研究从居住空间、经济空间、组织空间与文化空间四个维度考察“移民上楼”后的空间再造样态。第一，居住空间的压缩与集聚，一方面作为农民生产生活空间的统一体，村落共同体面临生活空间消失和生产功能弱化的困境；另一方面新型社区空间压缩和公私空间分明导致小区“种菜”等争夺公共空间的失序行为或“返迁”“拒不搬迁”“上访”等移民抗争行动。第二，经济空间的萎缩与繁育，一方面地理空间的变革使移民的生计方式出现“农业-农业型”“农业-非农型”“非农-非农型”“非农-农业型”四种模式的转换；另一方面生活场域空间的变化也使移民的消费方式由自给自足转向从市场获取，消费需求由基本生存资料消费转向“发展消费”“享受消费”等多元需求。第三，组织空间的瓦解与转型，一方面，居住空间的位移使移民家庭组织从扩大家庭转向核心家庭，社会组织从初级群体转向以地缘和业缘为纽带的次级组织，熟人社会变成了“半熟人社会”；另一方面，空间变革使移民社区中传统的内生性力量与行政嵌入性力量交织融合，社区治理面临文本制度与实践规则分离的困境。第四，文化空间的消解与重塑，一方面，原有公共文化空间瓦解和公共性功能弱化，移民传统文化娱乐方式淡化，移民身份认同出现困惑与迷茫；另一方面，新社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修护和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展重塑了新的文化空间。各种物质和意态空间的再造对建构平等和谐、互惠合作的社区秩序发挥重要作用。

再次，社区秩序重构何以可能？从经济空间看，农村集体经济产权改革、农民合作社和互助资金合作社的出现、社区工厂的引进和创业就业培训机制成为培育居民公共意识、重构经济秩序的重要载体；从政治空间看，将原有村庄次级治理网络与城市网格化治理相结合，形成组织网格、管理网格、服务网格多重维度，重构社区政治秩序；从文化空间看，加强互助空间，重建互惠资本，整合来自不同村落移民的民俗文化和集体记忆，重构社区文化秩序，构建一个具有较强包容性和心理归属感的社区共同体，促进经济与社会、移民与社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研究发现，易地搬迁移民社区的建构是中央政府意志通过科层制的层层传递在基层得到高效执行的实践样态，各级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根据当地社会发展情况、自身利益诉求和行政能力，运用自由裁量权对政策进行变通处理。社区空间建构逻辑既遵循了非人格化的科层制理性，也与其面临的真实社会环境、政治生态、地方性知识及各主体间互动关系密切相关，因此，移民社区建构中蕴含了政治

逻辑、行政逻辑和社会逻辑三种不同逻辑的交织。政府在进行社区建设中应充分认识到搬迁人口的异质性和社区治理场域的复杂性，有针对性地识别移民的贫困原因和真实诉求，在互惠互利的原则下，积极培育社区共同体意识，建立和谐稳定的社区秩序，重构良性社会整合机制，构建全民共建共享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

改造、攫取与荒歇

——黄土高原村民环境行为研究

林 蓉

指导教师：陈阿江

答辩日期：2019年12月9日

关键词：黄土高原；社会行动；环境行为；环境影响

摘 要：黄土高原是我国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严重的水土流失不仅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和人民生活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而且还关系着黄河下游平原的安危。建国以后，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问题进行治理。在此背景下，本文选取陇中黄土高原的谢村为个案，在扎实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分三个时期对村民的环境行为及其后果进行了考察，以透视新中国成立以来黄土高原的环境变化历程。

人民公社时期，谢村在“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下，组织全村村民完成了修梯田、筑大坝、植树造林等一系列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在黄土高原地区，以梯田建设为核心的农田基本建设工程正好与该地区的水土流失治理工程相一致，因此上述一系列工程的完成，不仅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提高了粮食产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水土流失、改善了村庄环境。这一时期，国家对村庄绝对的控制权力，以及在这一权力的保障下，村庄对村民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是谢村能够调动全村之力，共同完成三大环境改造工程的基础。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谢村村民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对环境资源进行了攫取式开发。除了不断加大对现有土地的开发利用强度之外，还为了满足建材和薪柴所需，将人民公社时期栽种的树林砍伐殆尽。植被的破坏与日趋干旱的气候交织在一起，使村民明显感受到了环境的恶化，最为突出的是泉眼逐渐干枯，人们的生活用水出现困难。从谢村林地的砍伐过程来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随着国家权力的不断上移，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逐渐弱化，使得村民的滥砍行为由于缺乏有效监管，从而导致了“公地悲剧”的发生。

新世纪以来，伴随农村劳动力的大量非农化转移，农民的生计逐渐向非农化转变。生计的非农化

转变使农民对土地的生存性依赖逐渐降低，农民的土地价值观随之改变。土地价值观的变化进而影响到人们对土地开发利用方式和行为的变化。从谢村来看，一方面，在劳动力相对缺乏、农业比较收益低、土地流转困难等因素的影响下，一部分位于山顶和陡坡的耕地被抛荒；另一方面，在退耕还林政策的推动以及市场需求的驱动下，特色经济林得到大面积发展。耕地抛荒和经济林的大面积发展增加了该地区的植被覆盖度，改善了植被覆盖结构，从而有利于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的恢复。从行动逻辑来看，谢村村民在这一时期对土地开发利用方式和行为的转变，是基于比较利益的考量而做出的理性选择。

总体来看，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受不同的结构性因素所影响，黄土高原谢村村民的环境行为经历了一个从改造、攫取到荒歇的过程，相应地，该地区的生态环境也呈现出从相对改善到不断恶化再到有所恢复的发展趋势。在当前我国社会发展所呈现出的新趋势下，在进一步推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同时，通过促进该地区农业发展模式的转变，以达到生态恢复的目的，是一条可供探索的经济发展与生态恢复的互促共进之路。

项目制下水库移民村庄治理中的 权力结构与行动策略

——以中部 H 村为个案

吴 上

指导教师：施国庆

答辩日期：2019 年 12 月 9 日

关键词：水库移民；村庄治理；项目进村；权力结构；行动策略

摘 要：水库移民村庄治理是指在既有政策框架的约束下，通过有效地动员整合政府、村庄、移民及其他相关主体，释放出优惠政策及扶持资源的最优效用，从而实现发展与稳定的双重目标。然而，受资源依赖和权力依附的双重影响，项目与村庄治理之间出现了关系倒置，项目的输入非但未能改善村庄治理状况，反而衍生出诸多异化后果。本文以水库移民村庄项目扶持的运作过程为叙述主线，系统描述在项目制的介入下村庄内外治理主体的诉求差异化凸显，揭示基本单元中权力结构的新变化；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争取项目资源逐渐成为村庄治理重心的演进历程，分析多方主体行动策略选择的深层动因；最后归纳村庄治理项目化的表征、局限及暂时性的应对策略，并从制度优化的角度探讨项目与村庄治理实现耦合互嵌的可能路径。

梳理相关政策的演进历程及关键表述不难发现，国家寄希望于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系统性实施，一方面帮助移民增收致富、摆脱贫困，另一方面实现村庄协调发展、缩小差距，由此在重点任务的落地执行中逐步凸显了对项目化运作手段的运用，并通过扩大后期扶持资金投入规模、调整后期扶持项目资金占比、整合其他涉农项目资金等诸多方式来保障项目资金供给，使项目成为水库移民村庄的发展依托和治理资源。然而，项目运作却发生了目标偏移，“软硬脱节”和“关系反常”的制度困境屡见不鲜，无形中改变了村庄治理的原有格局及秩序。

究其原因，由于身份属性上的差异，不同主体对于项目运作和村庄治理的关注点不尽一致，从而塑造了差异化的目标诉求。其中，服从于科层体制和项目管理模式，县级政府及水库移民管理部门只能“抓大放小”“避虚就实”，集中力量解决眼前问题；乡镇政府则因绩效考核和有限授权而游离于项目的核心运作过程，在缺乏有效激励的情况下更倾向于主动避责；由于项目的竞争性和资金的有限性，水库移民村庄更为在意的是能否争取到项目和争取到多少项目资金；而水库移民也凭借其特殊身份强化了捍卫自我利益的动机。仅将着眼点瞄准于水库移民村庄这一基本治理单元之上，更能够清晰地观察到项目运作对村庄治理的权力结构所产生的连带影响：第一书记和村两委凭借其项目资源的争取运作能力而掌握了村庄治理的主导权力，拥有较高的话语权威，而村监会和村民小组长的权力地位虽有所沦落，但仍会以村庄大局为重，通过“表面监督”“被动疏离”的形式确保村庄成功获得项目资源。由此可见，多方主体的目标诉求逐渐向着项目背后的利益转移，导致作为治理工具的外部项目反而被塑造为治理的目的所在。

当然，以项目为中心的村庄治理格局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内外主体的长期博弈互动下所导致的相应结果。首先，历史欠账和资源流失客观上加重了村庄所面临的治理压力，迫使村庄向辖区政府和移民管理机构表达出需要项目投入来弥补资源短板的强烈意愿，而历经“软磨硬泡”后而得的项目指标使村庄尝到了“甜头”；其次，随着国家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正式实施，村庄开始大规模地申报各类扶持项目，并有意识地通过平衡精英与移民之间的利益分配，在村庄内部培植起项目优先的观念共识；再次，当基层政府在项目供给过程中不断加入自身利益时，村庄则以“体会意图”“服从安排”“作出成绩”等策略来获得其注意和认可，进而保证项目资源的持续输入；最后，村庄的项目需求与下派的第一书记的治理思路不谋而合，并在争取“带帽”名额中展开密切合作，进一步放大了村庄对项目资源的依赖性。由此导致村庄各项治理事务服膺于项目，村干部自然而然地产生了“项目扶持做得好等于村庄治理得好”的异化思维。

与此同时，项目化的治理方式也逐渐浸染到村庄治理的其他面向，甚至被奉为屡试屡验的治理“良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项目制下的村庄治理更多地暴露出形式导向的限度，包括以数字材料应对技术要求、以程式规则回避少数异议、以外在形象标榜内在善治等。而面对多重压力，村干部往往使用策略手段来临时转移。就短期的村庄治理格局来看，单纯依靠项目体量的线性累加所释放出的溢出红利，虽然暂时地抑制了治理压力的激化，在村庄内外之间达成了有限稳定，但从长远来看，村庄治理秩序的短暂平息也意味着不确定性的增加。从本研究得到的启示在于，项目输入理应与村庄治理达成深度

嵌入和有机统一，矫正项目与村庄治理的异化关系。